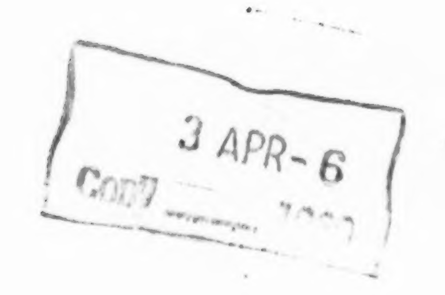
歷史教學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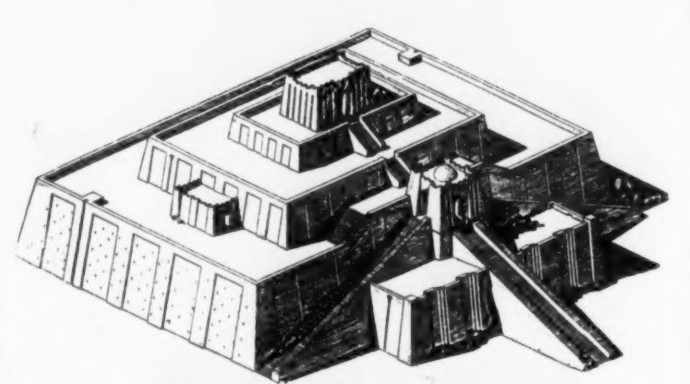


1957

世界歷史参考圖片(二十)



圖一　兩河流域史前时期的彩陶。圖案花紋常用黑色或棕色。采自赫罗兹尼："古代西亞、印度和克里特島的历史"，頁 27。



圖二　烏尔王国的祭塔（复原圖，約公元前2123年）。采自赫罗兹尼："古代西亞、印度和克里特島的历史"，頁79。



圖三　赫梯古碑（公元前九世紀）。碑文記克世米世君主立其子为繼嗣事。采自赫罗兹尼："古代西亞、印度和克里特島的历史"，頁115。



圖四　亞述王拿西拔二世（在位年代公元前884—859）石像。采自英博物館："巴比倫与亞述古物指南"，頁40。



反資産階級右派分子斗爭特輯

教学参考

教学問題

歷史教學

·月　刊·

一九五七年九月号

（总第81期）

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历史教学月刊編輯委員会

出版者　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錦州道六号）

發行者　天津市报刊推广局

訂購處：全国各地郵局

代訂代售處：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印刷者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

定价每册　0.30元

預定价目

三个月三期　0.90元

半年六期　1.80元

全年十二期　3.60元

本期印数　1—32,600

捍衞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歷史科学，粉碎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



歷史教師們，積極投入偉大的反右派斗爭的革命行列中來！

兩个多月来，全国各地在进行着轟轟烈烈的反右派斗爭。这是一場偉大的政治战爭和思想战爭，是資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爭，是一場关系六万万人民的命运和我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斗爭，是一場具有偉大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斗爭。这場斗爭是对抗性的不可調和的斗爭，每一个愛国者都应当深刻認識这一斗爭的偉大意义，我們历史教师更应当充分認識这个偉大斗爭的历史意义。我們应当認識，这个斗爭是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一个偉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我国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一場阶級斗爭。在对农業、手工業和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以后，我們国家在經济战綫上解决了所有制的变革問題，这是我国社会性質的大变动，是經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仅有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沒有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是不能巩固的。只有取得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够全面地树立無产阶級的党的領导，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道路对資本主义道路的徹底胜利。

反右派斗爭是一場偉大的政治斗爭。我們知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大規模的、暴風雨式的群众性阶級斗爭已經基本上結束，但决不是說阶級斗爭已不存在。实际情况是，在国外，帝国主义仍然存在；在国内，阶級还沒有完全消灭。因此，在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阶級斗爭就必然要存在一个相当長的时期，有时甚至表現为很激烈、很尖銳的形式。这次反右派斗爭就充分說明了这个問題。从 1955 年底以来，我国取得了三大改造的偉大胜利，奠定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全国人民都在欢欣鼓舞，庆賀胜利。但是，資产阶級右派的政治活动家，資产阶級右派的知識分子的心情却是和全国人民的心情完全相反的，他們虽然也混在群众中迎了新，送了旧，但却并不甘心于放弃剝削，不甘心于放弃他們的反动政治路綫。反右派斗爭中揭发出的材料証明，这些人一直在处心积虑，待机而动。他們把整風看作是一个推翻共产党的好机会，于是悍然無忌地向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发动了有組織、有計划、有綱領的猖狂进攻，企圖搞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他們首先看中了知識分子，企圖先夺取文教科学界和工商界的領导权，然后进一步夺取全国的領导权。他們咒罵工人阶級領导是“党天下”，說什么“外行不能領导內行”，党不能領导科学、教育、文学、艺术，不能領导工厂、企業、医院等等，公开叫囂要党的領导从各方面退出来。他們用尽一切惡毒字眼对共产党横加誣蔑，甚至公开号召“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这种形势难道还不够明显嗎？难道不是一場尖銳

的、激烈的政治斗爭嗎？在这种紧急关头，如果我們不进行坚决反击，如果采取容忍退讓的态度，其結果还能設想嗎？殷鑒不远，我們大家都学过第一次国內革命战爭的历史。那个时期，資产阶級右派也是一步一步地向党进攻，逼迫党放弃对革命的領导权。由于陈独秀右傾机会主义的錯誤，采取了可恥的妥协、投降的方針，使資产阶級篡夺了对革命的領导权，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反动政权二十多年的黑暗的血腥統治，多少革命烈士流尽了鮮血。將昔比今，我們能够允許这种慘痛历史重演嗎？当然，右派对当前政治形势的估計显然是大大的錯了，他們过低地估計了群众今天的覚悟程度和人民的偉大力量，他們的猖狂进攻遭到了党和全国人民的迎头痛击，他們的政治陰謀被揭露了，反右派斗爭已經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这場斗爭还沒有完全胜利，許多右派分子还企圖頑抗，我們的任务，就是要乘胜追击，在这場政治斗爭中取得徹底的、完全的胜利。而且在今后，右派分子遇有机会仍然会兴風作浪，我們仍然要提高警惕，随时注意打退右派的进攻。

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个極为惡毒的方面就是进攻社会主义事業的理論基础。他們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旗幟进攻馬克思列宁主义，妄圖动搖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全国人民中引起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怀疑，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使我国人民迷失方向。他們还宣揚資产阶級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要求党和政府恢复資产阶級社会科学，实卽企圖以資产阶級社会科学来指导我国的政治、經济、法律以及其他社会活动，从而把我国引向資本主义的道路，使我国社会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慘境地。右派分子的这种反动企圖，十分明显地表現在以曾昭掄、錢偉長为首的民盟中央科学规划問題临时小組所提出的"关于我国科学体制問題的几点意見"这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綱領中。这个反动文件的社会科学部分沒有片言只語提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相反地，它一开始就写道："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接着他們又提出了恢复資产阶級社会科学的要求。不难看出，这个所謂"意見書"完全不是为发展我国的科学事業而提出的。我們知道，社会科学是有鮮明的阶級性的，資产阶級社会科学是为資产阶級利益服务的，本質上是反动的、不科学的。只有在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才有了眞正的社会科学，因为無产阶級的阶級利益与社会发展的方向完全一致，只有無产阶級的社会科学才是最徹底地反映了社会发展客观規律的社会科学。右派分子要我們改变对旧社会科学的态度，要求恢复資产阶級社会科学，其目的就是要我們放弃無产阶級的立場，就是要以資产阶級思想代替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难道可以讓右派分子的这种罪惡企圖得逞嗎？难道可以放弃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讓全国人民再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慘境地去嗎？

这里，我們必須特別提到本刊編委、右派分子雷海宗的反动謬論。他在中共天津市委召开的宣傳工作会議上，在人民日报召集的座談会上兩次发言都对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惡意的誣蔑和詆毀。他沒有提出任何根据，就荒謬地說馬克思主义已經停滯了六十二年，否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是科学，并極力貶低社会主义各国的社会科学水平。他又宣揚"社会科学是随資本主义产生而产生的，是到資本主义社会才成为一种严格的眞正的科学"，"在人类历史上，成为科学的社会科学是到資本主义时代才出現的"；而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据他說則是"在資产阶級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建立的。很显然，雷海宗的这种企圖与民盟中央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綱領中的企圖是完全一致的。当人們向雷海宗的这种謬論提出批評和質問时，他一面避而不答，一面又以"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为題，作了所謂"学术講演"（見本刊七月号），把自己隐藏在"学术問題"的幌子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繼續进攻。在这篇文章中，他曲解了生产力的概念，以生产工具来代替生产关系和阶級斗爭作为区別社会性質的依据，并且在結束語中狂妄地建議史学界"不再多談历史的分期問題"。試問：撇开生产关系和阶級斗爭，能够說明人

类历史各阶段的社会性質嗎？能不能說明这一社会制度到另一社会制度的革命轉变？研究历史而不談分期問題，那末历史还有沒有規律性呢？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論还是不是科学呢？社会主义革命理論是不是科学呢？雷海宗的这篇文章，正是企圖使人們从根本上对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发生怀疑，因此这絕不是什么討論学术問題，而是披着“学术”外衣，繼他在人民日报座談会发言之后对党、对馬克思主义的更为恶毒的进攻。我們認为有必要提起史学界極大的注意，必須对这种反馬克思主义的反动謬論展开不調和的斗爭，粉碎資产阶級右派的挑衅，堅决捍衛馬克思列宁主义。

在我們中学历史教师的队伍中，也隐藏了一些右派分子，他們平时就在課堂上偷偷摸摸地散布了不少仇視党、仇視人民的思想毒素，毒害青年学生。在这次資产阶級右派向党和人民发动进攻时，这些披着历史教师外衣的右派分子也就原形畢露了。他們同全国右派分子一道，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攻击。天津市女三中历史教师、右派分子黄心平就是隐藏在教师队伍中的一个。这个右派分子平时在課堂上講到农民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遭受反革命的摧殘和屠杀时，便繪声繪色得意洋洋。匈牙利事件以后，他更得意忘形地希圖中国发生同样的事件，要参加暴动。在党提出整風以后，他利用“大鳴大放”的机会，公开提出取消共产党的領导地位、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等一系列反动主張，企圖以此获得右派政治野心家的賞識，充当右派的骨干。我們知道，历史教师的职責是以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来教育我們的青年一代，以历史发展的規律性知識来武裝青年学生，使他們能堅定不移地为实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偉大理想而斗爭。像黄心平这类反动透頂的右派分子，怎么能够担負起以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来教育后一代的任务。因此，我們全体中学历史教师都应当行动起来，把隐藏在历史教师队伍中的右派分子一个个地揭发出来，决不讓他們繼續散布反馬克思主义的毒素毒害我們的青年。

由此可見，反右派斗爭是关系我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偉大斗爭。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資本主义道路？这就是目前历史对每个人提出的庄严質問。任何人都必須回答这个問題，絕不应当迴避，也不可能迴避。正确的态度就是积極地投入这場偉大的斗爭，为捍衛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堅决打退資产阶級右派的猖狂进攻。

資产阶級右派的猖狂进攻，不能不促使人們更加深入地思考些根本問題，这也將不可避免地要形成一个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全民性的大辯論。通过这次大辯論，將会使人們对一些根本性問題，例如，革命和建設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設的成績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的領导，要不要无产阶級專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重大問題，进一步在思想上弄清楚。这場大辯論將大大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覺悟，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同样是有深刻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我們历史教师应当积極投入这場大辯論，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覺悟和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

这次反右派的斗爭，还使我們更深刻地体会到加强政治学習和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因为，我們每个人都处在剧烈的阶級斗爭环境中，企圖逃避政治、逃避阶級斗爭是不可能的。資产阶級右派在积極进行着反社会主义的阶級斗爭活动，他們拉攏的对象，首先恰恰是那些政治認識模糊和阶級立場不堅定的人，因此，忽視政治、忽視思想改造乃是一种極端危險的傾向，極易使自己迷失方向以至为别有用心的資产阶級政治野心家所利用。尤其是我們身負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教育青年一代的光荣任务的历史教师，更加应該注意自身的政治修养和政治鍛煉，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工人阶級的知識分子，否則，很难設想能够胜任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在目前，积極投入反右派的偉大斗爭，积極参加关系我国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問題的全民大辯論，就是鍛煉自己政治修养和提高自己政治覺悟的最有效、最好的机会。

粉碎历史学界中右派分子的反动謬論

吴 廷 璆

全国人民反击右派的斗爭是一場思想战綫上和政治战綫上激烈的阶級斗爭。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乘帮助党整風的时机，散布大量的反动言論，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陰謀篡夺領导权。在教育界里，右派分子的活动是極猖狂的，他們惡毒地誣蔑中国共产党，到处点火，煽动学生鬧事。对历史学界，他們当然也不会放过。各地已揭发出一小撮披着历史教师或史学家外衣的右派分子，他們漫罵党和积極分子，挑撥党群关系，反对人民民主專政，主張資产阶級的民主；他們还肆意攻击馬列主义，妄圖資产阶級社会科学复辟。这些右派分子都有一套"理論体系"，以学术为掩护，曾經迷惑过一部分知識分子和青年学生；大家知道，右派分子很懂得历史学是一門阶級性最强的科学，是建設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所以特別伸手到这方面来，瘋狂地向党进攻，妄圖使历史倒轉。为了捍衛社会主义，捍衛馬列主义的历史科学，捍衛人民的教育事業，我們要揭穿历史学界这些右派分子的惡毒陰謀，和他們进行坚決的斗爭。

一 共产党的領導是"三害"的根源还是清除"三害"的动力？

右派分子的言論是形形色色的，但他們之間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便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領导，反对社会主义。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級的先进队伍，是領导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力量，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定反对社会主义，为此，他們集中火力誣蔑党，誣蔑党員和党的領袖。陝西师范学院历史系講师、右派分子王尊一瘋狂地散布儲安平的"党天下"和陈新桂的"无产阶級專政是'三害'的根"那一套讕言，不但叫嚣"根除'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而且惡毒地把全国人民分为党員、共青团員、民主党派、群众四等（六月十五日人民日报，以下同）。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我們国家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职業上的分工和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原則，决沒有这种荒謬的等級制度。王尊一为什么无中生有地提出这样的論点呢？原来是为要詆毀党团員，說他們是掌握"統治权"的，民主人士和群众則"只是处于被統治的地位"，以便証明"三害"中的宗派主义"在目前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領导下的中国普遍地存在着"。他抹煞大量非党人士担任国家重要領导职务的事实，武断地說"机关学校企業的首長……正的总是由党員担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甚至詛咒这种政治形式和元朝、清朝統治者民族压迫的人事制度沒有什么区别。王尊一以为这样可以激动一些民主人士，挑撥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却沒有估計到党領导下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中的絕大多数人所获得的进步，蔑視今天的知識分子連分辨封建王朝和人民政权性質的能力都沒有，这就决定了他的陰謀必定要失敗。

右派分子仇視共产党的領导，实質上是反对无产阶級專政——在我国是人民民主專政。中国人民經过千辛万苦，找到了馬列主义的眞理，在无产阶級及其政党的領导下，推翻了几千年来人剝削人的制度，获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級只有通过自己的先鋒队——共产党，运用政权这个武器，对人民內部实行民主，对反动阶級实行專政，才能消灭阶級，建設社会主义。共产党的領导权，是实行无产阶級專政的必要条件。但是，无产阶級專政和党对国家机关的領导，决不能說是"党天下"，即共产党員独掌政权机关；更不能說是"党的專政"，即排除非党人士于政权之外，專非党人民群众的政。恰恰相反，无产阶級專政，不論在什么条件下，都必須同广大的人民群众結成以共产党为領导的阶級联盟，需要大家对于国家事务的积極参加，才能实現对反动阶級的專政和社会主义的建設。右派分子为要反对无产阶級專政，不惜顚倒是非，尽情誹謗，天津市女三中历史教师、右派分子黃心平便大叫"一党执政有害处，像共产党已經整过三次風了，但如今仍然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五月二十七日天津日报）；华东师范大学的右派分子、历史系教授戴家祥（化名"楚歌"）更叫囂着"三大主义是一母所生的难兄难弟，这个母体是共产党人的專制集权"（七月十二日人民日报）。他們不但把党的領导咒罵成"一党执政"和"共产党人的專制集权"，并且和儲安平、陈新桂、王

尊一等同样都把“三害”的根源归在党的領导上。右派分子大概認为这是向党进攻的得意之作，但这种无恥誹謗是經不起駁斥的。大家知道，党內錯誤思想的产生，是有它的社会根源和認識根源的。在阶級社会里，在少数統治阶級剝削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国家制度下，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是必然的，并且是不可克服的現象。今天我国的阶級基本消灭，只有阶級的残余，即資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的思想还会繼續存在，而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表面性，也容易造成主观主义的傾向，脫离群众、脫离实际的作風又导致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滋長。但是无产阶級及其政党以解放全人类、实現共产主义为自己奋斗的目标，这种人类史上空前偉大的事業，本身便和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不相容。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而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就是反对主观主义、反对脫离群众和脫离实际的。无产阶級專政保証私有制和阶級的消灭，它的国家和剝削阶級的国家相反，必須反对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党还保証了党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整風运动就是一种“普遍的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这就必然能最后消灭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影响。由此可知，无产阶級專政和党的領导不仅不是产生所謂“三大主义”的根源，而且正是消灭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根源的偉大力量。

二　是人民民主还是“專制集權”？

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另外一套手法，便是夸大、歪曲我們制度的具体环节上或个别人在执行政策中的某些缺点来根本否定人民民主專政的基本制度。大家知道，人民民主專政制度标志着我們国家的根本性質。这一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和我国的社会主义經济基础完全适合的，从生产不断擴大、人民不断增長的需要逐步得到滿足这一事实可以証明。右派分子不顧这种基本成就，抓住选举、人事、教育、肃反以及新聞出版等工作中的个别缺点，肆意加以夸大来攻击党，最后集中誹謗我們国家“不民主”，以反对人民民主專政。自命为“史学家”的右派分子宋云彬謾罵考試制度是“科举制度的延續”，誣蔑肃反到处“逼死人命”（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王尊一狂妄地表示要向党和毛主席呼吁“民主”、“自由”，把我們国家說成“人民只能听从共产党的命令、指揮和摆布，人民那能有宪法上賦予的思想、言論的自由”。这和戴家祥謾罵“共产党人的專制集权”同样，都是对我們国家制度的无恥誹謗。右派分子叫囂“不民主”、“專制”，不是偶然的，資产阶級的代言人从来便慣用“全民的”民主来欺騙劳动人民，也用这种虚伪的“民主”来攻击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不民主”，是“專制”。資产阶級的所謂民主究竟是一些什么貨色呢？由于資产阶級靠剝削而生存，他們一刻也不能离开工人阶級；同时也由于工人阶級的斗爭，迫使資产阶級不能不在形式上作些“民主”的裝飾，以掩盖其反动統治的本質，所以資本主义国家在不妨碍資产阶級根本利益的范圍內，容許反对党甚至工人阶級政党的存在，容許某些有限的合法的言論自由以及伪裝民主的“普选”等等。但是工人阶級限于物質和文化的条件，加上資产阶級政府公开的、秘密的鎭压和舞弊，根本不能享受到眞正的民主，“它实际上始終只是供少数人，只是供有产阶級，只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列宁）。只有无产阶級專政的国家里，劳动人民享受的民主，才是最大多数人的眞正的民主。右派分子企圖把我們国家描写为封建帝王和法西斯独裁者的“專制集权”，这是枉費心机的。无产阶級和历史上所有統治阶級不同的地方，便是后者总要竭力把自已的阶級独裁伪裝成“王道”或“民主”，而前者則公开承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实行專政。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对少数人的反动派实行專政，便不能有巩固的多数人的民主。

右派分子謾罵我們党对国家事务的領导是“集权”，我們的政治确是具有高度的集中，但这种高度的集中是以高度的民主为基础的，不是无政府狀态，也不是專制集权。我們这种以工人阶級为領导的人民大众的民主集中制跟少数大封建主或大資本家的專制的集中（即右派分子所謂的“集权”）有本質的不同，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发动了人民群众的一切积極力量，同时使这些力量集中地实現了統一的任务。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也懂得用社会主义的紀律約束自己。过去几年的历史已充分說明了它的优越性，它是人民大众所堅决拥护的制度，这能和历史上残害人民的集权政治相比嗎？右派分子为了反对党的領导，不惜顚倒是非，蓄意詆毁我們国家“压迫思想言論的自由”。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右派分子雷海宗惡意地說，解放后知識分子“一般地是一言不发的，或者只发希望他們发的一套假言”（五月二十二日天津日报）。这不但是对党和知識分子关系的挑撥，也是对所有知識分子的誣蔑，难道今天大家都在說假話嗎？王尊一更叫囂說，“領导上……对待在政策、号召上稍有怀疑，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便認为是思想落后、不进步、保守頑固，甚至給戴上反党、反人民和反革命的大帽子。这样一来，誰还敢对党提出一个字的批評呢？只有学‘金人三緘其口’了”。事实眞是这样嗎？我們国家在党的領导下，进

行了五大运动，三大改造，引起了右派分子的深仇大恨，他們怨恨人民不容許反动派有言論自由，怨恨人民对他們不施“仁政”。照王尊一和雷海宗一类人的話，我們国家“統治思想言論”，已达到可以跟“厉王止謗”、秦始皇“焚書坑儒”相比的程度，把我們国家描写得这样黑暗專制，以为可以破坏党的領导了。但事实上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綫，本身就要求不断傾听群众的意見。党不但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針，并且在整風运动中，广泛向党外人士征求意见，党从来就反对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是非問題，而認为这类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批評討論、說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难道这能叫做“压迫思想言論的自由”嗎？能叫做“專制集权”嗎？右派分子詆毁我們国家“压迫思想言論的自由”，其目的显然是想要我們准許他們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这是办不到的，我們对于不要社会主义，不要工人阶級領导，不要人民民主專政和民主集中制等等，要我們亡国的反动言論，那是毫不客气，要进行坚决的斗爭的。

三 党的領導应該加强还是削弱？

右派分子处心积虑地用种种理由来反对无产阶級專政，否認党的領导。黄心平荒謬地說什么由于国內阶級斗爭已基本結束，因此要求削弱党的領导作用。对于这个問題，我們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今天中国暴風驟雨式的阶級斗爭基本上結束了，但也不是完全結束。首先，在思想領域中，誰战胜誰的問題就沒有解决，目前的反右派斗爭就是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阶級斗爭。从国际上看，帝国主义向我国进行不断的挑衅和破坏活动，也說明兩大陣营間阶級斗爭的激烈。无产阶級專政的任务是徹底消灭阶級，保衛国家，教育和改造小資产阶級，保証向无阶級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为此，共产党的領导不但不能削弱，并且要不断加强；否则会有反动派复辟的危險，匈牙利事件就是一个教訓。

黄心平为反对党的領导，提出了臭名昭彰的所謂“輪流执政”的方案。这和某些右派分子說的“不要共产党的領导，也可以搞社会主义”一样，实質上是企圖削弱党的領导。但是，历史已經告訴我們，“沒有工人阶級的領导，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阶級的領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別的阶級，都不能領导任何眞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資产阶級和民族資产阶級曾經多次領导过革命，都失敗了，就是明証”（毛澤东：論人民民主專政）。尽管各民主党派的党綱都要求走向共产主义，但是这些党派的社会基础終究是民族資产阶級、上層小資产阶級和它們的知識分子。今后在这一部分人中，資产阶級思想还会拖得很長，如果沒有共产党的領导，它們就可能只有符合于本阶級利益的綱領，而不会产生走向共产主义的綱領。这次章罗联盟企圖脫离党的領导，指揮民盟中央科学規划临时小組提出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問題的几点意見”，乃是一个徹头徹尾代表資产阶級要求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綱領”，已足以說明这个問題。

由此可知，民主党派离开共产党的領导，不但不能独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可能走到相反的道路。要徹底实現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須依靠无产阶級專政，而无产阶級專政乃是“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裝力量的政权”（列宁：国家与革命）。这里所謂不与人分掌政权，当然不是說无产阶級在国家政权中不与非无产阶級群众联合，而是說不与任何非无产阶級分掌政权的領导。所謂“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輪流执政”假如不是篡夺无产阶級領导权的企圖，便只能是一种極幼稚的空想。因为这不但在社会主义国家行不通，即使是資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也从来不是資产阶級政党和共产党的輪流执政，而只是資产阶級政党間相互排挤爭权夺利的輪流执政。

右派分子又企圖以“开放政权”、“消灭宗派主义”、“外行不能領导內行”这类謬論从組織上来削弱乃至代替党的領导。宋云彬大言不慚地說，“只有知識分子才能胜任領导工作”。黄心平更公然主張从領导崗位上撤換党員領导干部，換上所謂“有眞才实学的人”。我們不了解右派分子所謂“內行”、“眞才实学”的标准是什么，假如我国是建設資本主义，当然少不了右派分子，但今天人民需要的是社会主义事業，为什么不許共产党来領导，难道右派分子倒成了社会主义事業的內行了嗎？共产党的領导首先是政治領导，政治領导是需要通过組織領导（即党的各級組織及党員对方針政策的貫徹）来保証的，取消党員的領导崗位，便无异取消了党的政治領导。这难道是以工人阶級为領导的国家和人民所能容許的嗎？事实上，国家选擇干部从来便以“德才兼备”为标准的，但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領导干部，自然不能不有一定的政治要求，仅有才而不忠实于社会主义，对人民事業危害更大。反之，国家选擇了一些政治上經过考驗、为群众信任的党員担任領导干部，正是保証貫徹党的决議所必需的，而許多党員領导干部也在工作中不断学習，提高業务知識。解放后八年来各方面事業的飞躍发展，已

說明了党的領导不仅不能削弱，而且是需要加强起来。右派分子从政治上組織上削弱党領导的企圖是会被事实所粉碎的。

四　是接受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还是由資产阶級社会科学复辟？

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最惡毒的陰謀之一便是从根本上反对馬克思主义，他們知道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行动指南，只有馬克思主义才正确地說明社会发展的規律，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否定了馬克思主义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为此他們集中火力用"貧乏"、"过时"、"停止发展"，以及"教条主义"等等罪名歪曲、丑化和誣蔑馬克思主义。雷海宗在四月間人民日报上連續发出所謂"馬克思主义从1895年以后就停止发展"的謬論，便是在学术的外衣下进行的反馬克思主义陰謀的一个具体的例子。

雷海宗在这一謬論中首先夸大資产阶級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抹煞馬克思主义和資产阶級社会科学之間的基本区别，說什么"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有一个根本問題；社会科学是随資本主义产生而产生的，是到資本主义社会才成为一种严格的眞正的科学；馬克思、恩格斯是在資产阶級社会科学的基础上用新方法和新观点为无产阶級建立了新的社会科学"。大家知道，科学总是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規律性的，資产阶級社会科学站在剝削者的立場，从唯心主义出发，从来就反对历史发展的規律性，他們只知捏造历史、歪曲眞理，不但說不上是什么"严格的、眞正的科学"，并且根本上是反科学的。雷海宗荒謬地把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說成似乎是从資产阶級社会科学中派生出来的，事实上前者决不是从后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站在无产阶級的立場，批判和克服了后者的錯誤与缺点，并在同它进行不断的斗爭中发展起来的。雷海宗还用新旧的概念混淆兩种敌对的思想体系之間的根本区别，企圖达到他閹割和否定馬克思主义的目的，难道还不明显嗎？

雷海宗沒有任何論据，誣蔑馬克思主义"实际上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的1895年的地方"。他故意將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分为"当前革命問題"和"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經驗"即历史学兩个方面，說停止发展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这是因为他武斷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論不能算作人类历史經驗，以后縱有发展，也只限于"个别問題有新的提法"，至于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則更"貧乏"，他以为这样便可以根本否定整个馬克思主义的发展。雷海宗这种陰謀只能是妄想而已。馬克思主义包括他的历史科学在內，本来就是革命的科学，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总結人类实踐經驗，找出它的規律，用来指导实踐，难道脫离革命实踐的历史学能称为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嗎？

馬克思、恩格斯以后，馬克思主义者从沒有停止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发展，列宁、斯大林和毛澤东主席以及各国共产党中央在革命哲学和革命理論方面的貢献，都是在新的条件下发展和丰富了馬克思主义的学說，这些学說同时也就是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杰出成就。苏联、中国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中一般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也是不胜枚举的。我們要問雷海宗：这許多巨大的貢献，难道都只是"在个别問題上有新的提法"嗎？这許多具有指导意义的历史科学作品难道都不是历史学？这許多总結了胜利地推翻一切人剝削人的制度，建立人类史上最美滿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斗爭經驗的著作，难道都不是雷海宗所謂"在总結人类全部历史經驗教訓这一方面"发展了馬克思主义嗎？

雷海宗还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攻击馬克思主义，誣蔑我們"今天仍滿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馬克思或恩格斯在当时的認識条件和資料条件下对問題所說的个别的語句"。教条主义是一种脫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馬克思主义不但在理論上而且在实踐上都在生气勃勃地发展着，这就証明它决不是教条主义。在工作方法、思想方法或学术研究上出现的非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正是党整風的对象之一。雷海宗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旗帜，見到我国史学界引用了馬克思主义經典的理論，便認定是犯了教条主义的滔天大罪；在我們看来，只要是以馬克思主义为指导、詳細占有材料、联系实际的科学研究，其結果总是接近眞实的，反之，落在唯心主义圈套里，否定了馬克思主义的規律性的所謂历史学，却总是歪曲历史眞实的，因而也是反科学的。

雷海宗在六月初发表的"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見七月号本刊）上，更尽情地歪曲和誣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理論。他企圖用荒謬的生产工具論来否定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学說和阶級斗爭学說。所謂生产工具論实际上就是法西斯德国和美国所流行的"技术論"，它否定生产关系在社会中的作用，强調技术决定一切，今天資本主义国家中最反动的"原子社会学"便是这一唯心主义学說的产物。雷海宗在这里还否認奴隶社会阶段的存在，捏造出所謂"部民社会"这一阶段，企圖来推翻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規律，以达到他全部否定馬克思主义的陰謀。

（下轉53頁）

駁斥雷海宗的反对馬克思主义歷史科学的謬論

陳樂素　邱漢生

从四月到六月，正当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在历史学界，雷海宗打起了反对馬克思主义的旗帜，接連发表反动言論，妄圖动搖馬克思主义理論基础，否定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論。必須指出，这是一种挖心战术，其目的，就是要从理論上推翻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眞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雷海宗的反动言論，明目張胆的有三次：(1)四月十四日天津的教授們关于"百家爭鳴"的座談，雷海宗說，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1895年的地方"（見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2)四月二十二日雷海宗給人民日报的信（見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3)六月二日，天津各社会科学学会学术講座，雷海宗的講演："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見"历史教学"七月号）。这三篇东西，反映了雷海宗反对馬克思主义的一套荒謬的看法。

按照雷海宗的說法，社会科学，是不包括"革命經驗"这一方面，他說："还有另外一面。在这另外一面，在不断深入地，日漸具体地总結人类全部历史进程中的經驗教訓这一方面，这六十年來是几乎完全处在停滯狀态之中。"他又說："最近六十年來，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地有新的发展，……。但这些，对我們社会主义陣营的社会科学界來說，是等于不存在的。"显然，雷海宗之所謂世界，是指資本主义世界。尽管他在"社会主义陣营"前面裝上"我們"兩个字，实質上他是站在資产阶級右派分子的立場來嘲笑"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貧乏"。

雷海宗的反对馬克思主义，当然不只滿足于空洞地說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1895年的地方"，不只滿足于空洞地只承認資本主义的"社会科学"，否定社会主义的社会科学，而是要进一步攻击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論，企圖从否定历史上奴隶制的存在，从这里打开缺口，以达到全部否定社会发展史的目的，來搖撼馬克思主义。

請看雷海宗的拙劣手法！他首先妄想用生产工具发展史來代替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他認为"石器时代为原始社会"，"机器时代先为資本主义社会，后为社会主义社会，也无問題。爭論都在第二、三段，即銅器和鉄器时代，即資本主义以前的阶級社会"。他提出疑問說："鉄器时代，前后二千七、八百年，为何前一段为奴隶社会，后一段为封建社会？"这就是說，生产工具发展史是絕对的，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分期是混淆不清的，一方面，同一的社会发展时代——鉄器时代却划出兩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同一的社会发展阶段，如奴隶社会，却又兼跨兩个生产工具发展时代。因此，雷海宗給客观的社会发展史貼上自己制造的标簽說："原始社会以后，資本主义社会以前，依生产工具而論，有銅器和鉄器兩大时代，依社会性質这兩大时代可分为兩个或三个阶段：部民社会、古典社会、封建社会。后兩者就是鉄器时代，实际都是封建社会而稍有不同。"企圖这样輕輕地取消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說。

片面地抓住了生产工具，而否定"生产力"这一概念，是雷海宗反动理論的又一个特点。他先引用"簡明哲学辞典"的話："生产力——生产物質資料时所使用的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經驗和劳动技能而使用生产工具來生产物質資料的人。"接着，就指出，"作为一个定义，好得很；无人反对，人人贊成。但我們仍要問：經驗技能等等，具体究何所指？""生产力中的人的因素，我們是否可以假定为当然的？是否可以不必在这上面多作文章？""工具本身是很重要的；工具的存在假定技术的存在。"他就这样想偷偷地把"人"和人的"經驗和劳动技能"都归到生产工具上去，用生产工具代替生产力，想偷偷地否定人的因素，企圖由此而抹去生产关系、阶級关系和阶級斗爭。

我們馬克思主义者恰恰要把"人的因素"看作为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人的因素，在阶級社会，就是阶級对抗的因素。在資本主义以前的阶級社会，掌握"一定的經驗和劳动技能而使用生产工具來生产物質資料的人"，就是被剝削被压迫阶級的人。馬克思

主义就是要講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就是要講阶級，就是要講阶級斗爭。害怕阶級斗爭的反馬克思主义的雷海宗企圖作文章来取消阶級斗爭这一事实，其結果只能是說明自己的愚蠢而已。

雷海宗否定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說，最突出的，是他閉着眼睛否定历史上曾經存在过奴隶制社会阶段这一事实。他認为鉄器时代，“鉄器普遍使用后，人类社会初次出現了較为大量的商品生产”；交換普遍后，“人类历史上初次有了通貨。一切物品都逐漸以通貨来衡量，一切物品都开始有了价格。最后人与人的关系也以通貨来衡量，連人自己也有了价格。人自己也成为商品，即奴隶。在人类历史上，至此方眞正有了奴隶。”雷海宗認为“同种同族的人是不会容許奴役的”，而“奴役战俘，認为是奴隶的重要来源，实际这是欧洲学者想当然耳的說法”，“世界历史上并沒有一个奴隶社会阶段”，“在历史上眞正的奴隶主国家只能是例外的，不可能形成通例。所謂希腊奴隶社会的說法，完全出于錯覚，希腊絕大部分根本沒有奴隶”。雷海宗的这些說法，同恩格斯的有关奴隶制社会的理論背道而馳，他妄圖用这些說法来推翻恩格斯的理論。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指出：“生产已經发展到如此程度，使人的劳动力已能生产比簡簡單單維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更多的东西；維持大量劳动力所需的資料，已經具备了，运用这些劳动力的資料，也已經具备了。这样，劳动力于是获得了价値。……战爭却使他們得到了这种劳动力，……俘虏开始被活着保留下来，而其劳动则开始被利用，……奴隶制于是被发現了。这种制度，很快地在所有发展到了超出原始公社之上的人民中成了支配的生产形式，……。”（人民出版社1956年二月版，第185——186頁）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奴隶制的出現，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結果，而不是社会生产发展中生产工具发展的結果。雷海宗想从生产发展史中，从生产力和人們生产关系发展史中，抽出生产力中的生产工具的发展来区分社会生产的历史阶段，来否定奴隶制的存在，这显然是反馬克思主义的謬論。

雷海宗明明知道社会发展史是馬克思主义基本理論的一部分，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曾反复闡明的不可动搖的理論，是对过去几千年几万年人类历史发展的总結，具有最丰富的理論上和史料上的科学根据。但是为了向馬克思主义进攻，雷海宗从資产阶級武庫中檢取早已破产了的“材料論”作为反馬克思主义的武器。他一則說：馬克思在政治經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提到的亞細亞生产方式、古典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以及近代資产阶級生产方式等几个遞进时代，只是馬克思根据十九世紀中期所能掌握的材料，所得出的結論，而且这个結論，也只是“大体說来”。“至于中国的上古史，一百年前的欧洲学者等于完全不知道，五十年前的欧洲学者所知道的也仍然可憐得很。”他又說：“称古希腊为奴隶社会或类似的說法，并不是什么新的看法，这是文艺复兴以后几百年来欧洲学者的傳統看法。这种看法出于錯覚，出于在‘雅典’和‘希腊’兩个概念間画等号的錯覚。”他还說：“古典、封建兩代之分，为欧洲学者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傳統說法，并无大的毛病，但也无深奥的道理。”更悪毒的是，他說：“馬克思、恩格斯是掌握六十二年前的材料做出的結論，如果他們掌握了今天的材料，就会另作結論。”雷海宗旣輕視馬克思所作的結論，又用“材料論”来否定馬克思的結論。他这种“前不見古人，后不見来者”的看法，反映了他对馬克思主义光輝成就的厚誣和不可容忍的虛无主义的悪劣态度。馬克思主义者研究任何問題，都要詳細占有材料，对材料实事求是地分析，找出問題的本質，发現事物发展的客观規律，作出科学的論断。这种科学态度、科学方法，是任何資产阶級的学者所不能比拟的，这难道雷海宗还不知道嗎？

雷海宗一方面閉着眼睛否定馬克思主义的高度的科学成就，否定社会主义陣营社会科学的光輝成就，另一方面，就必然对資产阶級伪科学頂禮膜拜。果然不錯，雷海宗說：“联合国經济社会委員会所属的‘教育、科学、文化机構’目前正在着手編輯一套全世界的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发展史，將来当是此方面最完备的参考書。”書还沒有編出来，就情不自禁地推崇备至了。对資产阶級伪科学何其感情深厚耶？

雷海宗否認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的基本理論，厚誣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醉心于資产阶級的伪科学，这一切，目的何在？很明白，雷海宗的目的就在于推翻馬克思主义，讓資产阶級伪科学复辟，从革命理論的思想指导上瓦解工人阶級的战斗組織——共产党。我們馬克思主义的科学工作者不能容忍雷海宗的猖狂进攻，作为国家的教科書編写工作者来說，我們也絕不能容忍这种反动的謬論在广大的教师面前散播，我們要高举馬克思主义的科学旗幟，給雷海宗以堅决的回击！

我們憤怒地聲討歷史教師中的敗类、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羅海沙、黃心平的反黨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北京實驗中學歷史教研組

当我們看到报紙上登載着上海新滬中学历史教員罗海沙，天津女三中历史教員黄心平在整風期間猖狂地向党进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言行以后，激起了我校历史教研組全体同志无比的憤恨，不可抑制的怒火在我們心头憤怒地燃燒。为了保衛社会主义教育事業，为了純潔历史教师的队伍，为了清除资产阶級右派分子对青年学生的惡劣影响，我們不能不对这些披着人民教师外衣的豺狼予以迎头痛击和声討!

罗海沙，这个特务头子戴笠手下的少將專員，这个与特务头子郑介民关系密切、抄过黑名單、监視过进步分子活动的惡棍，黄心平，这个解放后仍旧一讀再讀"我的奋斗"的法西斯罪魁希特勒的忠誠崇拜者，对于人民、对于党、对于我們偉大的鄰邦苏联切齒痛恨的人，居然也都混进了光荣的历史教师队伍，充当资产阶級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急先鋒。

罗海沙陰謀組織什么"鬧事司令台"，扇动学生鬧事；黄心平胆敢提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輪流执政"以削弱党的領导作用和"党应該退出学校"等狂妄要求，揚言"只有暴动才能解决問題"，甚至企圖"用炸药去把天津市委第一書記的腦袋搬下来"！应当指出，这兩个披着画皮的历史教員的活动就是要造反，实質上就是反革命!

右派分子罗海沙、黄心平等都隱藏在学校里，充做历史教員，站在教师——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神聖崗位上，散播他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謬論，毒害青年学生純潔的心灵，毒害我們革命的第二代，这是我們所決不能容忍的！黄心平一貫站在反动的阶級立場上，用反动的思想感情去講历史。当我們講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到蔣介石發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1924—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敗，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受到屠杀，这时我們教师都不能抑制自己的憤怒，学生也恨透了国賊蔣介石！而喪心病狂的黄心平呢？他講这节課时，站在講台上却表現的輕松愉快，用令人难于容忍的詞句描繪着蔣介石如何屠杀共产党人的头。黄心平講革命史課，甚至从不提到党的領导。試問：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如果沒有光荣、偉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英勇地以解放全民族全国人民为己任，繼續担負起領导革命的艰巨任务；如果沒有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員、革命先烈历尽千辛万苦，克服不能想像的困难，甚至拋头顱、洒热血貢献出了自己最宝貴的生命，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嗎？如果沒有党的領导，我們中国人民能够擺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奴隶牛馬的地位嗎？能有今天的新中国嗎？能过今天这样美好幸福的生活嗎？講革命史而从不提党的領导，这符合历史实际嗎？这能完成历史教学的神聖任务嗎？

我們决不能讓资产阶級右派分子把我們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陣地——学校夺去，我們决不能把共产主义事業的接班人——学生，交給他們。我們認为：历史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工具之一，它担負着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極其重要的任务。历史課是要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系統的历史知識武裝学生，使学生認識社会发展的規律，以阶級斗爭的知識武裝学生，使学生認識"迄今存在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級斗爭的历史"，以培养学生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学生了解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以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前途教育。而罗海沙、黄心平之流却与我們的看法截然相反，他們对准了我們的党放出一支又一支的毒箭，他們極端仇視党，他們歪曲党的历史，并想取消党的領导；他們極端仇視社会主义，并想讓我們的学生也不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因而，他們根本不配做一个人民的历史教师。

我們通过历史教学，特别是世界近代現代史和中国近百年史的教学，讓学生認識俄国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級革命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作用和深远影响；讓学生認識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胜利对一切被压迫人民特别是对我国人民革命的莫大鼓舞和支持，对学生进行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通过历史事实讓学生認識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踐相結合的胜利，是走俄国人的路、向苏联学習的胜利。如果沒有

苏联对我国的各种援助，我們就不能取得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設的偉大胜利。所以，我們一定要像爱护眼珠一样地保衛中苏兩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誼和团結，决不允許右派分子任意誣蔑！

而黄心平是怎样的呢？他說："少年先鋒队是从苏联搬来的，我怀疑这样的組織有沒有存在的必要。"我們都是历史教师兼班主任，我們認为少年先鋒队是共产主义的后备軍，是我們革命的接班人，我們起早睡晚地辛勤劳动着，用尽一切心思，想尽一切力法，帮助学生提高覺悟，加速进步，讓他們早日成为少先队員，戴上革命烈士鮮血染紅的紅領巾。我們亲眼看到多少兒童入队以后，学習成績更好了，更守紀律了，更加热爱毛主席和社会主义了。我們的汗沒有白流，我們为自己辛勤耕耘的每一点收获感到喜悅安慰。可是，右派分子黄心平却惡毒地主張取消少年先鋒队，并說什么"是从苏联搬来的"，借此来挑撥中苏关系，并达到使共产主义建設的接班人变質的卑劣目的！

最后，我們要指出：混在历史教师队伍中的右派分子的活动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現象，是有它的思想基础，阶級基础和社会基础的。比如，罗海沙，他就是出卖过十九路軍、出卖过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臭名远揚的右派分子陈銘樞的亲信。当陈銘樞肆无忌憚地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曾到上海活动了二十三天，但与罗海沙的会面就达二十四次之多！我們要質問罗海沙，你和陈銘樞的二十四次会面到底都談了些什么？你們要組織"鬧事司令台"去鬧事，鬧甚么事？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須老老实实地向人民做出徹底的坦白和交代，低头認罪。如果你們胆敢企圖蒙混过关，那么，对你們这些历史教师队伍中的败类，中国人民所唾弃的旧社会的渣滓，我們一定毫不留情地要像扔垃圾一样把你們扔进历史的垃圾箱！

揭發披着歷史教师外衣的右派分子黃心平的反動言行

天津第三女中历史教师　薛玉清　楊臨青　蕭淑芳
耿玉發　王錫智　王淑女

在党开始整風的时候，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混在我們中学历史教师队伍中間的右派分子，也暴露了他們的面目，公开了他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如果不击垮这些盤据在历史教师的工作崗位上的右派分子，不对他們进行徹底的改造，那将对我們人民的教育事業留下无穷之害。我們知道，历史教师的任务，是要通过历史課讓学生受到历史发展的規律知識的教育，从而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能够自覺地献身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設事業的人。但是混在我們历史教师队伍中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他們絕不会履行这一崇高任务，并且还会毒害我們純潔的青年。从已經揭发的这一类右派分子的言行中，也說明了这一事实。例如，混在我們天津市女三中担任历史教师的右派分子黄心平，不但在大鳴大放期間发出了要"各党派輪流执政"、要"削弱党的領导"、要党"交出政权"等瘋狂叫囂，就是在日常教学中間也向学生散布了大量毒素。

黄心平一貫仇視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当匈牙利发生反革命暴乱后，他就日日夜夜盼望在我們国家也发生同样的事件，他听到街上有喧鬧的声音，就惊喜地以为发生了暴动，这可看出他丧心病狂到了什么程度。他还曾瘋狂地威胁一位教师給他制造炸彈，說是要去炸中共天津市委会。整風运动开始后，他認为时机已到，更公开地对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我們現在揭发他平常的一些反动言行，就可以看出盤据教师崗位的右派分子是怎样惡毒地毒害我們的青年和危害我們的教育事業。

黄心平經常利用历史課的講授內容，歪曲革命領袖、烈士和英雄人物的形象，站在敌人的立場咒駡革命群众，为反动阶級張目。例如他講到偉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时，他用一种極輕佻的滑稽像形容列宁的講演和走路，逗引学生哄笑。講到列宁逝世这一悲痛的史实时，他用一种咀咒的口吻說"……死神降临在列宁的身上"。講到卓婭和奧列格等苏維埃的爱国青年被法西斯匪徒逮捕，受到慘酷的拷打、凌辱以至最后壯烈牺牲的英雄事迹时，他戏謔地描述說："敌人抓住了他們，用皮鞭兒啪啪搭搭地打……。"講到苏联紅軍在斯大林格勒气壯山河的奋战时，他不是講紅軍的英雄事迹，而是站在德寇的立場說："苏軍被德軍团

团包围，一網打尽，全部歼灭。”他講述农民如何受封建压迫飢餓无告的情景說：“农民肚子餓得寡嚎的，嘴里呱啦唱大戏。”醜化起义的农民队伍“有高的，有矮的，有胖的，有瘦的，有老的，有少的，有男的，有女的，穿長袍的，穿馬褂的……”。而描述反动阶級殘酷地鎮压农民起义时却輕松地說：“地主軍队像切西瓜一样，咔嚓一刀咔嚓一刀，血淋淋的人头咕碌碌地落地。”黄心平这个右派分子，就是这样地披着教师的外衣，站在反动立場上，在学生面前誣衊革命領袖，醜化人民群众。

黄心平更利用各种机会，捏造事实，歪曲党的政策，煽惑学生对党和政府不滿。例如，他講为建設社会主义积累資金时，煽惑学生說：“过去大学生过年过节吃八个大菜，現在不行了，頂多吃兩个菜，喝点白水。”并問同学：“你們是不是吃窩头？”八大会議号召全国人民艰苦朴素勤儉建国，他却誣蔑說：“党号召咱們穿补丁衣裳，我今后得学着点。”近几个月来他又陰險地破坏对学生的劳动教育，对高三毕業班的同学挑撥說：“你們沒赶上好时候，大学升不了，工作不好找。”又說：“全面发展在中学不完全适合，到了高中应有特長；特别到了高三更应該鑽自己所喜欢的那門功課，别的課程就其次了。只有这样才能保証一定能考上大学，不然的話就要走自学的道路；自学一定受到挫折，一受挫折，心气一下降，就什么也不行了，再怎样努力也不能成功了。”再如，他在課堂上公开地侮辱回民的生活習慣，到处寻找机会破坏党的民族政策等等更是不胜枚举。

黄心平对学生的毒害还不仅止于此，他在課堂上經常散布反动的腐朽的資产阶級思想和观点。他常常在一堂課上抽出一二十分鐘以淫穢荒誕的內容对学生講述“西廂記”、苗民青年男女恋爱追逐情况、鬼故事等，甚至以荒誕无稽的色情兇杀案件向学生进行智力測驗。黄心平更在历史課堂上散布資产阶級的遺傳学論点，說什么“賊的兒子”將来还是“賊”，“上等人物”的兒子將来还是“上等人”。并說有一位“遺傳学專家”調查了一百个家庭，其中“高級”知識分子的后輩几代还是“高級”知識分子，而“下等人”的后代后来还是“小偷”、“流氓”、“娼妓”等下流人物。他就是这样有意識地毒害青年。他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景时不是教导学生克勤克儉地用艰苦劳动創造幸福，而是灌輸資产阶級的享乐思想，說什么“社会主义眞幸福！人們在兩岸垂柳、微波蕩漾中划着小船，唱着美妙动人的歌曲；回到家里楼上楼下电灯电話；坐上沙發，擰开收音机，隆格里格隆……”。

黄心平这个反动透頂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平时利用教师地位处处散播反动的言論，在整風期間更認为有机可乘公然向学生宣傳他的反动政治主張，教唆学生鬧事，在課堂上不去講課而去給同学宣讀报紙上刊載的右派言論，鼓励学生学習右派大学生的办法給学校提意見、写大字报、写文章送报館，搞“大民主”。他說：“别看咱国家表面上很平靜，实际內部很乱！”当他的反党謬論在报上发表之后，他不但講給学生听，而且讓学生表示态度，要学生跟着他跑。反右派的斗爭开始后，他还对同学說：“你們别怕，批評之后不久就要掀起反批評的高潮。”說甚么他自己“經得起考驗”，并狂妄地威胁指責一位党員学生說：“你为甚么看人民日报？为什么看周恩来的报告（指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我反对他，我不久就要写文章反駁他。”

黄心平这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太多了，这里限于篇幅不能全部揭發出来，但就从上面这些事实我們已可以看出黄心平这个右派分子是怎样惡毒地利用了历史教学的講壇来散布他的反动言論。对于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毒害青年的右派分子的言行，我們能够容忍嗎？黄心平是我們中学历史教师队伍中的败类，我們天津市女三中的全体教师正在对他进行斗爭。这个右派分子如不徹底低头認罪，我們决不休止。我們堅决地拥护党的領导，堅决地在党的領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們要和全国人民在一起，对于一切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进行无情的反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中学教師質問雷海宗反动謬論的来信

編輯同志：

我們是中学历史教师。閱讀了你刊第七期刊出的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的“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一文，我們覺得这篇文章有些地方的論点很不对头，不知作者是从甚么立場提出的。現在把我們感覺到的一些問題提出。

雷海宗認为：“自有人类以来，生产工具曾經有过四个大的阶段……第一段、石器时代为原始社会，沒有問題；第四段、机器时代先为資本主义社会，后为社会主义社会，也无問題。爭論都在第二、三兩

段，即銅器和鉄器时代，即資本主义以前的阶級社会。”过去把銅器时代和鉄器时代的前一段划为奴隶社会，把鉄器时代的后一段划为封建社会的看法，雷海宗認为是不科学的。理由是："生产工具既然前后基本一致（其一致的程度远远超过資本主义社会的机器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机器之間的一致），为何前后会是社会发展的兩大阶段？而前一段为何又与銅器时代同为所謂奴隶社会？”我們覚得这个理由很不充足，因为雷海宗旣然認为"机器时代先为資本主义社会，后为社会主义社会"，那么，为何同为鉄器时代就不能先为奴隶社会，后为封建社会呢？另外，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仅为生产工具所决定？

雷海宗在解釋"生产力"的概念时，給我們的印象是："生产力主要是指生产工具，人的技术經驗只是一个假定数"，因为工具具体，人的技术經驗难于捉摸，尤其是銅器时代和鉄器时代的許多技术經驗，今天知道的很少，所以可以不必过分强調人的作用。我們不知略掉人的作用，仅从工具的发展怎样能說明人类的历史。雷海宗为了略掉生产力中人的因素，还提出"使用石鋸所需要的技术可能比使用鉄鋸还要高的例子以做旁証，我們覚得这个理由也是站不脚的。現在的自动化机器，只要工人一按电鈕就操縱了全部生产过程，这是不是可以說这时的技术比操縱一般机器或比手工生产的技术要低了？技术的高低能不能照雷海宗說的那样去理解呢？

雷海宗在談到奴隶制时，認为"世界历史上并沒有一个奴隶社会阶段"，"在历史上真正的奴隶主国家只能是例外的，不可能形成通例"，理由是"同种同族的人民是不会容許奴役的"。因此"只有在有条件对外人大量进行奴役的地方，奴隶制度才有可能得到发展，而只有海国有此条件，并且只有地中海上的海国有此条件"。这就使我們产生一个疑問：是不是地理环境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沒有奴隶制阶段？另外，我們認为雷海宗提出的銅器时代不能称为奴隶社会、鉄器时代的"所謂希腊奴隶社会的說法，完全出于錯覚"、雅典为典型奴隶社会的說法，也待研究，罗馬的奴隶制在历史上则为例外等說法，也是論据不足。

此外，我們还覚得在这篇文章中，对于許多問題的提法是沒有阶級观念的，例如：（一）"奴隶自外購来，甚为貴重，为自己利益着想，主人对他不会如何虐待的。"（二）"无論在什么时代，农民都是最善于消極抵抗的；統治阶級只要叫他感到不滿，他就会怠工、破坏、故意减产，除了自家糊口外一粒无余。所以农民一般是不能奴役的。"在这兩个例子中，前者只能說是出自推想，沒有任何史实作根据；后者提出"无論在什么时代"，則簡直是含沙射影对我們农民已当家作主的新社会进行誣蔑了。

总之，雷海宗的这篇文章給我們的感覚是，好像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在研究人类历史各阶段的社会性質时，可以不去管阶級关系和所有制关系。我們覚得这类說法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正面攻击，这篇文章是在学术研究名义的掩盖下对馬克思主义射出的一支毒箭！

天津第一中学历史教师　王慶源　高仲君

編輯同志：

看到你刊第七期所載雷海宗的"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一文，感到这是一篇攻击馬克思主义的文章，很多說法是非常荒謬的，例如：

（一）雷海宗說："生产力中人的因素，我們是否可以假定为当然的？是否可以不必在这方面多作文章？"因此他認为历史阶段的划分应以生产工具为依据。旣然如此，那么"生产力"又应如何解釋？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什么？其次，如果以生产工具来划分历史阶段，那么每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又是什么？他把机器时代分为資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兩个阶段，旣然工具相同，又怎样划分出兩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呢？而今天世界上兩大陣营的同时并存又将何以解釋？它們之間的区别又在哪里？

（二）雷海宗說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奴隶社会，他除去依据一部不完整的汉穆拉比法典外，沒有提出其他什么根据，特别是对东方，照他的意思好像甲骨文不足以証明中国有奴隶社会，那么他又何以証明中国古代沒有奴隶社会？

（三）雷海宗說："古今各国土地在法理上一向均为国有。"似乎不曾有过私有制，那么历史上各个阶段对土地的所有制有沒有区别？他又說："在土地所有制問題上，实际上并沒有多少文章可作。关鍵問題为如何剝削，剝削多少，剝削后如何使用。"这就更奇怪了，旣不談所有制，剝削又从何而来？

像这类荒謬而又无法自圓其說的說法，在雷海宗的文章中是很多的。他以前曾說馬克思主义六十二年来沒有发展；他的这一篇文章，我感到是他以前那种謬論的繼續，是公然更进一步否定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論。这不是一篇什么学术論文，而是一篇非常恶毒的反馬克思主义的反动文章。

天津第十六中学历史教师　唐世珍

專訊

天津科学界
對披着史學家外衣的右派分子雷海宗展开斗爭

天津科联委員会与各專門学会（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各学会）在八月十三日至十七日举行了联席扩大会議，批判民盟中央科学规划問題临时小組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綱領和天津市科学技术界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会議上由天津科联主任委員、南开大学校長楊石先傳达了全国科联第一屆全国委員会第二次扩大会議的精神和会議上反右派斗爭的情况，以及聶榮臻副总理的指示和郭沫若院長的講話。他在傳达郭沫若院長的講話中指出：郭院長在講話中对种种誣蔑馬克思主义的謬論进行了系統的駁斥，其中他特别批判了雷海宗（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所謂“馬克思主义学說从 1895 年以后就沒有发展，停頓了”的謬論。他指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胡說八道。郭院長举出了列宁关于在一个国家取得无产阶級革命胜利的学說、十月革命以后在經济学上的发展、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等作为例証，有力地駁斥了雷海宗的謬論。他說，科学家是实事求是的，要根据事实求得正确的答案。这样不符合事实的胡說八道，算是什么科学家！

在这次会議上，天津市的科学家們一致表示坚决拥护郭沫若院長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駁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科学綱領的发言，并集中地对天津科学界右派分子王华棠（天津科联副主任委員）、楊济时（中华医学会天津分会理事）和雷海宗（史学会天津分会副理事長）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爭，各社会科学学会的同志在大会发言和分組座談会的发言中，更着重地批判了披着史学家外衣的右派分子雷海宗的反动言行。

中国史学会天津分会副理事長、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吳廷璆在发言中着重批駁了雷海宗的“馬克思主义从 1895 年以后就停止发展”的謬論。他指出，雷海宗在本年四月間中共天津市委召开的宣傳工作会議和人民日报召开的座談会上，連續放出了这一反动謬論，从时間上、性質上看，可以說是配合費孝通“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气”那篇惡毒的文章，成了为資产阶級右派反党、反馬克思主义的猖狂进攻而发出的兩顆信号彈。吳廷璆指出，有些右派分子用这一謬論作为反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到处叫囂，有些右派分子为所謂“雷海宗推翻了馬克思主义”而鼓掌，有些学者还为雷海宗作辯护。因此，雷海宗的謬論已起了極惡劣的作用。

吳廷璆在列举許多事实說明了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的不断发展以后，对雷海宗提出質問說：“雷海宗不顧一切鉄的事实，武断地說：‘馬克思主义在 1895 年以后沒有发展’，目的豈不是在否認馬克思主义发展的列宁阶段，否認毛主席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发展，否認 1895 年以来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否認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否認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業的成就嗎？”

吳廷璆揭露雷海宗的陰謀說，雷海宗是在学术的幌子下，蓄意誣蔑馬克思主义停止发展，誣蔑社会主义陣营的科学“薄弱”、“貧乏”，吹噓資产主义陣营科学的“发展”、“丰富”，妄圖資产阶級社会科学的复辟。吳廷璆着重指出，資产阶級的社会科学如果不从根本上予以徹底的批判，而听其傳播和发展，并占了上風的話，那就会使得社会主义的生产資料所有制有归于失敗的危險，就会有資本主义复活的危險。他最后說，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要勇敢地投入反右派斗爭，捍衛馬克思列宁主义，捍衛社会主义和我們的科学事業。

天津市經济学会理事長、南开大学經济系主任季陶达說：“雷海宗提出的‘馬列主义停留在 1895 年’的謬論，不仅是錯誤的，而且是反动的，这突出地表現在：他曾說如果在恩格斯去世以后所发現的历史資料，馬克思和恩格斯有机会看到，可能会改变他們原来的結論。在这里雷海宗以科学研究、重視資料为名，散布怀疑論，实質上則要根本否定馬列主义。”

季陶达說：“我們知道，馬列主义是党的理論基础，雷海宗从这方面向党进攻，其用心是很明显的。同时，雷海宗又在积極宣揚資产阶級社会科学，妄圖恢复資产阶級的社会科学，从而为資本主义复辟造成条件，他的反动性質是和民盟中央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綱領一样，而手法則更为陰險。雷海宗是披着‘学术’的外衣，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我們要剝下他的外衣，对他进行无情的批判、駁斥和斗爭。”

中国哲学会天津分会名誉理事長馮文潛也在会上指出，雷海宗說什么馬克思主义“停頓”了，不“发展”了，这并不是什么新鮮的提法，不过是馬克思主

义的敌人常用的慣技之一而已。馮文潛指出，雷海宗在他致人民日报的信里，表面上仿佛認为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有兩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总結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經驗，另一方面是总結人类全部历史过程中的經驗。雷海宗說前者有很大发展，而后者沒有发展。馮文潛問道："难道工人运动的經驗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經驗，就不是人类全部历史进程中經驗的一部分？"馮文潛說："在資产阶級历史学者所写的历史中，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級專政、列宁、斯大林、毛澤东都是沒有任何地位的。"馮文潛指出，在我們看来，无产阶級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紀元，消灭在世界上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人剝削人的制度、变私有制为公有制，这正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事情。但是，雷海宗竟將它一笔勾銷。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論——列宁、斯大林、毛澤东的著作，各国共产党的經驗等等，在雷海宗看来，这都不是科学。馮文潛說：如果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論根本不是科学的話，那我們还有什么話可說呢？那我們所建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切都是盲目的冲动，都是瞎胡鬧？这也許就是雷海宗所要得出的結論吧！也許就是他提出这些荒謬理論的眞实企圖吧！

馮文潛說："过去，我也曾經怀疑过，为什么在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那时候根本談不到发展学术，眞正的学者不是因为堅持眞理而受到迫害，就是因貧病交迫不能研究——从未听到雷海宗在那里嚷政府不重視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太落后，学术傳統有中断的危險；而偏在科学有无限发展前途的今天，却大嚷大叫說党和政府对社会科学'太不重視了'，'学术傳統要中断'，'社会科学太落后'等等呢？現在我明白了，雷海宗所說的社会科学，不是指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論——即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正因为他站在这样一个立場，他才会大嚷大叫，感到很不舒服，才会对馬列主义做出那样的惡毒的誣蔑。我要正告雷海宗，在我們的国家里，資产阶級社会科学的傳統当然要中断，当然不会受到重視，当然不能复辟。你所留恋的社会制度以及为这个制度辯护的科学是一去不复返了。"馮文潛最后正告雷海宗說："还是正視历史的現实吧，历史是不留情面的。不然，尽管你是一个历史学家，也將为历史所唾弃。"

天津史学会副理事長、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王仁忱在批判雷海宗的謬論时指出：雷海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言論和在"历史教学"七月号上发表的"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那篇文章，是徹头徹尾的右派言論，是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言論，是向党向社会主义的惡毒进攻。雷海宗在"历史教学"上发表的那篇文章里用生产工具发展史代替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史，他把人的作用抛开不談，企圖进而抹煞生产关系，以否定阶級关系和阶級斗爭。很明显，这是在討論学术問題的幌子下对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論的惡意歪曲和攻击，因此这并不是学术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是雷海宗向党、向社会主义的惡毒进攻。

天津語言学会副理事長、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副院長朱星在发言中指出，雷海宗披着一个学者的画皮，在报紙上和"历史教学"刊物上发表有系統的惡毒言論，目的就是从理論上推翻馬克思列宁主义，进而推翻人民政权。朱星接着揭露雷海宗一貫反动的面目：雷海宗在解放以前就投靠反动头子朱家驊，在"战国策"、"当代評論"、"每周評論"、"中央日报"等反动刊物上先后約写一百多篇文章，宣傳法西斯主义，叫嚣反共、反苏，內容十分惡毒。解放后，当高等学校师生批判胡适反动的实用主义时，他又一再为胡适辯解。朱星接着指出，雷海宗是讀过一些馬列主义書籍的，但他是站在反动立場为实現其打倒馬克思主义的反动陰謀而讀的。所以，雷海宗一系列的反动言行說明他并不是学术思想問題或由于学習馬克思列宁主义不够而"說錯了話"，雷海宗进行的是極其隱蔽、毒辣的反动政治活动。

在最后一次会議上，史学会天津分会理事長、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天挺說："我是学历史的，也是雷海宗的老朋友，为了捍衛馬列主义，为了捍衛社会主义，为了捍衛党的領导，必須与雷海宗展开无情的斗爭。雷海宗所謂'馬克思主义停滞在1895年'，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是胡說八道。"郑天挺并举出許多事实說明了这一点，接着指出，雷海宗这种說法，显然是为了否認自列宁以来世界无产阶級革命运动的偉大成就，否認自列宁以来对于馬克思主义理論发展的偉大貢献，这不是向馬列主义进攻是什么？这明明是企圖推翻馬列主义。最后，郑天挺并号召南开大学历史系和史学会的全体同志向雷海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堅決的斗爭。

会議除上面的批判揭露的发言之外，还有許多同志在发言中指出，雷海宗是一个披着学者外衣、打着学术幌子的右派分子，他所发表的謬論并不是什么学术問題，也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而是陰謀販賣資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陈腐透頂的反苏、反共、反馬克思主义的无恥讕言，是向党、向社会主义的惡毒进攻。会議要他徹底地交代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論和行动，向人民低头認罪，悔过自新，否則，就必將自絕于人民，自食其惡果。（剛）

教学参考

明代治河和通漕的关系

方 楫

一

明初，黄河下游的河道，大致維持着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改道后的原样，在今河南、封邱、蘭考間分成兩大支流：南流往蘭考、商邱，流向今江苏碭山东南，侵夺泗淮水道，由徐州、宿迁、淮陽、漣水轉向东北入海。这是黄河的主流。北流会合北清河（济水故道，亦即今黄河），經今山东濮县、济南，在利津东北入海。黄河北流的地势比較平衍，河水在封邱东南的銅瓦廂形成一大弯曲，趋势很自然地奔向北支的河道。这是当时黄河在不稳定的狀态中的流經情况。

黄河所以不稳定，常常决口、改道，主要原因是在封建統治下，上中游遭到人为的破坏，森林草地变成赤野，水土流失的現象严重，大量泥沙淤积在下游河床間。此外，治河規划以服从統治者利益为前提，不顧地形水势，强阻强导，造成了水道紊乱，水灾严重的局面。宋代要保全汴渠，治河意見紛歧。任伯雨說：“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狗众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势以从人者，莫甚于近世。”①元代为溝通漕运，开会通河（自济宁起，經东平、聊城，以达临清），竭力約束住黄水，使南流入淮，生怕北流水旺后，侵塞了会通河运道。就是“大河东（指主流向北）則会通河廢；会通河不廢，則大河不可得而东。兩者不并立矣。此大河所以屢决而东，終抑之使南也与。”②

为了保全漕运，自宋至清，相沿用强制方法“抑之使南”。在封建集团長期壟断下，这种消極有害的治河思想，一直占着优势。愈是强抑，人民愈是受苛扰，地方愈是受糜爛。黄河在历史上成为灾害，这便是主要原因之一。在明代，这种情况表現得很突出。

明代治河是在沿襲元代旧規而加以发展的，保全漕运成为治河的最高原則之一。所謂保全漕运，就是指的維护会通河航道的暢通。会通河是大运河的主要航段，因地形較高，水源枯啬，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就采用“引汶絕济”的方法开会通河，設置船閘，分段儲水，用来維持漕运。終因“岸狹水淺，不任重載”，使用价值不高。特别是在东平西北的安山，会通河穿过黄河，最易受到黄水的浸漫，滾滾濁流，挟帶大量泥沙，一經冲入，这段运道就被淤塡，并且还要扰乱接济会通河水源的汶河等水系。“会通河之源，以南为逆，以北为順。……然河之源，其最微者莫若会通，黄水冲之，則随他奔而潰不行。”③就是說要想保持漕运暢通，关鍵就在于維护会通河的航道，使不受黄河的侵扰。

从洪武与永乐年間表現兩种截然不同的治河态度，就可以淸楚地看出明王朝的治河方針是在服从漕运利益的前提下而决定的。

洪武时，明王朝对恢复和发展农業生产曾做了不少工作，起了相当积極的作用。在农田水利方面，“二十八年（1395）奏开天下郡县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塘岸五千四十八处。”④但对黄河灾害，却完全采取消極态度。朱元璋御制“黄河逑”中說：“（黄河）至于平原曠野，則东蕩西捐，使桑田变迁，水势少慢，亦宜其然矣。”把黄河氾濫，說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黄河多次决口，从未进行过像样的疏筑工程，只在局部灾区挑修部分隄岸，一般却用賑济、蠲賦等方式敷衍一

① 宋史，卷93河渠志。
② 顧一柔：山居賛論。
③ 行水金鑑，卷105运河水，引河程記。
④ 顧炎武：日知录，卷12水利条。

下。洪武十四年（1381）河决原武、祥符等地，“有司以为言。上曰：此天灾也。今欲塞之，恐劳民力。”①反映了对黄河灾害的消極放任思想。

会通河呈現癱瘓狀态，大运河只能局部通航，黄河决口，使会通河的阻塞情况更見严重，但洪武时对它根本弃置不用，所以宋、元代“屈大河之势以从人”、“抑之使南”这些治河主張，在明初就沒有提到日程上来。明王朝由江南輸送到北方的軍粮，全部用海运。“中書省符下山东行省，募水工发萊州洋海倉，餉永平衛。其后海运餉北平、辽东为定制。”②

“洪武二十四年（1391）河决原武县黑陽山，由旧曹州鄆城县兩河口，漫过安山湖，而会通淤淤。”③这次黄河决口成了会通河的致命伤，就此完全淤塞起来；不仅如此，黄水得不到适当的宣泄，年年釀成水灾，从开封起，南至商水、項城和今安徽西北部；西南至虞城、夏邑和今山东西南部，都受到黄水的蹂躪。渦河、潁河、濉河等水道都受到干扰和破坏。明王朝对待这样沉重的水患，仍采取放任的态度。

永乐四年（1406）开始用“陆海兼运”的方法来供应北方的軍粮，即一面由江南海运至天津；另一面“由淮入黄河至陽武，陆运至衛輝，仍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④这种利用水陆轉运的方法，就是要繞过已經淤塞的会通河。从永乐元年至八年（1403—1410）黄河年年氾濫就未曾积極治理过。朱棣迁都北京，政治中心北移，并数度向塞外用兵，但北方韃靼部的威胁迄未削减，軍糈等需要量从年額二百五十万石增至三百万石有奇，其中一部分用水陆轉运方法北运。陆运一段，历程一百七十里，設置了八处遞运所，經常用民工二万四千人、粮車一千六百輛担任运輸，运费消耗很大，还不能保証如期和如数运到。在“四裔北边为急，倏来倏去，边备須严”的情况下⑤，就重新考虑了南北运輸的問題，作出打通大运河的决定。永乐九年（1411）由宋礼、金純、周長等負責董工，开始了疏濬会通河的工程，修筑堽城和戴村坝，导引汶河，接济水源，在南旺（汶上县西南三十五里）“分水脊”处，“分之为二道，南流接徐、沛者十之四，北流达临清者十之六。”⑥会通河在挖除淤泥、增加水源后，南北漕运溝通了。这番工程“役軍夫三十万，用工十旬”，可算是明代初期在水利方面所进行的一次規模很大的工程。

就在开濬会通河的时候，因上一年黄河在开封决口，冲潰城垣二百余丈，“民被患者万千余戶，沒田七千五百余頃。”問題不仅如此，黄水漫溢，对会通河有着严重的影响和威胁，于是在保障运道的要求下，明王朝决定治河，招集民工十万人，由宋礼兼督河工。“九年七月，河复故道。自封邱金龙口下魚台塌場，会汶水經徐、吕二洪，南入于淮。是时会通河已开，黄河与之合，漕道大通，遂罢海运。”⑦这次治河是明代挽黄保运的濫觴，后来治河官員常以师法宋礼云云，便是消極治河、积極保运的思想反映。

具体說来，这次治河工程是堵塞住黄河从封邱向东北流的决口，約束河水流出金龙口（后改名叫荊隆口），向东南流，經过魚台的塌場（即元代賈魯河的故道），黄水便被用来接济昭陽等湖的水源，以增强会通河的水量。黄河南支主流由徐州东南的徐州洪、吕梁洪注入淮河。明代治河总方針由此确定下来，“挽黄保运”成为明代治河的金圭玉臬。“然前代河决，不过坏民田廬而已；我朝河决，則虑并妨漕运，而关系国計，故治河視前代为尤急。”⑧

会通河开成，“自济宁至临清三百八十五里，漕舟始达于通州。”⑨南粮北运的情况完全改观，运輸率获得显著的提高，“朝廷議罢海运，仍以（陈）瑄董漕运，議造淺船二千余艘。初运二百万石，寖至五百万石，国用以饒。”⑩

此后，明王朝就花費很大力量来进行大运河的扩建、保养工作。如在淮安开鑿清江浦；修整徐州、吕梁二洪的水道；以及陆續在大运河上增置坝閘，修筑隄岸等。

大运河全綫通航，为南北物資交流創造了便利的条件，在农業、手工業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經济逐步欣欣向荣，粮船由北返南，就载运貨物到各地銷售。宣德四年（1429）开始，在相当的交通口道設立鈔关，收取“船料”（商税）。“舟船受雇装載者，計所載料多寡、路远近納鈔，于是有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揚州、南京上新河鈔关，量舟大小修广而差其額，謂之船料。每船百料，納鈔百貫。”⑪从中可以看到在运道暢通后，与之俱来的經济活躍、市場扩大的新景象。

---

① 明太祖实录，卷138。

② 明史，卷79食貨志，漕运；卷86河渠志，海运。

③ 明会典，卷196河渠一。

④ 明史紀事本末，卷24河漕轉运。

⑤ 章潢：圖書編，卷32論北京帝都垣局。

⑥ 明史，卷85河渠志，运河上；卷153宋礼傳。

⑦ 明史，卷83河渠志，黄河上。

⑧ 行水金鑑，卷19河水，引續文献通考。

⑨ 皇市录：皇明紀略。

⑩ 明史，卷153陈瑄傳。

⑪ 續文献通考，卷18征榷一。

二

明朝統治者所重視的是漕运，对于黄河灾害所加給人民的疾苦却漠不关心。永乐九年河复故道以后，河南地区連年发生决口。正統十三年（1448）河决滎陽，南支經蒙城至淮远境入淮；北支由开封西南經荷澤、濮县，冲毁張秋（在东阿西南六十里，与寿張、陽穀接界。明代曾改名曰安平鎮）、沙湾（在張秋南十二里）等隄，会通河又受到淤塞，漕运中断。在瓦剌部入侵，軍粮供应緊張时期，急需堵塞决口，恢复漕运，但工程进行很緩慢，好几次都是徒劳无功，以至有人主張"弃渠勿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①到景泰七年（1456）"（徐）有貞乃修旧隄决口，自临淸抵济宁，各置减水閘，水患悉平。"②这样治河是很不徹底的，只是为了維持漕运，暫时使黄水就范而已。

在維持漕运方面，南粮北运的数量得到稳定。成化七年（1471）"河漕以南以四百万供京师；河淮以北，八百万供边境。別貯額外米于临德，曰預备米，以备漕米之拔补也。"③这是当时所特别关心的"国本"，是維持明王朝統治的生命綫。明代不遺余力的保全运道，关鍵也就在此。这是問題的一面。

問題的另一面，是消極治河、积極保运，使黄河灾害得不到根本的解决，黄河潰决的事故接踵发生。弘治二年（1489）黄河在中牟、封邱、蘭陽三处决口，漫溢的范圍很广，主流又复归北道，滾滾黄水由曹县、濮县直冲入張秋运河。白昂主持治河工作，修陽武、封邱等县長隄，保护張秋一段的漕运；疏濬汴、濉等河道，使黄水由泗入淮，导向南流。这次工程被称作"东北分治，东南注疏，"实则就是沿襲"挽黄保运"的老路，用强抑的方法把黄河主流导向东南。其实白昂是了解黄河形势的，他写道："見其上源决口，水入南岸者十之三，入北岸者十之七。"④但他在工程实踐中，却要强抑强导。其后果是使河南的水道受到阻遏，常常氾濫成灾；如一遇河水潰决，北流洶涌，山东地区又要遭到水患。这便是"金龙之决，山东以为憂，而河南虑其塞。"⑤甚至"河南之民不欲黄河入境，但見山东委官往彼增筑賈魯隄，即謀欲杀之。"⑥这样在治河規划中，常常引起山东和河南之間的激烈爭論和冲突，加深了阶級間和地方間的矛盾。

兩年后，黄河連續在蘭陽、金龙口、張秋决口，大运河再次淤淺。朱祐樘提醒他的臣属道："朕念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运道，致誤国計，其所关系，譏非細故。"⑦受命治河的刘大夏就完全依照这一指示办事。他研究了"河南、山东兩直隶地方，西南高阜，东北低下，黄河大势，日漸东注，究其下流，俱妨运道。"⑧于弘治六年（1493）堵塞决口，筑成長三百六十里的太行隄，由胙城起，經滑县、長垣、东明、曹县、單县，以达徐州，用来阻擋北流；又塞断黄陵岡（今蘭考东，当时系太行隄的險工地帶），兩度堵复張秋决口。工程完毕后，黄水南流，"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盖自大伾（山名，在濬县东南）以东，古兗、徐、靑、揚四州之域，皆其縱橫糜爛之区矣。"⑨这就是这次治河的后果；虽然，漕运是勉强恢复了。

弘治、正德时期，土地兼并剧烈，农民大量破产，在治河通漕的名目下，更加重了工役的負担。修筑太行隄就迫使軍民十二万人参加。正德元年（1506）統計，列入經常編制的河夫，即达五万八千七百多名。沉重的工役，加上水灾內涝，苛捐杂税，人民生活陷入絕境。在正德六年（1511），刘六、刘七領导的农民起义軍扩展至山东境內，就有很多人参与起义軍的行列中，拘留漕运船只，"以致国賦亏損，貨物踴貴，今日势未可計日乎。"⑩可見在交通大动脈的漕运被扼制住后，就使明王朝的經济危机立見加剧。

这以后的十年中，黄河又擺脱人为的控制，日漸北徙，豫、皖、苏、魯等地水灾連年，会通河又告淤塞。这是明王朝統治危机表現在水利方面的一种情況。

三

自黄陵岡筑隄后，南流的黄河分成六支，其中五支逐漸淤塞，仅有沛县南飞云桥的一支成为唯一的水道，丰县、沛县、肖县、徐州就直当黄河的冲要，每遇决口，受灾最是严重。明朝統治集团中，对于治河，在保运的前提下，也有人提出局部改良的意見。嘉靖初，吳一鵬就建議疏濬渦、濉等河，以分杀水势。章拯曾建議堵塞这一地区的支流决口，筑隄障水，講求疏濬之法，使入正河，免致旁溢。这些合本

① 明史紀事本末，卷34河决之患。
② 明史，卷171徐有貞傳。
③ 明史紀事本末，卷24河漕轉运。
④ 行水金鑑，卷20河水，引明孝宗实录。
⑤ 行水金鑑，卷20河水，引康济論。
⑥ 行水金鑑，卷21河水，引明孝宗实录。
⑦ 行水金鑑，卷20河水，引明孝宗实录。
⑧ 行水金鑑，卷20河水，引北河續記。
⑨ 胡渭：禹貢錐指，卷13。
⑩ 行水金鑑，卷112运河水，引明武宗实录。

求末的主張，結果也不能实行。直到嘉靖六年(1527)黄河水奔涌入运，粮船三千余艘不能前进，統治者才慌乱起来，研究对策。这样因循三年，并沒有什么結果。等到黄河在曹县决口，分三支入淮，其中一支由归德（今商邱）至徐州，飞云桥的水道淤塞，漕运才又溝通。

这一时期，保运的主張占了絕对优势，强抑黄河主流向南的有害治河思想，得到显著发展。以朱裳、郭秉聰为代表，就这样說："黄河自古为患，惟我朝則借之以济运渠之利，故今之治河与古不同：古也專除其害，今也兼資其利；古也导之北，以順夫就下之性；今也导之南，以避其冲决之虞。"①这种見解，流毒很深，黄河、大运河交会的广大地区，便进一步受到洪水横流的威胁。

嘉靖十三年（1534）自济宁至徐、沛，数百里运道又告淤塞。刘天和主持治河工作，采用消極办法，以"濬淤修閘"为主，分段挑濬运道，修筑隄岸，抽調十四万民夫从事繁重的劳动，才使漕运通复。这种單純治标的工程措施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不久，河决野鷄岡（今睢县北），由渦河經亳县入淮。对明朝統治者来講，发生了兩項新的情况：一是作为調剂运河水量的徐州、呂梁二洪乾涸了，妨碍漕运；另一是黄河水冲向渦河，明祖陵所在地的鳳陽受到浸淹的威胁。保漕运加上护祖陵就成为这一时期治河的兩項目标。嘉靖二十一年（1542）又一次用强抑的方法，在野鷄岡上游开鑿李、万、高等三口，导河东注，既維持徐、呂二洪的水源，又保証了祖陵的安全，完全符合了統治者的利益。这种局面是暫时的，洶涌的黄水得不到适当的河道宣洩，支流散漫，又受着东阻西遏，在許多地方伏下横流的危机。

嘉靖四十四年（1565）河决沛县等处，支流分股东南流，漫进昭陽湖，运河淤塞百余里。朱衡建議在昭陽湖东岸改鑿新运河，从南陽（济宁西南）至留城（沛县东南），用来避讓黄河的冲塞，保持漕运。朱厚熜同意这种消極保运的做法，命朱衡、潘季馴主持这一工程。"乃接六年所鑿故迹，役夫濬之，为南陽新河。"②

这一时期，西北俺答部侵扰不已，严重威胁着北边的安全。明朝統治者对于黄河水灾可以坐視不問，但对于保全运道却認作是关系国家命脈的大事，如果漕运阻断，"京师歲收四百万之粮，何由可达？官軍数百万之众，何所仰給？此則可憂之甚者也。"在統治集团中，一直把保运奉作治河的最高准則；任凭黄水汜濫，以至促使黄水汜濫，成为寻常的事。只要保运，犧牲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是毫不顧惜的。

在"保运第一"的原則指导下，出現了种种消極治河的主張，这是明朝統治集团腐朽沒落的反映。其中有的主張"分疏"；有的主張"塞决"；有的主張"隄障"。把眼光只停留在开封至徐州間的局部地区。更有借河工舞弊营私，把治河作为升官发财捷徑的。这便是："庙堂之議，既視其夺者以为常；司水之臣，又乘其决者以为利。……聞之先达言，天啓以前，无人不利于河决者；侵尅金錢，自总河以至閘官，无所不利；支領工食，自执事以至于游閒无食之人，无所不利。其不利者，独業主耳。"③

明王朝錯誤的治河措施，給广大地区帶来沉重灾害；但从通濬大运河本身来看，也发生过一定的积極作用。在漕运暢通期間，南北貨物販运頻繁，对促进商品經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如前所述，年額四百万石的粮食都从大运河北运，粮船絡繹于途。"讀史方輿紀要"的"漕运圖說"所附統計表中，嘉靖一年（1522）儹运粮即达五百万石。在实施兌运中，"而軍士或自載土产，以易薪米。……天順以后，定船万一千七百七十，官軍十二万人，許令附載土宜，免征稅鈔。"④粮船附載商品，加强了物資交流，扩大了商品交易的范圍。

在漕运活躍的同时，兩淮的食盐也大量由水路轉运。"于天下設都轉运使司者六，而兩淮居其一，歲課百二十余万，几与漕运米值等。"⑤

为保証漕运的需要，便大量造船，許多造船工業基地随之兴旺起来。如清江、安庆、苏州、九江、武昌等地都有船厂，其中清江厂供"南京总二"（系軍队組織，下分衛所，負責漕运。下同。）粮船一千七百五十九艘，供"中都总"粮船八百八十七艘，供"江北总二"粮船二千六百八十七艘，供"遮洋总"粮船五百二十五艘⑥。这些船厂聚集了很多的工匠，置办了很多的設备器材，从事大规模的生产，虽系官营性質，但必然地会給私人手工業作坊树立了技术分工的榜样，并发生一定的刺激和关联的作用。

商業繁荣，在沿大运河一綫新兴起許多工商業城市。总的情况是："京师以南，河南当天下之中，开封其都会也。北下衛彰达京圻，东沿汴泗轉江淮；車馬之交，达于四方，商賈乐聚，地饒漆絺、枲紵、纖

---

① 行水金鑑，卷23河水，引明世宗实录。

② 明会典，卷196河渠一。

③ 顧炎武：日知录，卷12河渠条。

④ 明史，卷79食貨志，漕运。

⑤ 天下郡国利病書，卷28江南十六。

⑥ 讀史方輿紀要，輿圖要覽，卷4漕运圖說。

練、錫蜡、皮張。”①个別城市的情況是：“仪眞（征）而江背淮，为一都会。凡南京供应，江西、川、广、云、貴等处粮貨及外海諸番貢献，悉从江車坝入淮，以达京师。”②因交通便捷，其他城市也在不断地发展中，出現了“（济宁州）济当要害之冲，江淮百貨走集，多賈販，民竞刀錐，趋末者众，然率奔走衣食于市者也。……（临清州）舟車毕集，貨財萃止。……而服賈之民恒居什之六七。”③这都是依靠大运河而繁荣起来的城市，是当时商業发达的明証。这对于資本主义的萌芽，具有很大的輔助作用。

四

明代杰出的治河專家潘季馴于隆庆四年（1570）第二次担任治河工作。这时，河决邳县、睢宁，南北兩岸决口十多处，苏魯境內水道凌乱不堪，运道淤塞，水灾严重。治河官員中的保运派智穷力竭，才由潘季馴出来收拾残局。

潘季馴亲自勘察河道后，制定和实施了他的治河計划：恢复新集（商邱西北）至小浮桥（肖县东北）的黃河故道，杜塞支流，挽正流冲刷河身，使徐州以下的河流暢通，使溝通运道的秦溝（沛县南）和茶城河（利国驛西南）不致淤塞，更使曹县、商邱、單县、丰县、沛县等广大地区免除水患。这次施工的特点，是从整理决口处的一段上游着手，不是只在决口地方剜肉补瘡；又在筑隄和堵决方面，加添了积極的內容，不單是束水就范，还設法利用急溢的水力来冲刷泥沙；尤其是工程規划上，旣要求疏通运道，又考虑到使人民“得以安居”和“永无昏墊”。

万歷三年（1575）河决桃源（今泗陽西南）的崔鎮，淮决高家堰（今淮陰西南），“淮、揚、高郵、宝应間皆为巨浸。”保运派中舒鰲等說，应疏濬海口，打开通路。傅希摯說，当塞高郵决口，其余决口留作洩水之路。都是“以运道为急，不以淮泗为念的片面主張”。这样迁延三年，还是沒有解决的办法。潘季馴在这时第三次担任治河，他又和保运派进行爭辯，駁斥了疏濬海口等謬說，坚持“民生、运道兩便”的主張。他在工程規划中指出：“筑崔鎮以塞决口，筑遙隄以防潰决。又淮清河濁，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則居其八，非極湍急，必至停滯；当借淮之淸以刷河之濁，筑高堰束淮入淸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則海口自濬。”④

这一次治河工程的規模很大，潘季馴的“兩河經略疏”就記下了全部的內容。主要的是修筑黃河兩岸的遙隄：北岸遙隄自徐州至邳县，又自宿迁至淸河；南岸遙隄自徐州至宿迁。又在睢县、宿迁、泗陽境內筑归仁隄，用来束水攻沙，并阻止南侵；修筑六十余里長的高家堰，用来蓄淸刷黃。此外还堵塞崔鎮等决口一百三十多处，修建崔鎮等減水石坝四座，并相应地筑了許多新隄和修了許多旧隄。这次工程宣告完成后，它的成就是“一歲之間，兩河归正，沙刷水深，海口大辟，田廬尽复，流移归業，禾黍頗登，国計无阻，而民生亦有賴矣。”⑤这样，黃淮地区出現了新的面貌，安流了五、六年。常居敬在“查理河漕疏”中說：“創筑遙隄，尽塞諸决，兩河复合，沙刷水深，运道民生均有裨益，徐邳以下，河道賴之。虽先后河臣經略良画，尙不止此，此其功之最著者也。”⑥

潘季馴第四次治河在万歷十五年（1587）。这时河决开封、銅瓦廂、封邱、原武等地。潘季馴繼續貫徹以往行之有效的办法，修筑隄坝，束水刷沙。三年中，筑了徐州塔山的縷隄以束水；堵塞張福口（桃源东南），充实淸口一帶旧隄，以加强洪澤湖刷黃的作用；在上游自武陟至虞城、在中游自丰县至淮陰，都筑起長隄，又筑丰、沛、徐的遙隄、縷隄和其他許多隄坝。这次工程同样获得很大的效果。

潘季馴治河能够替人民着想，免除昏墊之苦。这种見解在封建社会中，特別是在“保运第一”占压倒优势的环境中，是难能可貴的。他在恢复漕运的同时，从維护人民的利益出发，勤恳办事，获得了优异的成績，主要是他肯接近人民，了解人民的疾苦，得到人民的支持。劳动人民創造的隄防、坝閘、涵洞等，經他研究后，得到合理的使用，对于工程規格和質量都有了提高，尤其是隄防的作用得到重要的发展，就是他倡导的“筑隄束水，借水攻沙”之說，有創造性地制定了新的治河原則。“蓄淸刷黃”也是这一原則的另一种运用方式（他創筑的縷隄、遙隄是束水防决的一种手段）。实施这种原則，比較有效的解决黃河的淤沙問題，旣減輕了河患，又保証了漕运，获得显著的功效：“兩河合軌后，数万艘轉运无阻，緣河之民，始复見室廬邱隴，烟火弥望焉。”⑦

潘季馴治河虽然还局限在黃河的下游，但他的工程規划是比較总攬全局的。他說：“通漕于河，則治河即所以治漕；会河于淮，則治淮即所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于海，則治河、淮即所以治海。”⑧潘

---

① 張瀚：松窗夢語卷四。
② 天下郡国利病書，卷29江南十七。
③ 山东通志，卷40疆域志三，風俗。
④ 明史，卷223潘季馴傳。
⑤ 河防一覽，河工告成疏。
⑥ 行水金鑑，卷125運河水，引查理河漕疏。
⑦、⑧ 王錫爵：印川潘公墓志。

季馴治河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他在实践中获得的治河經驗，詳載在“河防一覽”中，直到清代，長期地被看作是治河中的主要指导原則和工程依据。

五

明代自万曆以后，封建政权更趋腐敗，統治者的生活穷奢極侈，接济边軍的“年例”銀逐年增加，便向人民进行瘋狂的掠夺，矿监税使四出，横行勒索，社会矛盾表現非常尖銳。在这种情况下，黄河灾害更趋严重，統治者面对这一現实，表現了畏縮昏憤的态度。如楊一魁甚至主張放縱洪水：“今若空碭山一邑之地，……任水游蕩，以不治治之。”①

統治集团中有河南、山东、南直等分派，各为本身利益，冲突很激烈。他們从推水过界、以鄰为壑的观点出发，意見紛歧，治河規划常常得不出結論。治河官員又分立門戶，时生傾軋，把治河作为党爭的工具。

万曆十九年（1591）后的数年中，淮水常常氾濫，“溺人无算，浸及祖陵”。明王朝只好傾力进行治理，采取“分黄导淮”的措施，仅在万曆二十三年（1595）一年中，“括帑五十万，役夫二十万，分黄导淮。”②施工后，影响所及，大运河又告淤淺。万曆二十五年（1597）“漕河乾涸，自桃、宿而上，至鎮口，黄几断流，三尺童子可攝衣而渡，粮船膠澀不前。”③这时，有些人对治河保运根本失却信心，主張放弃大运河，恢复海运。如于仕廉曾建議从登州运軍餉至旅順口。程守訓曾建議由淮安轉道海口，运粮至天津。

大运河至此又呈現半癱瘓狀态。“临清以北，河流甚細，此一万二百七十有余之艘，相与爭一綫之水而不能速进之故也。”其后果就是：“三輔內地，所在告荒，太倉之米，不支一年，至于銀倉庫罄竭如扫，倘有脫巾而呼者，何以弭之？”④运道阻滞，銀粮支絀，农民起义有一触即发之势，明朝統治者的憂心如焚是很自然的。明王朝將田賦大量征折現銀，漕政荒廢，”“淮徐二倉无粒米。”万曆三十年（1602）“漕运抵京仅百三十八万余石。……京倉見存米仅四百四十余万石，不足以支兩載。蓋灾伤、折銀，本折漕粮以抵京軍月俸，其时混支以給边餉，遂至銀米兩空，倉儲漸匱，漕政益弛矣。”⑤

万曆三十一年（1603）左右，黄河决口仍在丰、單、肖、宿一帶，在保运和护陵的要求下，李化龙指出要加倍防护河南隄段的險工处所，因为荊隆口、銅瓦廂是入張秋之路，关系着运河的通塞；孙家渡、野鷄岡是入淮之路，关系着祖陵的安危。曹时聘也有相同的看法，建議疏濬小浮桥的水道。問題在于工程浩大，需銀八十万兩。由于明朝皇室权貴无限制的揮霍，統治机構进一步腐化，边患連年，軍餉支出很大，財政發生严重困难。本来田賦加征“辽餉”，天啓初又有关税、盐課及杂項的加派，年額七百五十余万兩，超过通常歲收总額的一半。在財政拮据的情况下，河工費用仍以加重对人民的剝削来解决，如丹陽湖田，就指定計亩加价助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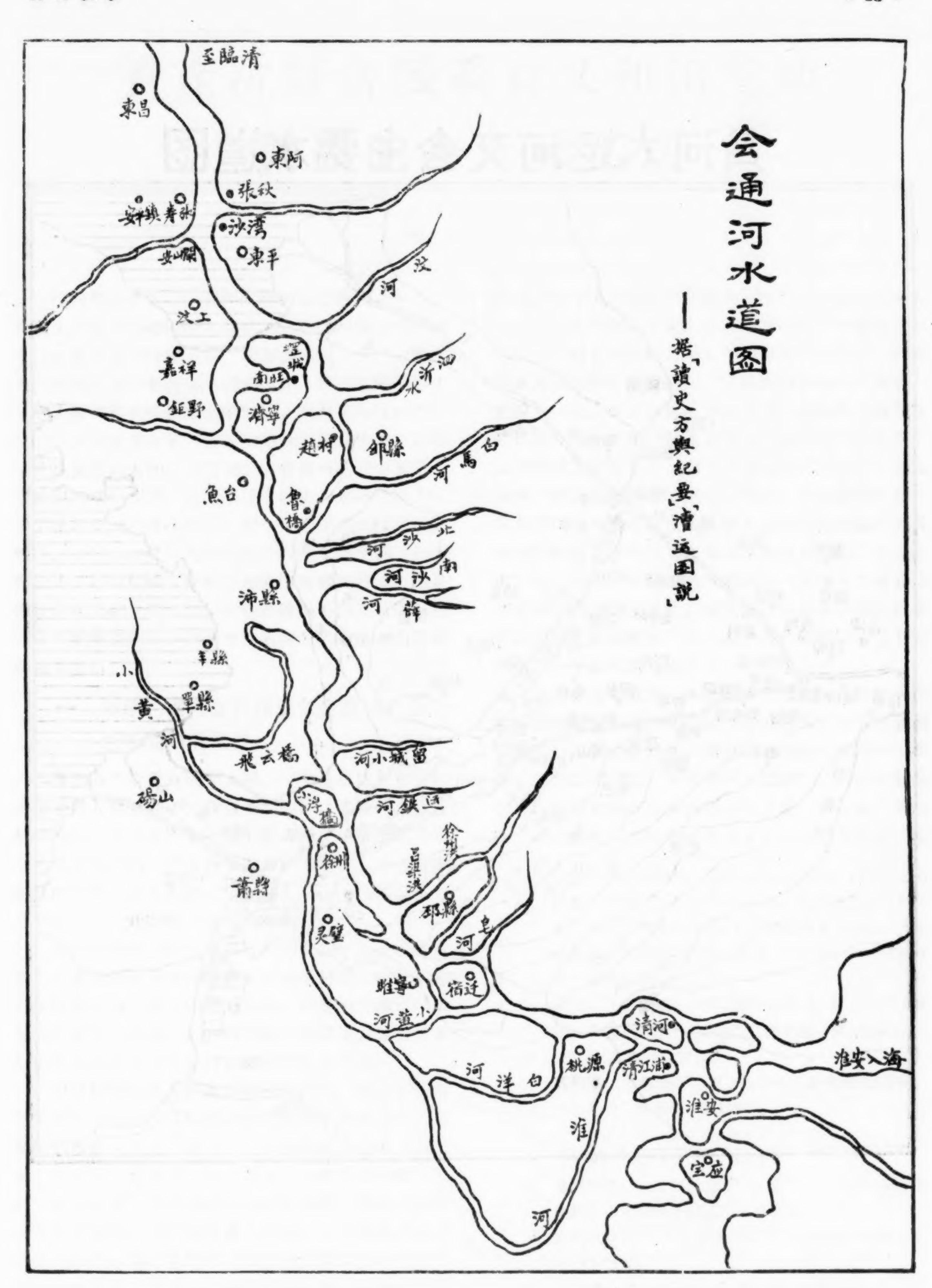
本来是“挽黄保运”的，到这时有了根本的改变。“李霖寰（化龙）决計走泇河，其言曰：黄河者，运河之賊也，舍黄一里，即避一里之賊。其苦如此。”⑥在李化龙的倡議下，开挑泇河，接济大运河的水源。万曆三十二年（1604）有粮船八千零二十二艘就由这条水道北上。“其后泇河遂为永利，但需补葺而已。然泇势狭窄，冬春粮艘回空，仍由黄河焉。”⑦

天啓、崇禎时期，河患更剧，差不多年年都有决口，被灾地区的广大，灾情的严重，是有加无已。特别是崇禎二年至五年（1629——1632），黄河潰决的地区，西至开封，南至徐州，范圍很广，甚至更西的孟津也“横浸数百里”。至于錯綜的淮河水系，在洪水氾濫下，許多河流、湖泊都漫溢成灾。如“睢宁水患，至于城池潰决，人民蕩析，固百年来未有之奇慘也。”如“黄河横决，淹沒原武、陽武、封邱、延津四县尽成湖沼，民为魚鼈。”如“苏家嘴等口又复大决，由盐城而兴化、而宝兴、高邮，无处不被其害。”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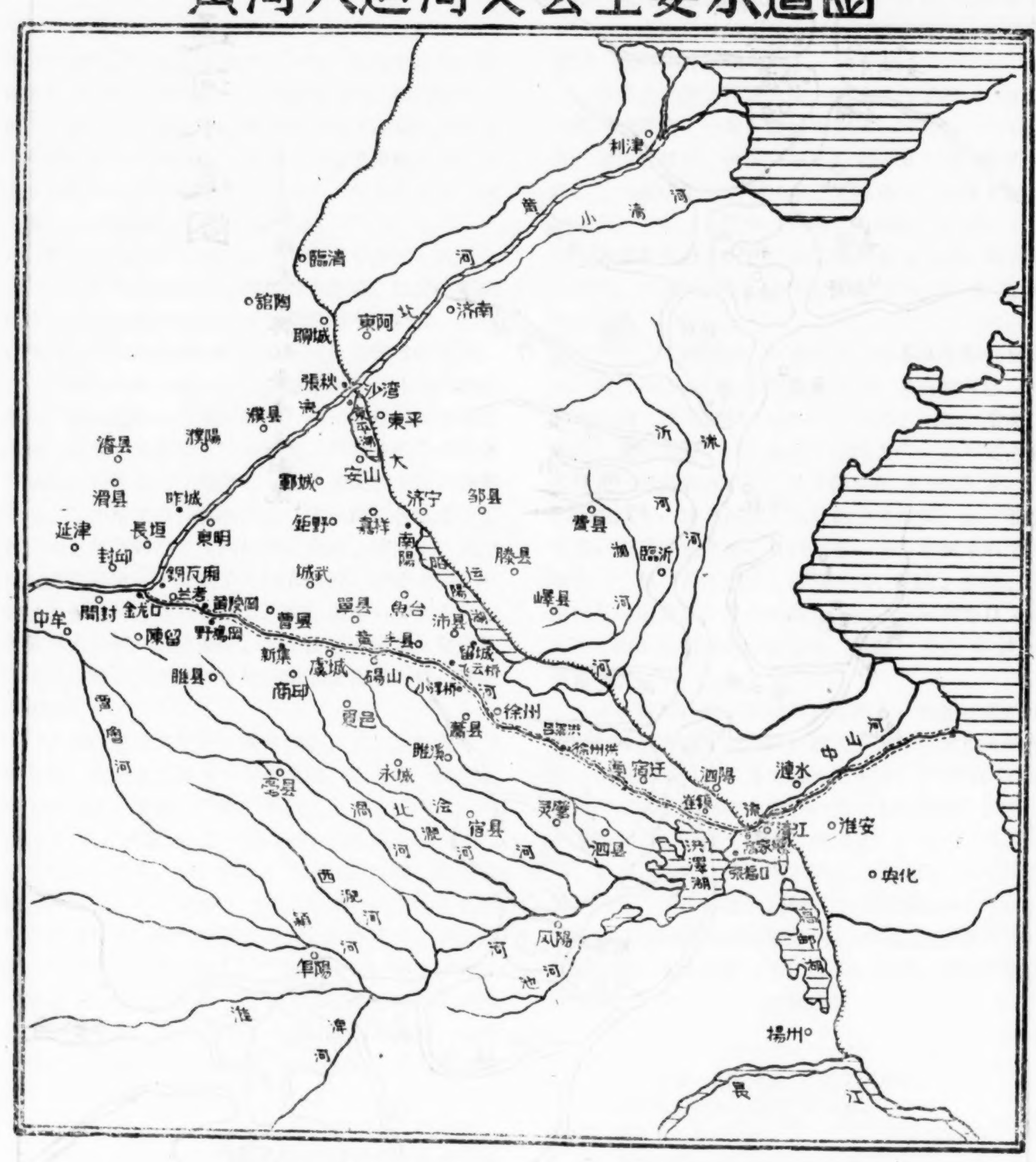
这一时期，河工的疲敗到了極点，消極防范的工程措施也都荒弛了，歲修費被大量吞沒，对役夫的包占、侵尅和工料不实等弊端層出不穷。等到巨灾釀成，却推之于“淫雨为灾”，或“海潮倒灌”。善后的办法則是，“請迁（睢宁）城避之”，或是“逡巡踰年，始議築塞”。統治者不管人民的死活，如灾情严重的兴化，还是不放弃剝削，規定漕粮折半收取，每石折銀八錢。統治者最顧虑的是“兩淮盐課数百万，何所取給；大盗出沒（农民起义）其間，漕运咽喉从此断矣。”⑨　（下轉52頁）

---

① 行水金鑑，卷39河水，引續文献通考。
② 明史紀事本末，卷34河决之患。
③ 張元兆：济运始末。
④ 行水金鑑，卷127运河水，引明神宗实录。
⑤ 續文献通考卷30国用二。
⑥ 朱国楨：湧幢小品。
⑦ 明史，卷87河渠志，泇河。
⑧ 崇禎長編，崇禎三年至五年李若星等奏。
⑨ 崇禎長編，崇禎五年吳甡奏。


会通河水道图
——据「讀史方輿紀要」「漕运图说」
至臨清
東昌
東阿
張秋
安平鎮
壽張
沙灣
東平
安山閘
汶河
汶上
嘉祥
南旺
濟寧
鉅野
沂泗水
趙村
鄒縣
白馬河
魚台
魯橋
北沙河
南沙河
薛河
沛縣
豐縣
單縣
小黃河
飛云橋
留城小河
碭山
浮橋
徐州
蕭縣
徐州洪
吕梁洪
邳縣
靈璧
皂河
睢寧
宿迁
白洋河
桃源
清河
清江浦
淮安
淮安入海
宝应
淮河

黄河大运河交会主要水道图



資產阶級各派系在义和团运动期間的态度和活动

何若鈞

戊戌变法失敗后，资产阶級的救亡运动瓦解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繼續深入和扩大。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二次革命高潮。尽管在形式上，义和团是一个迷信落后的团体，然而它的爱国主义的本質并沒有受到絲毫的影响。当时各地特别是华北的广大人民群众千千万万地参加到运动中来，証明了这是被压迫者的正义行动。尽管这一运动由于受了清政府的欺騙利用，最后是受了挫折，然而它終于阻止了帝国主义的瓜分野心，給予了帝国主义以足够的教訓。正因为如此，所以当运动兴起时便受到了作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支柱的反动統治阶級的摧殘。但是使我們遺憾的是当时新兴的資产阶級不但沒有同情这一偉大的爱国运动，反而也抱着反对的态度，为外国侵略者張目。

一 以康、梁为首的保皇会企圖乘机借外力使载湉复辟

我国資产阶級有兩个来源。一个是从地主官僚和一部分商人轉化的，因政治条件較好，資金較大，发展得較快，成为資产阶級的上層；一个是从民間普通工商業者上升的，因条件困难，前进緩慢，成为資产阶級的下層。由于如此，所以在政治上，前者基本上成为改良派，后者基本上成为革命派。

在資产阶級上層中又可分为兩派。一派是依靠帝国主义生活的买办資产阶級；一派是封建性較濃的資产阶級改良派。在义和团运动中，前者的言論可以申报和新聞报为代表，后者的言論可以保皇会分子所办的中外日报以及正气会自立軍的文告为代表。

申报和新聞报都是发刊最早的报紙，当时分别为英美商人所有①。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了京津之后，起初他們蔑視义和团，認为："义和拳匪之始起于山东也，星火耳，涓流耳，禁之懲之，一举手而即絕"②。而"橫流汎濫"则实为清廷頑固派载漪、剛毅、徐桐、毓賢等所縱容。他們責备滿人无能，"才質未必优，历練未必深，而紆紫拖青，裒然居于高位"，"此吾所以重为国家（清政府）虑且憂也"③。后来他們怕战事持久下去，影响外貨輸入，事实上"計自团匪大乱以来，犹未滿四月也，中国北方虽乱，中国南方犹未乱也，而各国貨物之輸入于中国者，則已万分疲滯，甚至有停厂閉行者矣。浸假而曠日持久，扰乱不止四月，云合响应，扰乱不止北方，則商务之疲坏又奚若也"④。又怕"俄人大得手于东三省，則各国之私心將因之而起"⑤，而"各国有大沽之役，在各国政府，亦以为此乃万不得已之举动，大沽領袖提督，宣示之用兵宗旨可証也，故华人（按应該說是中国买办資产阶級）亦有諒其苦衷者，南北之异趋，亦可証也"⑥。因此，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各国今日亟宜速为息事，而以剿匪之責，責之中国，而中国各大員亦宜以剿匪之責自任也"⑦。买办資产阶級完全是与它的主人一个鼻孔出气的。

戊戌变法失敗后，以康有为、梁啓超为首的資产阶級改良派逐步暴露了它的反动根性⑧。尽管清政府頑固派对他們始終排拒，但他們还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抱臣罪当誅，天王聖明之謬解"，"尙冀賜环有日，宣室重逢，为伪朝建不世之業"⑨。資产阶級改良派在維新运动时期大体可分为右中左三派⑩，变

---

① 申报于1872年發刊，本由英商美查創刊，1888年改为公司，1906年复由買办华人接办。新聞报發刊于1893年，先为中外商人合办，后为美商福开森所得，至民国初年又改归华商經营。分見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75及77頁。

② 申报："憤言一"，見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义和团"（以下簡称"义和团"）第四册，第171頁。

③ "义和团"，第172頁。

④ 新聞报："息禍篇"，見"义和团"第四册，第178頁。

⑤ "义和团"第四册，第179頁。

⑥ "义和团"第四册，第178頁。

⑦ "义和团"第四册，第179頁。

⑧ 参閱胡繩："康有为与戊戌維新"一文最末一段，見中国人民大学編中国近代史參考資料。

⑨ 宮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夢"，大达圖書供应社版，第41及45頁。

⑩ 范文瀾："中国近代史"第七章，第四節。

法失败后，情况有了变化，老的右派基本上垮了，只剩了严复还在天津办国聞报，麦孟华等则与康、梁等中派合为一体，堅决保皇，形成了新的右派。还有当时国内一些"实業家"如張謇等亦与此派相呼应。至于原屬左派的唐才常等則与革命派发生了一定的联系，打算利用革命派所联系的会党起兵"勤王"，但他們仍未能跳出改良主义的范圍。

康有为"自戊戌蒙难，走英日，为秦庭之哭旣不可得，則自开保皇会于美，归省母病，遂圖勤王"①。义和团运动起来之后，他認为这正是推倒那拉氏政府的好机会，便号召他的党徒在海外大肆活动，积極筹款，准备組織"勤王义軍"，在英国帮助下，"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載湉）"，"將来迎上南迁，即与各国訂約通商，复我維新之治"②。

国內的改良派和保皇会的党徒自然也搖头摆尾地照着他們祖师爷的指示作事。一些有名的"实業家"，如張謇、陈三立、湯寿潜、沈曾植、何嗣焜等首先就代表長江下游的上層資产阶級在1900年的六月間向兩江总督刘坤一陈述"北京拳匪乱起，其势熾于黃巾、白波"，支持刘、張（之洞）二督"保衛东南"，并建議由"南中疆帅公推合肥（李鸿章）总統各路勤王之师，入衛兩宮"③。

严复在天津主編的"国聞报"，責义和团不应"鬧教"，不应"害与人无爭之傳教士"，以致"挑强鄰，釀大禍"，罵义和团"直乱世界之匪徒耳"。因此各国調兵是"不得不如此"；"清政府当此危难之际，亦惟有明辨民匪，严懲痛剿；不稍姑容，毋假手于人，以貽后患"④。这种反动論調当然是帝国主义所欣賞的。

康梁嫡系的汪康年在上海主編的"中外日报"⑤，更鼓其如簧之舌，大量散布反动毒素。在义和团运动期間，它所发表的关于义和团的文章最多，但总起来不外以下几个論点：第一是汚蔑义和团；第二是归罪于清廷頑固派，提出非"帝党复用，新政再行"不可；第三是要"皇上"复辟，就非要仗帝国主义帮助，特別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和东南督撫的"討賊勤王"不可。

他們汚蔑我国劳动人民是"野蠻派"，"此派之人虽具人形，其实絕不知为人之理"，而义和团即以这派人为"質干"⑥。罵义和团为"匪"，为"乱民"，为"不受教化之奸民"，"禍及宗社，危及乘輿，害及商民，实为国法所必誅，罪名所必加，中外臣民所必欲杀之之人"⑦。"横挑鄰衅，自啓禍源，上貽君父之憂，坐召不測之变，若輩之罪，虽百死不足蔽辜矣"⑧。"統天下有血气，有知識之人，当无不痛心疾首，群思剚刃于其腹矣"⑨。他們与义和团势不兩立。

他們为本身阶級利益所限制，看不見当时中国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認为"此番之禍，实具有綫索可尋，脈絡相承之理，綜而論之，蓋起于守旧，成于訓政，迫于廢立，終于排外"⑩。完全站在載湉的地位講話。"欲淨根株，必自改易支那內政始，改易支那內政必自皇上复辟始"。又說"有識之士所同心而爱戴者，皇上一人而已"⑪。不仅"有識之士"如此，而且"西人"也"專注皇上一人"。"皇上旣还北京，重以各国外权輔助，則一切已得要領，已有关鍵"。因此，他們大声疾呼："趁此时机，合中外全力持之"⑫，急得如热鍋里的螞蟻一般。

为了献媚外国侵略者，他們不問义和团为什么要反对外国侵略者，反而顚倒是非地說："无端而毁教堂，无端而戕教士，揆之于理，是固我曲而彼直，我短而彼長"⑬。"英美等国，皆傳耶穌教，法义（意）等国則傳天主教，虽宗旨有异，要其劝人为善，戒人为非，同出一片婆心，而未尝有怀叵測"。人民和教会发生冲突，"蓋內地民風素悍，民智未开"。"教士之傳教来华，胥由其国考取，品行自无不端"。頂多是教民"有犯教規而不滿于人意者"⑭。又替侵略者打算盤，說什么"瓜分一策……調遣軍士，則有資粮之費，彈压地方，則有駐紮之費，其間若官民之抗拒，若意外之梗阻，皆为必有之事，运兵轉餉，沓无

① 南海先生詩集，中国近代史資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341頁。
② 馮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中国文化服务社版，第71——73頁。
③ 張孝若："張季直先生傳記"，第84——86頁。
④ 国聞报："論拳匪"，"义和团"第四册，第175頁。
⑤ 原名时务日报，1898年四月"时务报"改为官办后，易名中外日报，以示区別。見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40頁。
⑥ "論义和拳与新旧兩党之相关"，"义和团"第四册，第179——181頁。
⑦ "讀二十四日上諭恭注"，"义和团"第四册，第232頁。
⑧ "奸厩渠魁說"，"义和团"第四册，第183頁。
⑨ "論中国欲自立宜先求开民智之策"，"义和团"第四册，第210頁。
⑩ "原乱二"，"义和团"第四册，第226頁。
⑪、⑫"論西迁后之变局"，"义和团"第四册，第209頁。
⑬ "各国宜守和平宗旨說上"，"义和团"第四册，第186——187頁。
⑭ "中西宜訂教案新律議上"，"义和团"第四册，第212——213頁。

穷期，劳民伤财，不知紀極。……大軍所过，元气大伤，民穷財尽，商务即坏，欲求如昔日之兴盛，殆不可复得。且既曰瓜分，则固此疆尔界，各有専属，或設苛禁以保利源，或抽重稅以遏来貨，欲求如昔日之銷路广远，稅項徵薄，殆又不可复得，而从前恃商务立国之諸大邦，其所失殆不止倍蓰”①。表示替侵略者設想得非常周到。此外还認为“以中国今日之兵力，其与西人比較，万不当一”②，义和团如果战胜，则“徒增驕气”③。“今日之支那，断不能无所倚而自立，不联俄則联日与英耳。但日利于支那之强，联日則日將进其革新之圖”④。充滿了民族自卑感。又盛讚日本出兵的宗旨——“一曰保护邦人，一曰援助列国，一曰拯救支那”，是“大公无私，足以昭示大众”⑤。这簡直是汉奸的論調了。

二 以唐才常为首的“自立軍”的“勤王”活动

在改良派的右派正在叫囂归政載湉的时候，左派唐才常等則当真地搞起“勤王”活动来了。唐才常和譚嗣同是同乡，“两人少同游，長同志，訂为生死交，才名亦相伯仲，时有‘瀏陽双杰’之称”⑥。譚死后，唐繼之为改良派左派的代表人物。戊戌变法失敗后，改良派与革命派的重要人物均聚集于日本东京，唐通过其好友兴中会会員毕永年之介紹，与孙中山晤面。但当时“康梁师徒方在海外大倡保皇会，建議募款起兵勤王，其眼中之徐敬業，舍唐莫属，而唐亦欲利用保皇会款为起事之需，故不便与兴中会积極合作”⑦。而兴中会人物自孙中山以下，都与改良派无严格的界限。当唐才常、林圭、秦力山、傅慈祥等返国准备起事时，孙中山、陈少白等兴中会要人曾参加餞行的宴会，孙中山还为林圭介紹汉口某俄国商行买办容星桥，对唐等之起事表示賛助。其后容星桥曾在汉口助林⑧。

唐才常返国后，即在日本人的帮助下，由組織“东文学社”而組織“正气会”，旋秉承康有为之命又將“正气会”改为“自立会”⑨。唐才常等認識模糊，思想上充滿矛盾。在“正气会”章程的序文中，既罵依附清廷的人是“低首矆腥，自甘奴隶”表示反滿，又主張“君臣之义，如何能廢”，志在保皇⑩。想借革命派之力，但又不願倒向革命一边，到后来居然把兴中会所联系的長江各地会党都拉到自立会方面去了，使得毕永年憤然与之脫离关系⑪。1900年七月間，唐又以挽救时局为名，邀請在上海的改良派各派系人物，于張园开中国“国会”，参加者有容閎、严复、章炳麟、文廷式、吳葆初、叶浩吾、宋恕、張通典、沈藎、龙澤厚等数百人。公推容閎为会長，严复为付会長，唐才常为总干事⑫。这个会是他們搞“自立”活动的最高机关。容閎駐上海任外交事务，由他亲手起草英文对外宣言，大意說清廷守旧派“煽动义和团以敗国事也，决定不認滿洲政府有統治全国之权”，救国之道，“端在复起光緒帝”，“借以驅除排外篡夺之妄举。惟此事須与各国联絡，凡租界教堂及外人幷教会中之生命財产等均須力为保护，毋任侵害”⑬。会章中更有“务合海內仁人志士共講忠君救国之实”等語⑭。这些話仍是自相矛盾。

接着，唐才常、林圭等便以長江一帶会党为基础，組織“自立軍”，并在汉口設立指揮机关。又仿照会党散发票布办法，散发富有票，分地段設旅館，为会友往来寄宿之所⑮。自立軍分为五軍，拟在大通、安庆、常德、新堤、汉口等五处起事⑯。原定八月九日（陰曆七月十五日）并举，但唐才常因待康有为海外匯款展期数次。而大通方面則因联系不灵仍按期起事，終以力量不足而失敗⑰。大通自立軍所貼安民告示宣布該軍起事目的是为了“討賊勤王”，“以清君側，而謝万国”。又称該軍“宗旨”是“請光緒复辟”。并定出几条“法律”，要保护西人生命財产，保护教堂教民，不准扰害通商租界⑱。明确地說明自立軍只是“勤王”，并无革命之意。

在汉口之唐才常等在英租界內設立指揮机关，显然是得到英帝国主义的默許，而在待款一再延期中，

① “恭讀九月二十二日上諭書后”，“义和团”第四册，第236頁。
② “弭厥渠魁說”，“义和团”第四册，第183頁。
③ “砭俗”，同上，第196頁。
④ “論义和拳与新旧兩党之相关”，“义和团”第四册，第181頁。
⑤ “义和团”第四册，第186——187頁。
⑥ 張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2——23頁。
⑦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57頁。
⑧ 同上，第58頁。
⑨ 張篁溪遺稿，見“戊戌变法”第四册，第283頁。
⑩、⑪“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59及第60頁。
⑫ 馮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組織史”，第48頁。
⑬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66——67頁。
⑭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以下簡称“逸史”），第54頁。
⑮ “清史紀事本末”：自立軍之失敗，載“戊戌变法”第四册，第264——268頁。
⑯ “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3頁，庚子武汉首义烈士碑。
⑰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62——64頁。
⑱ 同上，第63頁。

又曾通过日本人与鄂督張之洞联系，劝張接受自立軍之拥戴，宣布兩湖独立。張犹疑莫决。英帝本想借自立軍起事分裂長江一帶，后来因为"东南互保"已經稳固，不需要另搞一套，遂將自立軍出卖①。留在指揮机关的自立軍人員三十余人被汉口英租界当局于八月二十一日（陰曆七月二十七日）移交清政府，結果唐才常等二十名重要分子为張之洞秘密处死。唐才常等死得糊里糊塗，唐在獄中的題壁詩有"臏好头顱傳死友，无眞面目見群魔"之句②，語意含混，不明不白，正是他們行徑的写照。海外华侨被騙捐出的款子共有六十万元③，絕大部分被康有为吞沒了。

另外，当时还有一些初步具有資产阶級思想，站在改良与革命之間的知識分子在义和团运动中，則表現了他們的彷徨歧路。像章炳麟在戊戌政变后，曾在台北办报，"为文忠告康梁，使勿效忠异族"④，但在唐才常发起組織"国会"时，却依然参加了。虽然他曾"劝唐勿为康党所用"，并"憤然剪除辮髮以示决絕"可是第二年（1901）夏間他又应梁啓超之聘担任了广智書局的翻譯工作⑤。秦力山更是一个这种人物的典型。他自称是"亦儒亦墨亦新民"⑥。义和团运动刚起来的时候，爱国志士中頗有主張乘时游說拳党首領，使改扶清灭洋标帜为革命排滿者，力山亦持此議之一人。遂只身至天津，求見拳党大师兄痛陈利害。拳党斥力山为二毛子，命牽之出，力山以拳党頑固无可合作，乃至汉口訪林錫圭（即林圭），参加長江自立軍运动"⑦。这一件事固然說明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不能組織联合战綫，但更說明了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搖摆不定，旣鼓动旁人"革命排滿"而自己却又参加了"討賊勤王"。

三 孫中山領导的兴中会幻想借英国力量推翻淸政府但同时发动了惠州起义

其实，不仅介乎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間的帶有資产阶級思想的知識分子搖摆不定，即当时的革命派甚至包括孙中山在內也同样是認識模糊的。

1900年六月义和团运动向京津发展时，孙中山正在日本横濱，計划在惠州发动起义。这时孙中山虽然沒有发表什么文告，表明对于义和团运动的态度，但他們并沒有与义和团合作进行反帝的意圖，只想由兴中会在广东單独起义。不过紧接着他們就打算在英帝慫恿下运动李鸿章（时为粤督）先在广东独立，然后組織新政府。原来，英帝国主义在当时除了策动長江各省进行"东南互保"外，还陰謀分裂华南。于是通过與兴中会有密切关系之英籍华人香港議政局議員何啓向香港兴中会骨干陈少白献策，"主張革命党与粤督李鸿章合作救国，首先运动李鸿章向滿淸政府及各国宣告兩广自主，而总理（按指孙中山）率兴中会員佐之。其进行方法，則先由中国維新党人联名致書香港总督卜力（Blake）求其协助中国根本改造，以維持世界和平。再由卜力根据書中理由轉商鸿章，建議广东自主方案，并介紹兴中会首領孙某与之合作"⑧。

在孙中山、楊衢云、陈少白等人署名的上港督書中，指义和团为"釀禍奸民"，为"元兇"，有"仇教士"，"害洋商"等罪名，認为当时形势为"中外安危之所关，滿汉存亡之所系""平匪全交，乃为至理"。"謹拟平治章程六則呈覽"，"願借殊勛，改造中国"⑨。

章程六則：第一則是"迁都于適中之地，如南京、汉口等处，擇而都之"。理由是"以便办理交涉及各省往来"。迁都不仅与改良派的希望相同，而且是照着英日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的意圖提出来的，迁都之后使得中央政府置于英帝势力之下，自然"办理交涉"就更加方便了。第二則是中央政府举民望所归之人为之首，并設立議会，但"以駐京公使为暫时顧問局員"；各省自治政府有中央所派总督和自己設立的省議会，但亦"以目前各国之总領事为暫时顧問局員"。这样会使无論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都置于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第三則是"公权利于天下。如关稅等类如有增改，必先与別国妥議而行。又如鉄路、矿产、船政、工商各業均宜分沾利权。教士旅居一体保护"。这样便肯定了协定关税为合理之事，并出讓国家利权給帝国主义。第四則是"增添文武官俸"。这是为了要树立資本主义国家的人事管理制度。第五則是"平其政刑"。"大小訟务仿欧美之法"，設立陪审制度并廢除刑訊。这是要树立資本主义国家的司法制度。第六則是"变科举为專門之学"。这是要树立資本主

---

① 参閱張之洞："宣布康党逆迹并查拿自立会首片"及刘坤一："密陈严拿富有票匪片"，分見"戊戌变法"第二册，第479及511頁。

② 梁啓超："飲冰室詩話"，見"飲冰室文集"卷十四。

③ 張之洞：擒誅自立会匪头目分別查拿解散摺，見"戊戌变法"第二册，第473——478頁；又一說数逾百万，見"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70頁。

④ "逸史"初集，第54頁。

⑤ "逸史"初集，第56頁。

⑥ "逸史"初集，第89頁。

⑦ "逸史"初集，第86頁。

⑧ "逸史"第四集，第92頁。

⑨ "逸史"第四集，第92——94頁。

义国家的教育制度①。以上几条"平治章程"不仅說明了革命派認識模糊，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而且这几条章程如果眞的实现，其后果必致中国变为各国共管的殖民地，的确可以替帝国主义"平治"了中国。

書既上，港督自然"極表同情"，并代向李鸿章接洽数次。李鸿章手下的特务"粤紳"刘学詢乘机写信邀孙中山来粤。孙中山果然偕楊衢云、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于六月十七日（陰曆五月二十一日）乘法輪由日抵港。这时李鸿章已派他的幕僚曾广銓乘安瀾兵輪来接，邀孙中山过船开会。幸孙中山已得陈少白等报告，知李鸿章尚无决心，且有"設阱逮捕"之陰謀，未曾中計②。

不过孙中山虽对封建势力存有幻想，却同时准备着惠州起义。那年十月初（陰曆閏八月中旬）郑士良（弼臣）在惠州归善县属之三洲田山寨发动三合会党群众举行起义③，孙中山自己則由日本轉渡台湾，拟由台湾潜渡內地。对台湾总督兒玉源太郎以中国北方已陷无政府狀态，"頗贊中国之革命"，"許以起事之后可以相助"④。于是孙中山命郑士良改原定計划不直逼省城，而沿海岸东上，以便接济。但后因日本政府变更政策，禁止武器出口，惠州起义軍苦战月余，終以餉械兩缺，特别是未能联系农民而解体⑤。日本帝国主义"帮助"中国革命当然沒有好心，但何以先答应"相助"而后来又变了卦呢？这倒并不見得如孙中山自己所說，是由于日本內閣更迭，显然此事与帝国主义整个的侵华形势有关，那时英德协定已經成立，帝国主义正醞釀向清政府提出和約草案，繼續扶植清政府，在华南方面的分裂活动自然就沒有必要了。

然而即使在发动惠州起义中，孙中山对封建势力亦仍存有幻想。李鸿章于七月中旬（陰曆六月下旬）应清廷之召，北上充議和全权大臣，船过上海时曾留刘学詢于沪，"以处理南方各省事务"。这是为議和不成留下一手，好回到东南專供英帝驅使。刘学詢就写信到横濱，告訴孙中山通信地址。这当然是暗示还有"合作"的机会。这时孙中山正在台湾設法援应惠州軍事，乃派平山周持密函赴上海訪刘学詢，許之为广东独立政府之"主政"，或称总統，或称帝王，并推盛宣怀（大买办官僚）"当內政"，請其筹款百万援助。但刘学詢不肯，此事遂无結果⑥。

四 結 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首先是当时資产阶級各派系不但都不曾認識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偉大力量，相反的，他們都非常害怕人民群众的力量。他們用各种惡毒的字眼来污蔑义和团，叫囂着要"驅除"，要"剿平"。改良派在長江一帶所組織的"自立軍"甚至革命派在惠州以会党为基础所发动的起义，都未曾与广大农民直接联系，所以都以势孤力單而失敗。

其次是当时資产阶級改良派与革命派都不曾認識到帝国主义国家对外侵略的必然性。他們也講"爱国"，但爱国并不反对帝国主义。他們以为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是由于中国的积弱使然。特别是他們之中到过欧美日本各国的人，看到帝国主义国家的物質文明和資产阶級的政治制度，更是欽羨不已，总以为可以借帝国主义的帮助，把資本主义社会那套制度搬到中国（当然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間还有程度上的差别），从而致中国于富强。他們不知道这不是师徒关系，而只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关系。他們之向帝国主义求援，实际上就是使中国陷入殖民地的深淵。至于买办資产阶級則甘願作帝国主义的奴才，主观上連一点使中国富强的意思都沒有。

复次，改良派与革命派在革命立場上有区别，但也有許多相同之处。改良派当然根本沒有推翻国內封建統治的意圖，而革命派也对封建势力存有幻想。表面看来，兩者所不同的在于拥护满清与否。实質上这問題即是反清与否的問題。不过那时兴中会虽主"反满"革命，但对革命后由誰来建立新的政权，却缺乏明确的認識⑦。所以在运动兩广独立中，起初願佐李鸿章自主，而后来又有推刘学詢主政之意。关于这一点，直到同盟会后才在理論上接触到⑧，而在行动上解决它則又远在反袁、护法諸役之后了⑨。

---

①、② "逸史"第四集，第94——95頁。
③ 冯秉和："辛壬春秋"第六册，第12頁及第七册第3——4頁。
④ 孙中山："有志竟成"。
⑤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82——86頁。
⑥ "逸史"第四集，第93——100頁。
⑦ 参閱"兴中会宣言"。
⑧ 参閱"軍政府宣言"，"民报發刊詞"，"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前途"等文。
⑨ 参閱"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談談古代東方專制国家

日　知

所謂專制国家是指实行專制政治或專制主义統治的国家。專制政治或專制主义（Despotism）这一术語起源于古代希腊語（δεσποτεία），原意是指主人（δεσπότης）或家主对于奴隶或夫对于妻的权力或关系。这种政治是君主政治（monarchy）的形式之一，它最初发生于东方。古希腊学者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在其“政治論”（Politics）一書中曾將他当时所見到的政治形式分为三大类，每类再分为好的和不好的兩种。一人統治的政治为君主政治，少数人統治的为貴族政治（Aristocracy），多数人統治的为立宪政治（Politeia，或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这三种政治各有其相应的不好的形式：和君主政治相应的是僭主政治（Tyranny），和貴族政治相应的是寡头政治（Oligarchy），和立宪政治相应的是民主政治（Democracy，指極端民主制）（見Politics，1279b）。君主政治又可細分为五种：斯巴达的，蛮人的（Barbarians，指东方君主国家），独裁者（Aesymnetae，相当于罗馬的 Dictator）的，英雄时代巴西勒斯（軍事首領）的，極权君主制（παμβασίλεία，Absolute royalty）的見（Politics，1285a－b）。在这五种中，东方君主專制国家属于第二种的君主政治的形式。

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形式分类当然并不合适。但是，他生在古典民主政治的环境中，他的作品也像其他古典作家的作品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方專制主义的客观眞实性。照他的看法，这种存在于蛮人中的君主政治所具有的权力和僭主政治很相似；不过，它的統治根据法律，而且是世襲的，所以虽具僭主性質，却較为安全。同时，僭主的衛士依靠外国人，而这种君主政治則利用本国公民为武裝力量，亞里士多德認为蛮人比之希腊人或亞洲人比之欧洲人更具奴隶本性（δουλυκώτεροι，Servile），所以他們能忍受專制統治（Despotic Rule）而无任何悔惧（見Politics，1285a）。

据希罗多德（公元前五世紀）的記載，当波斯王大流士即位之前，波斯貴族曾举行一次会議，討論政治制度問題，有人主張民主政治，有人主張寡头政治，而大流士則坚持君主政治最优，他認为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的結局一定是一場紛爭，而紛爭的結果必然产生君主統治（見Herodotus，Ⅲ.80－82）。波斯是否有过这样討論政治制度的事实，当然是值得怀疑的；希罗多德的記載无宁是反映部分希腊人对东方專制政治的見解（自然，这不是希罗多德本人的見解，因为他是民主派）。

然而东方君主專制比之古典民主政治落后，这是十分显然的。柏拉圖在其“法律論”中說波斯的政治制度很坏。因为專制无度，大众的自由被剝夺，国內的友好关系便被破坏，到国家需要人民时，人民却沒有爱国心，因而战斗的武裝力量不能不依靠雇佣兵。所以过分的奴役人民和專制主义便是波斯帝国的不良的政治制度（見Laws，Ⅲ.697C－698A）。

古典作家关于东方專制主义的論述，对于研究古代东方的政治制度頗有参考的价值。可是，研究东方專制主义問題虽然早在古典时代就已开始，但这个問題直到近代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以后，才得到科学的探討和解釋。

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給东方專制主义問題奠下了科学研究的基础。在他們的早期的作品（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里，例如在“德意志意識形态”（1845－46年）里，在“共产党宣言”（1847－48年）里，东方專制主义問題还沒有被提起。但是，自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起，这个問題在他們的經典著作里已日益占居重要的地位。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書簡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853年的一些通信），在馬克思所著的“不列顚在印度的統治”（1853年）里，在他的“政治經济学批判大綱”的手稿（1857－58年，其中包括“政治經济学批判”的“序言”和“資本主义以前生产各形态”）里，在他的巨著“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于1867年）和“剩余价值学說”（属于1861－63年的手稿）里，以及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其他著作里（例如1878年出版的“反杜林論”），对于东方專制主义問題都有深刻而詳尽的論述（可参閱“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第一篇和“資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

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原理，东方專制主义的經济基础是所謂“亞細亞生产方式”（或东方所有制）。这种“生产方式”（或所有制）的最主要特点（据“苏联大百科全書”第十四卷“Деспотия”条所作的概括）是：“奴隶主对生产資料和奴隶的所有，同时，有原始自然經济而无土地私有制，有游牧生活以及伴随着軍事掠夺的經常移民。”这些特点主要包括着下列三方面的經典指示：其一，东方的公社土地所有制与沒有土地私有制（見“資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其二，东方部落的一部分定居者和一部分繼續游牧者間的一般关系（見馬克思和恩格斯書簡）；其三，亞細亞古代占优势的阶級压迫形态是奴隶制（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級狀況”一書，1887年美国版“序”）。

建立在这种“生产方式”（或所有制）上面的东方專制主义的特点（据“苏联大百科全書”第十四卷“Деспотия”条所作的概括）是：“統治者（專制君主）决定关于組織軍事远征、移民、建筑灌溉系統的公共工程等問題。他是唯一的土地所有者，而在大多数情形下又是最高法官。專制君主的意志被当作法律看待。他的人格不論生时死后都被神化。尽管在解决主要的国家問題时，專制君主也遵循奴主貴族上層的意見，但是他的权力却被認为无限的。由于行政的極端中央集权化，行政的阶級組織和征服政策便有了保証。‘从很古的时候起，亞洲通常只存在有三个行政管理部門：財政部，或掠夺本国人民部；軍事部，或掠夺外国人民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中文版，第324頁。）。在生产的停滯性質狀況下，在分配土地与灌溉土地的全部权力集中于專制君主之手而劳动者則完全依附于此种奴主国家的狀況下，古代公社生活又复加强了專制君主的权力。以无限制君主法老为首的古埃及国家，以及巴比倫、亞述、中国，以及在波斯和印度的不同形式的專制主义，是專制主义的例子。”

东方專制主义虽然直接溯源于古代东方各奴隶制国家，但是，东方專制政治形式以及作为它的經济基础的东方所有制，其存在的时期都不以奴隶制时代为限，当封建制时代，东方專制主义仍然存在，而东方所有制在不同地区在不同的程度和形式下往往也仍然存在。

然而，这并不是說，在东方，曾經存在着長期停滯的特殊的“生产方式”或“亞細亞生产方式”。当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提出和研究“亞細亞生产方式”的时候（最初在1857—58年的“政治經济学批判大綱”的手稿中提起，后来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經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正式提出），原始公社史的基本問題之一，氏族問題，还未研究成熟，而有关原始公社史的許多內容，在馬克思的作品里还和奴隶制时代（甚至封建制时代）的內容夾在一起（在“資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中，不論亞細亞形态或古典形态或日耳曼形态，都显而易見的既有前阶級的而又有阶級社会的內容），因而在这些年代里提出的历史上生产方式发展的各阶段，并未能視为最后的結論（原始公社制的生产方式尚未确立）。到了七、八十年代，由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書問世（1877年），接着馬克思写成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書摘要”（手稿，1880—81年；1941年苏联第一次公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九卷），恩格斯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原始公社制时代被科学地确立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各阶段从新提出来了：现在，繼新确定的氏族社会之后，是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劳动制等阶段（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69頁），“亞細亞生产方式”已不是社会发展史中單独的一个阶段了。后来列宁在“論国家”（1919年）中也沒有把“亞細亞生产方式”当作社会发展的單独一个阶段（列宁的分期法与恩格斯同）。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当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时，发生了东方社会性質問題的爭論，由于东方学者（特别是В．В．斯特魯威）的努力，結束了“亞細亞生产方式”的理論并确定了古代东方各国的奴隶制社会性質。

但是，否定“亞細亞生产方式”作为一个“生产方式”，絕不是否定其中的主要內容——东方所有制。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关于东方所有制（其实“亞細亞生产方式”只是它的另一术語）的学說至今仍然不容絲毫动搖。我們知道，所有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一方面說，五种生产方式有相应的五种所有制（其中不包括“亞細亞生产方式”和东方所有制）；从另一方面說，在一定的生产方式阶段，所有制的形式并不一定限于与之相应的一种。馬克思在“資本論”卷三“剩余利潤之地租化”篇的“緒論”中列举多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东方的、奴隶制的或农奴制的、資本主义的、小自耕农的等），东方所有制即是其中的一种。一种所有制可以專属于一个社会阶段（如奴隶制土地所有制或农奴制土地所有制），也可以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段，例如小所有制，在西方（欧洲），先則为古典所有制（希腊、罗馬），而后来在农奴制解体和資本主义所有制（均指土地所有制）发生前又重新出現（参閱“資本主义生产以前各

形态”，第35頁）。东方所有制（土地所有制）也一样，它不但存在于奴隶制时代，也可能（在不同的地区，以不一的形式）存在于封建制时代。

东方所有制可以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段（奴隶制的、封建制的），与东方所有制有密切关系的东方專制主义也一样，有奴隶制时代的东方專制国家，有封建制时代的东方專制国家。古代埃及、巴比倫等是奴隶制时代的东方專制国家，阿剌伯哈里发則是封建制时代的东方專制国家。

我們現在專論古代东方專制国家，即奴隶制时代的东方專制国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东方所有制和东方專制主义問題时，虽已注意到亞述、巴比倫的資料（見1853年5月18日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但是，他們研究这个問題的基本根据是印度的材料。十九世紀后期以来，亞述学和埃及学均有極大的发展，古代东方的史料益加丰富了。新史料愈益証明馬克思恩格斯关于古代东方社会理論的正确性。像生物学必須溯源于它的奠基者达尔文一样，史学，其中包括古代东方史学，必須溯源于它的奠基者馬克思和恩格斯。

苏联东方学者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史学原理，利用日益增多的新史料，在古代东方史（特别是古代埃及和兩河流域史）方面創造了很多新的成就。但是，有关这些方面的許多問題，在苏联学者間意見也不是一致的。古代东方專制国家問題也一样，有些問題尚待繼續討論。我們現在利用古代兩河流域作为具体例子，主要根据И.М.狄雅可諾夫的主張，略論古代东方專制国家問題（参閱И.М.狄雅可諾夫：“上古苏美尔的国家制度”，“古代史通报”，1952年第二期；В.И.狄雅可夫和С.И.科瓦列夫編“古代世界史”，1956年版，第五、六、七各章）。

古代东方專制主义的制度不是自始即有的，它有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以古代兩河流域而言，至少在公元前三千年代中叶之前，即当上古苏美尔国家时代，还沒有形成东方專制主义的国家。

至少在亞卡得王国之前，兩河流域的統治者（苏美尔各城市国家的統治者）还不能就算是无限制权力的專制君主。他們在这时絕不能算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或唯一所有者。当时公社的土地，統治者如果需要，須向公社購买。甚至到了亞卡得时代，国王曼尼什吐苏还向公社买过土地（詳見И.М.狄雅可諾夫，“上古苏美尔土地买卖与苏美尔公社問題”，“古代史通报”，1955年第四期）。神庙的土地，国王也不得任意支配。有关烏魯卡基那改革的銘文說明了这个問題。神庙的土地（宁吉尔苏之田）被前一国王（帕达西）侵夺了，烏魯卡基那改革时即恢复神庙的原有权利（銘文譯文見三联即將出版的“古代埃及与古代兩河流域”史料集）。

当时苏美尔各国还有長老会議和民众会議，而長老会議对国王的权力还起作用。国王（帕达西或恩西，以及盧加尔）最初并非世襲，而是由貴族氏族中选出。国王的職能包括宗教的（最高僧侶）、軍事的（統帅）、經济的（神庙經济的領导者，灌漑工程的管理人）。当时还沒有常备兵，軍队主要出自农民。总而言之，当上古苏美尔时期，軍事民主制的殘余还濃厚存在，君主專制政治还沒有完全形成。然而与此同时，国王的官僚机構却已經出現，它以努邦德为首，在努邦德之下則有許多書吏。

由于調整灌溉系統的需要，由于經济的联系，苏美尔各邦逐漸趋于統一；而各国內部的主要矛盾（奴主与奴隶的矛盾；公元前三千年代中叶，在拉格什，奴隶人数約占居民的四分之一，参閱И.М.狄雅可諾夫：“論苏美尔城市国家的面积和居民成分”，“古代史通报”，1950年第二期）的尖銳化（公社成員为反抗奴化而斗爭，烏魯卡基那改革），更促使国家权力日益趋于中央集权化。亞卡得王国第一次把兩河流域南部（巴比倫尼亞）統一起来。据說亞卡得王国創立者薩艮就有常备兵5,400人。亞卡得諸王不断征服鄰国，号称“四方之王”。从亞卡得經烏尔第三王朝到古巴比倫时代，中央集权化（官僚机構）日益加强，終于徹底形成了东方君主專制形式的国家。

到了古巴比倫时代，国王在名义上已成为全部王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如果說，在有关烏魯卡基那改革的銘文中，拉格什的庇护神宁吉尔苏所握有的土地还不过是神庙的田地（与公社土地分开），且此庙田并非国王所有，那么，在汉穆拉比法典中，全部巴比倫已都成为主神馬都克的大地产，而管理万民的国王已由神的僧侶的地位进一步成为神的代理人了。与此同时，汉穆拉比法典并且暗示一切臣民是国王的奴隶（第一二九条）。在这里，我們見到了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相类似的記載。馬克思所提出的东方專制国家的三种職能（內部掠夺，外部掠夺，公共工程），在古巴比倫国家都具备，不过，在汉穆拉比时代，对外远征（第二种職能）不如以前各代（亞卡德，烏尔第三王朝）那么頻繁而已。

这个古代东方專制国家（汉穆拉比統治下的古巴比倫王国）是十分典型的青銅时代的奴隶制国家。它所以是一个奴隶制国家，是因为：第一，在这个国家里，兩个对抗的基本阶級（奴主与奴隶）关系是非常鮮明的。在汉穆拉比法典中，居民的成分有全权自由

民（阿維林）、非全权自由民（穆什欽努）和奴隶三大类；在自由民（全权的和非全权的）中虽然只有一部分是奴主，但作为自由民，他們和奴隶在法律上是对立的兩个阶級。如果不注意这一点，如果除去奴主和奴隶的对立关系，在汉穆拉比法典中便沒有什么阶級关系可言，而古巴比倫也就將成为“沒有阶級”的社会了！

第二，在整个巴比倫經济中，奴隶制經济在数量上虽然并不占居首位，但是，这种經济在全部經济中是先进的，主导的，而其余的經济則是直接地或間接地繼承前一社会阶段（公社阶段）的殘余；这些前一阶段的殘迹，尽管如何頑固地存留着，总是时时受着奴隶制經济的破坏，受着奴隶制經济的制約。自然，不应忘記，这是原始奴隶制时代，夸大奴隶制經济的意义也是不对的。

下面是古巴比倫王国的总的估价（譯自В.И.狄雅可夫和С.И.科瓦列夫的“古代世界史”，1956版）：

“在公元前十八世紀，兩河流域的政治、經济水平都已相当高漲。灌漑網的建筑技术有了改善，用以灌漑高地的抽水机也普遍流行；出現了改良的犂；在家畜中出現了馬。手工業有很大发展，特別是青銅的冶金术：青銅的刀开始使用了，手工業者的各种各色的青銅工具使石器和木器制造趋于便利。在巴比倫尼亞本地，以及在鄰近地区如埃蘭、叙利亞、亞述等，商品生产和商業关系都有了扩展。

“商品生产的发展使土地私有制趋于巩固，且促进奴隶制之发展。但是，私有制还是有局限性的（例如，遺囑的自由还不存在），而奴隶制还具有家長制的性質（奴隶可以有自己的財产，且可以和自由妇女結婚）。

“作为兩河流域史早期特色的王家、神庙和氏族貴族的大經济，現在或則已經完全消失，或則大大縮小。以剝削为数不多的奴隶为基础的中小經济变成典型的經济形式。如果不把债务奴隶制計算在內，那末自由民的家長制依附形式已經消失了；古鲁什大队（按系流行于烏尔第三王朝的被剝削的劳动者）也已經不見了。

“公社成員內部的分化破坏了近鄰公社（按即农村公社）的鞏固性，这种公社基本上保存着它的灌漑建設的权利，但是，家長制家族公社仍然繼續是經济的基本細胞。因高利貸与沈重的賦稅压迫而加深的財产分化，使广大的破产者阶層从公社中分出；他們中一部分在王家經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作为佃农或成为兵士，另一部分則脫离常軌，变成债务奴隶。

“汉穆拉比試圖稍微限制富有的塔木卡（按即商人高利貸者）的專橫：债务奴隶限以三年为期，高利貸者不得闖入負債者的房屋，向他强取債款，塔木卡如欺騙自已的助手則处以高額罰金，等等。所有这些办法都是旨在加强自由民阶級的統一性，并使自由民的各阶層团結起来，以对付奴隶。然而这些办法并沒有成功：从古巴比倫王国时代的通信中，我們知道塔木卡有破坏汉穆拉比法典規定的事——特別是他們有霸占不可讓与的王家佃戶和兵士的份地的事。因此，古巴比倫社会本質上不仅有自由民和奴隶的对抗，而且有自由民中不同集团的对抗。

“这个保衛統治阶級利益的奴隶制国家是一个无限制王权的君主專制国，国王通过許多官吏和法官来实行統治”。

古巴比倫王国的总的估价不但告訴我們这个王国的社会性質（奴隶社会）和这个王国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奴隶制經济的发展），而且給我們指出了它的內部的主要矛盾（奴主与奴隶，富者与貧者，全权者与无权者的矛盾），因而也給我們指出了这个王国灭亡的原因：王国因內部矛盾加剧而削弱，当鄰近的新兴部落或强大国家侵入时，它就被灭亡了。敌人的征服暫时解决了这个国家的內部矛盾，而最終又把当地社会的奴隶制向前推进一步。

必須指出，这个專制国家（以及与之类似的古代东方專制国家）內部矛盾的加剧，是奴隶制发展的結果。奴隶制的发展使自由民日益加多地失業破产，淪为佃农、雇工，甚至淪为债务奴隶。以汉穆拉比为首的代表統治阶級利益的奴主国家，不得不实行一些毫无效果的保护普通自由民阶層利益的措施（限制债奴期限之类），巩固以自由民为基础的軍事力量的措施（保护常备兵的田地）。然而这些措施并不能緩和古巴比倫国家的內部矛盾。

这些專制国家的內部矛盾有时发展到发生人民暴动的地步。古巴比倫王国曾否发生暴动，沒有史料可考；但繼承它的遺产的卡斯特人的巴比倫王国，在其后期（当公元前1345年），就发生过公社成員因不滿而起来暴动的事：国王被杀了，新立的国王出自不知名的氏族。只是依靠亞述的援助，暴动才被压平，卡斯特王朝才能恢复它的統治。

趁这些專制国家內部矛盾深刻的机会而入侵的部落，往往是比較落后的新兴的部落（或国家）；落后者之所以能够战胜和征服先进的国家，是因为前者較少內部矛盾（奴隶制尙未发展）而由自由民組成的軍队力量較强，而后者对此新兴力量无法抵抗。卡斯特人（山居的落后部落）之侵入巴比倫，即是一个好例

十八世紀末叶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

魏　越

土地問題是十八世紀末法国資产阶級革命的基本問題。革命前的法国，資本主义經济已有所发展，但封建剝削制度仍占統治地位，法国还是一个封建的君主專制国家。而封建制度是建筑在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的。十八世紀的法国是一个拥有二千五百余万人口的农業国家，但占全人口約百分之一的貴族統治集团（王室、教会高級僧侶及貴族領主）却占有全国土地的十分之九（包括世襲租地农所占用的土地）。农民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租种地主的土地。法国的农奴制早已消灭了，农民人身上虽是自由的，但实际上仍为繁重的封建地租及其他封建义务束縛于土地之上，对領主仍保留着半农奴地位的依从关系。封建統治集团就是依靠对农民的殘酷剝削維持其統治的。因之，法国革命时期土地問題的实質，就是农民为消灭封建大土地占有制的斗爭，同时也就是为消灭封建的統治制度并为資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的斗爭。

十八世紀法国，农奴制尽管已經不存在了（少数地区除外），但是农民的各种封建租税及負担以及領主享有的各种特权，几乎都还照样保存着。农民要向地主繳納佃租及代役租税，这已經是十分沉重的負担，还有买卖税、繼承税以及其他各种税收，領主特权……一如往昔仍然有效。特别在十八世紀下半期，封建反动势力加重对农民的剝削，往往恢复了早已不存在的領主的封建特权，甚至另外捏造新的名目。此外，农民还要向教会繳納什一税，向王室繳各种税捐，如人丁税、土地税、所得税（廿分之一税）以及間接税（如盐税）等。地方官吏还要巧立名目，剝削农民。这种种貢税及封建負担，本質上都是由于农民对領主的封建隶属关系以及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来的。总之，这种封建的重荷，像千万条鎖鍊一样，捆縛着农民。他們向王室、領主教会的繳納占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許多农民辛勤劳动一年，仍是一无所有。农民破产，流为乞丐。据估計革命前，农民淪为乞丐者就有二百多万。所以十八世紀下半期，大规模农民运动遍及全国。

十八世紀，法国农業中資本主义关系已經有了发展。如东北地区，有些地主使用机器与雇佣工人进行資本主义大农場經营，他們在經济利益上来說是与資产阶級一致的，在革命初期参加了反封建的革命斗爭。与此同时，农民分化过程也已相当显著。經济力量較强的富裕农民也使用雇佣劳动，放高利貸进行剝削。但是，十八世紀的法国农村主要矛盾还是封建地主与全体农民間的矛盾。封建制度，領主的封建剝削，王室与教会的税收是农民群众痛苦与貧穷的根源，并侵害了一切农民集团的利益。所以农民各阶層一致起来反对封建制度，但基本农民群众则是反封建势力的最强大力量。正是他們的斗爭才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一　君主立憲派与吉倫特派執政時期的土地政策

1787年和1788年法国发生了兩次歉收，并遇到工商業危机，人民起义遍及全国。1789年春，农民紛紛向三級会議提出請願書，要求廢除領主封建租税、教

了。

当奴隶制还在上升时期，外敌之乘机侵入，并不能消灭奴隶制，反之，在内部矛盾被暂时解决或緩和之后，奴隶制又向前发展了。卡斯特侵入之后，巴比倫經济曾有一度衰落，可是，到了卡斯特的第二期或后期（从公元前十五世紀末起），私有經济又发展起来了。从古巴比倫至新巴比倫，一千余年中，巴比倫尼亞各地的奴隶制一直在向上发展；甚至到了波斯帝国和亞力山大帝国时代，巴比倫还是奴隶制发达的一个中心城市。

古典城邦（共和国）的灭亡，也是由于奴隶制的发展：奴隶制的发展促使土地集中，自由民破产，因而城邦的公民基础被破坏，而城邦也随之灭亡（罗馬）或名存实亡（雅典）了。自然，古代东方專制国的兴

会什一税、国税等，并要求归还地主夺去的公社公有地。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攻陷了巴士提獄，推动了全国城乡革命运动的高漲，而乡村普遍的农民运动又巩固了巴黎人民取得的胜利。但是大資产阶級則侵吞了人民的胜利果实，国家政权轉入大資产阶級自由派貴族代表居多数的立宪会議手中了。他們在經济上本与封建貴族有着密切联系的。他們只希望革命在进行若干有利于他們的改革下結束。他們深恐人民革命运动繼續发展，因之时时打算与王室貴族妥协，而获取像十七世紀英国資产阶級革命那样的結果。这显明地表現在他們所执行的土地政策上面。

1789年七月下旬，农民运动空前高漲。农民群众并未等待立宪会議来为他們解决問題便独立行动起来，这种情形就迫使立宪会議停止宪法討論，着手研究土地問題。八月四日召开了著名的夜間会議。会議上，对农民革命运动感到恐惧的貴族代表如諾亞伊子爵及厄基养公爵首先提議廢除封建义务及貴族特权。接着又有兩个教区主教声言应放弃什一税。僧侶及自由派貴族代表們也都表示贊同。但是在他們漂亮的演說中，却隐藏着一个大陰謀。兩个貴族及主教在建議廢除封建义务时，都提出了一切因封建地产而有的封建負担，必須由农民出錢贖买。他們說一切財产都是神聖的，貴族如沒有得到补偿而放弃財产，这是为“公道所不許的”。他們所提出的贖金有多少呢？大約要等于农民所交的三十年的貢賦。可見，八月四日夜間会議对农民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大騙局而已。

随后，在八月五、六、十、十一等日，立宪会議所通过的决議都重复了这种思想。决議案的第一条說会議“将完全廢除封建制度”，但是其他各条款的規定，只是廢除了与人身义务有关的一些領主封建权利，其他一切封建租税或負担則必須由农民贖偿（还要先征得地主的同意）。何況八月的决議案也还沒有規定在何时以及用什么条件与方法贖回，因而八月有关土地問題的决議案是完全站在領主立場上，为領主利益制訂的法案。尽管它打击了旧制度，但对农民仍是一个大欺騙。到1790年上半年，立宪会議根据八月决議案頒布了一系列有关土地問題的法令。这些法令只是无偿地取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封建义务与繳納，而对兩千多万农民所迫切关心的主要問題——无偿廢除各种封建租税（包括什一税在內），归还領主夺去的公社公有地等則未予解决。法令規定封建义务在农民未贖偿前，一切租税照常繳納，法令規定“所有各領主歲入的义务，无論其为現金、谷物、家禽、各种粮食以及地产果实等……这些义务，均由領用土地者向地主繳付，其領用土地一天即須繳付一天”①。法令还規定所有各种临时附加税也都是由于“附加于財产及土地占有之变卖而发生的”，必須贖回，繼承税等也必須贖回。規定贖偿条件又十分苛刻。除了要繳納巨額贖金以外，农民贖偿时要以整个公社为單位，而且必須首先繳清过去的“欠債”在地主同意后才可进行。对于公有地問題未予解决。对于教会什一税問題規定凡已轉卖归私人的部分，农民必須贖回。至于教会仍在征收的則可廢除，但在未找出对教会的补偿办法前，农民要繼續繳納。实际上什一税在1790年前一直仍在繼續征收的。总之，这些法令所規定的条件，即使較富裕的农民也无法贖偿。无怪农民称这些法令为“惡毒的法令”。所以1790年农民运动繼續发展，自动夺回公社公有地。許多封建領主紛紛逃往国外。大資产阶級、自由派貴族的代表立宪会議預見到农民必然会反对这些法令的。因之立宪会議在制定这些法令的同时，就頒布了鎮压农民运动的法令。1790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通过法令，各省市政机关必須对农民运动采取严厉鎮压措施，因农民运动使地主所受財产損失必須賠償。六月間通过了更严酷法令，規定农民在贖偿前必須照常繳納各种封建租税，任何人不得借口訴訟拒絕繳付什一税或其他貢賦，否則将引用二月法令給以严厉懲罰。

1789年十一月二日，立宪会議曾通过了沒收教会土地的法令（随后在1792年三月立法会議又通过沒收逃亡貴族的土地），把沒收来的教会土地宣布为“国有財产”，由国家出卖。1790年五月曾規定允許以小塊出卖，分期付款。但在六月間就取消了这項办法。土

① 見克魯泡特金著，楊人楩譯：“法国大革命史”上册，1931年北新書局版，第234頁。

衰过程和古典城邦并不相同：古典城邦以古典所有制（小所有制与公有制）为基础，而古代东方專制国則以东方所有制（基本上是公社所有制）为基础；古典城邦公民破产后的出路是游民无产者，而古代东方專制国自由民破产后的最后出路是債务奴隶；古典城邦灭亡后奴隶制得到充分发展（罗馬），而古代东方專制国家灭亡后奴隶制仍未能充分发展（古代东方社会的特点：同时剝削奴隶和自由农民）；古典城邦灭亡后代之者是奴隶制帝国，而古代东方專制国家則仍以專制国的形式相更替。

在古代东方各專制国中，古巴比倫自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东方各地奴隶制国家各有其自已的特点，不应当不考慮具体条件而把古巴比倫專制国兴亡的規律任意应用到别的国家来。

地仍以大塊出卖，訂价又高。当有許多农民結合起来，打算集体購买时，又不被允許。結果这些土地大部分都落入資产阶級富农之手了。

这就是立宪会議时期金融資产阶級、自由派貴族的土地政策，这就是他們对农民所作的一切。显然，阶級本質决定了他們所采取的土地政策。这种政策說明在法国仍旧保留中世紀土地占有制已属不可能了，資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打碎它，农民运动要求徹底摧毁它。在这种情况下，貴族企圖使农業中資本主义的发展尽可能走有利于地主的路綫。貴族地主企圖把土地留在自己手內，迎合資本主义的发展，以保持他們的特权。这种政策，就正如他們要保留君主制度一样，要保存旧土地占有制的基础，在人民群众特別痛苦的条件下去适应資本主义的发展。事实說明，革命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由于君主立宪派（包括立法会議时期执政的斐揚派）惧怕人民，反对人民的革命而在一切問題上都采取了向王室封建势力妥协的政策，所以遭到城乡劳动人民的普遍的反对。1792年八月十日巴黎的武裝起义推翻了他們的統治。結果在立法会議內，比較先进的資产阶級派別——吉倫特派取得統治地位并掌握了政权。法国革命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資产阶級共和政体时期。吉倫特派是代表大工商業資产阶級利益的政治派別。在社会經济政策的許多方面，他們較立宪派要前进一些。但是他們仍然漠視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不顧和貴族断然絕交。他們所关心只是他們从革命中所取得的旣得利益，而国家所出卖的土地也大多落入这个阶層手中。因此，和过去立宪派一样，他們所关心的只是停止革命的发展，确保旣得胜利果实，挽救王室貴族不致徹底灭亡。所以当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进一步深入时，也如立宪派一样，他們倒向封建反革命陣营了。

吉倫特派的这种政治态度同样明确的反映在他們的土地政策上面。

吉倫特派的土地政策比立宪派前进了一步，这是八月十日人民起义的結果，也是1791年以来农民群众繼續斗爭的結果。吉倫特派在八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制定一些有关土地的法令。这些法令規定：取消农民因不繳納封建負担而須受法律处分的法令。減少了农民贖买封建义务时的贖償費，并且由个人（而不是由整个农村公社为單位）来贖买。贖償时也不必再繳付旧日积债。若干次要稅金如遺产稅、买卖稅、使用磨房榨酒机費用等无偿的取消了。但是，主要的封建負担如地租及代役租等（对农民說来是最沉重的常年租稅）农民仍然要贖回的，这一点基本上是与立宪派相一致的。实际上就是說封建权利要繼續有效。不过教会什一稅及对教会的劳役实物繳納等算是取消了。关于亡命貴族及王室的土地予以沒收，并把这些土地出卖。吉倫特派执政时期曾經規定把土地分成小塊——二至四亩出卖。如农民仍然买不起，可以租佃，只要繼續不断的納租，經过若干时期，可成为租用者私有。这正是当时人民革命运动的压力結果。但是，这項法令在十月間即借口調查不够而被取消，这些土地，仍大量落入了有产者手中。至于关于公社公有地問題，仍然悬而未决。曾經頒布法令要把公有地在农民中間分配。但是吉倫特派主張把公社土地分配給公社內的常年居民（即公社內原来居民，多为較富裕者），而不分配給后来移居公社而多为貧苦的农民。显然这是一条有利于乡村富裕农民的法令，这也正反映了吉倫特派的阶級本質。不过，关于这一点，八月土地法令規定的并不十分具体，也未能实行，因为这种企圖受到貧苦农民的頑强抵抗。

由此可見，吉倫特派的土地政策，虽然較君主立宪派前进一步，但并不能滿足基本农民群众的要求。农民无力負担贖金，他們要求无偿地取消一切封建义务。显然吉倫特派是不能滿足劳动农民群众的要求的。

由于遭受封建压迫最沉重的城乡貧民生活沒有得到任何改善，所以这时在人民群众当中产生了平均土地，消灭財产不均的思想。“忿激派”就是其代表。他們从1792年秋起，宣傳頒布均分土地的“土地法”思想，要求普遍平分土地，使每个人所領用的土地不要超过其所能耕种的数目，要求徹底改善下層劳动人民的生活狀况，打击投机者。雅各宾派也不同意他們的这种“土地法”的思想。1793年初，国民公会曾通过決議，凡宣傳“土地法”思想的均处死刑。然而，雅各宾派是懂得与人民群众联盟的重要性的，所以在反对吉倫派的斗爭中，还容忍了“忿激派”的若干要求，并与“忿激派”一起发动了人民起义，战胜了吉倫特派。

二　雅各賓派的土地政策

雅各宾派是法国資产阶級革命中的資产阶級革命民主派。他們采取了向封建势力資产阶級反革命派坚决斗爭的路綫，并与人民群众結成了联盟。革命的农民与平民群众支持并推动了雅各宾派前进，实行了坚决的措施。雅各宾派知道要与人民群众結成联盟，就必須滿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物質要求。他們了解要眞正把基本农民群众团結、动員起来，就必須徹底摧毁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必須把地主从

公社夺走的土地归还农民，无偿地取消一切封建义务及貴族領主特权。雅各宾派基本上作到了这一点，因而也就使法国革命取得了偉大胜利。列宁在論到法国革命时期农民土地問題时就曾說：“……用眞正革命的手段摧毁那过时的封建制度，使全国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过渡到自由的农民土地占有制，并且是用眞正革命民主主义的速度，坚决手段，毅力和忠誠精神来实現这种过渡，——这就是那些以‘神奇’速度挽救了法国，而把它的經济基础改造革新了的物質經济条件。”①

所以雅各宾派在执政最初时期就解决了法国資产阶級革命的基本問題——土地問題。

1793年六月三日，雅各宾派通过国民公会頒布了一項法令，把从国王、逃亡貴族及教会沒收来的土地分配和出卖。开始时曾允許无地与少地农民分得少量土地，但随后又規定把沒收的土地分为小塊出卖，款項可在十年內分期付清。以后又曾規定无地农民可在二十年內偿清。由于这一措施，許多农民获得了若干土地，特别是在法国的东部地区。这一措施大大破坏了法国貴族地主的土地所有制。

六月十日国民公会又通过了第二項土地法令。法令規定把地主二百年来从公社夺去的土地归还給公社农民，由公社农民自願决定进行分配。法令这样規定：“所有公社共有土地，在共和国中所称为荒地或廢土等名义的，以及其他任何名义的，都是居民之全体，或公社之各員，或公社之各区团的財产，而在性質上講也都是属于他們的，各公社有权收回”②，法令第二十五款規定所有因1669年諭令而使地主圈占公社土地森林等的通令、內閣法令以及法院判决等統归无效。就是在1792年八月吉倫特派所頒布的地主对土地能証明有四十年占有即可确定个人私有权的法令也宣告无效。法令認为“合法的权利决不能由封建势力产生出来”③，这一法令規定无論用什么办法地主从公社夺去的土地应无条件的归还給公社。法令还規定关于公社土地分配的办法。所有公社农民“不論年歲与性別，缺席或亲临”，“不問其为农場上劳动人或家庭侍奉人，在公社中居住一年者，均得享受均分，公社土地之划分給公民者，在十年之內，不能因債务而將其沒收”④。公社土地分配与否，由公社开会（二十一歲以上的人参加）討論决定，只要有三分之一人数贊成平分者，即須平分。这一法令頒布后，法国的北部、南部和东部大多数公社土地都进行了分配，大量农民获得了公社土地（分配是以个人或家庭为單位）。但是在中部，特别是在西部如汪达与布列塔尼等地公社土地都沒有进行分配，因为这些地方仍在反革命势力控制之下。这一些法令的执行使几十万农民成为小塊土地所有者了。

雅各宾派的另一重要措施就是七月十七日所頒布的法令。法令規定“一切昔日貴族的負担、封建的权利、无論是永久的或临时的，甚至去年八月二十五日之法令所保留的，概不需贖回而廢除”⑤。这就是說一切凡是起源于封建性的常年負担（地租、代役租等）或临时租稅全被取消。农民成为土地的所有者了。法令并进而規定所有記載封建权利与义务的文書契約均須焚毁，不須隐藏，違者將处以五年徒刑（这是1794年五月十八日的法令）。这一些法令摧毁了法国封建統治势力的經济基础，眞正的結束了法国的封建統治。

由此可見，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是符合广大农民群众利益的。君主立宪派与吉倫特派所不能解决的問題，在雅各宾專政时期断然解决了。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群众在1789年請願書中所提出的要求：廢除封建义务，归还公社公有地以及取消貴族特权、教会什一稅等。所以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徹底破坏了法国的封建土地关系，摧毁了封建貴族的土地所有制，扫除了农業中資本主义关系发展的障碍。由于封建义务及貴族特权的取消，許多地区公社公有地得到分割，众多的农戶得到了土地，因而法国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曾得到很大的发展，使小农經济在法国国民經济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而这一个特点不能不在法国以后历史发展进程上打上烙印。

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是进步的革命的政策。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法国革命是早期的資产阶級革命，当时資产阶級还是一个革命的进步的阶級，而資产阶級民主派的力量比較强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極性与主动性又特别显著，劳动人民推动了資产阶級革命派不断前进并采取了这种革命的土地政策，而这也正符合于資本主义发展的需要。

但是，即使作为革命資产阶級代表的雅各宾派也表現了它的資产阶級局限性。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依然忽視貧苦农民的利益。因为甚至在最优惠的条件下，一貧如洗的貧苦农民仍然无力購买土地。他們要求无任何代价的获得土地，要求頒布均分土地的“土地法”。但雅各宾派拒絕这样作。罗伯斯庇尔就曾

---

① 列宁：“災祸临头和防止之法”。“列宁文选”兩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2頁。

② 見克魯泡特金著楊人楩譯：“法国大革命史”下册，1931年北新書局版，第145頁。

③ 同②，第146頁。

④ 同②，第142頁。

⑤ 同②，第148頁。

說：“土地均分法不过是坏人拿来恫嚇笨伯的一个可笑幽灵”。这就无怪乎雅各宾派执政时期一再拒絕来自貧苦农民中間的請願書。雅各宾派在出卖“国有财产”时，最終也是有利于較富裕的农民的，如因战爭及財政困难，曾規定了能立刻付淸全部款額者有优先購买权。就是公社土地的分配也沒有滿足与照顧无地少地貧苦农民的利益，在分配之前，許多公社土地早已落入較富有农民之手了。其次，雅各宾派只是廢除了封建的土地租佃关系，并未消除农村中一切剝削，沒有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它沒有也不可能摧毁大土地私有制。所以它并不能完全滿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也不能解决全部社会經济問題。这明显地表現了其資产阶級的局限性。

所以，雅各宾派土地政策在当时是具有極其重大意义，并为新的生产力发展創造了良好条件。但它也只是取消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而代之以資本主义的剝削制度。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小农經济必遭破产，大多数农民要走破产与灭亡的道路。法国在革命之后，“小塊土地所有制”随着資本主义經济的发展終于逐漸瓦解崩潰了。

三　法国革命时期土地政策中的兩条路綫

資产阶級革命时期，农業中資本主义的演进有着兩条道路，列宁称这兩条道路为“普魯士式的道路”与“美国式的道路”。农業資本主义发展走“普魯士式”道路的基本特点是：中世紀的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关系，不是用革命的手段消灭的，而是封建大地主的經济緩慢地适应于資本主义的发展，轉变为資产阶級地主經济，同时分化出少数富农。这一条道路也可造成資本主义經济发展的条件，但資本主义在很長时期內將保存着半封建的特征，貴族地主不仅在經济生活中而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長期占着重要地位，并使农民在数十年內受着最痛苦的盤剝。对农民說来，这是一条破产的道路，最痛苦的道路。在資产阶級革命中，大資产阶級及貴族地主力圖使这条道路得以实現。所以这是一条地主的道路。另一条“美国式的道路”，就是采取革命办法消灭封建的土地占有制（或者根本沒有什么封建地主經济的存在），在此种場合下，农民經济占着优势，而后逐漸演化为資本主义的大农場經济。这就是說，农業中資本主义的发展是在以小农經济占主导地位情形下发生，摧毁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并能获得土地。当然，归根結蒂走这条道路大多数农民仍然要破产的，但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一条革命的进步的道路。

十八世紀末法国資产阶級革命前，农業中資本主义演进的这兩条道路的可能性都存在着。在法国有一部分大地主，特别是受到英国革命的影响，已在采取資本主义的經营方式，并圈占农民的土地。另方面，法国农民分化过程已十分显著，小部分农民已上升为富农，十八世紀下半期农民运动普遍发生，要求徹底摧毁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并使农民获得土地。所以当时，資本主义的发展要求突破并消灭封建土地的占有制关系。但是采取那种方式，走那一条道路，地主阶級与农民群众为实現改革的方式进行着剧烈的斗爭。法国农業中資本主义的发展究竟走那一条道路，使那一种方式占主导地位，这正是十八世紀末法国革命中解决土地問題的关鍵所在。

革命时期，法国君主立宪派的土地綱領就是要使农業中資本主义的发展走有利于地主的道路。他們了解到保存旧的封建土地制度已不可能，必須去适应資本主义的发展。但他們打算牺牲农民的利益来解决土地問題，打算結成并保持資产阶級与貴族地主之間的联盟，而获得像英国革命那样的結果。吉倫特派的土地政策基本上也是一样的。法国地主及大資产阶級所采取的办法，实行的基础，就是利用革命后所取得的政权，用强力迫使农民用高額贖金去贖买地主所享有的封建义务与特权。其結果当然是农民得不到土地。同时，无論在立宪派或吉倫特派統治时期，一般农民很少能获得土地的，所沒收的教会土地及逃亡地主土地都落入城乡資产者之手了。他們頒布了鎮压城乡劳动人民群众的法令，准备用强力推行有利于他們的土地綱領。但是法国农民取得其他劳动人民的支持，頑强的反对了这条路綫，坚决要求走在当时有利于农民的革命道路。从1789至1793年农民运动一直是在发展着，其規模与力量是如此壮大，致使資产阶級革命民主派能坚决的采取革命方式摧毁了封建制度及封建的土地关系。

革命民主派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虽未完全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但其主要方面則是用革命方式徹底摧毁了法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并使众多的农民成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这样就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情緒，扩大了国內市場，給資本主义的发展創造了有利的条件。所以十九世紀初年，法国工农業經济有了新的高漲，資本主义迅速地发展起来。然而，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即使走較民主的道路——如雅各宾的土地政策，农民群众也不可能获得眞正解放的。因为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小农經济必然要走上破产道路的。这是因为資本主义发展的規律就是大生产排挤、压倒小生产，在农村中就是农民分化过程的迅速发展，少数人上升为富农，而广大农民群众 （下轉54頁）

資料

世界中世紀史原始資料选輯(二)

关于庄园經济

查理大帝关于管理庄園的詔令

耿淡如 譯注

在西欧封建社会形成的时期，自然經济占着統治地位，而庄园組織便是这种經济的主要形式。庄园的一切經济活动主要是为着滿足封建領主生活上的需要。庄园所生产的农产品及手工制品除很少例外外，都是消耗在庄园之內。那个时候，即使王室的經費，也是依靠領地內庄园的收入，国庫就設在庄园之內。为便于供应起見，王室常从一个庄园移到另一个庄园，就地消耗其倉庫內的儲藏。这一点可說明为什么查理大帝在很長时期沒有固定的首都，也可說明为什么他不厭煩瑣地規定并参与王室大庄园的管理。

下引文件，是法蘭克国王对王室庄园管理人的詔令，一般認为約在800年时由查理大帝頒布的。这詔令很詳密地規定了关于管理王室庄园的办法，反映出当时的庄园經济的內容。关于农業經营及园艺，关于牧养牲畜及养蜂养魚等，关于制造一切飲食品，家具以及武器等，关于庄园內的布置設备和剝削形式，等等，可說是規定得面面周到，无微不至。从其內容方面，不仅可看出农業及和它結合的手工業的发展程度，而且也可窺見当时封建領主的生活情况。例如，在飲食方面，列举各种食品的名目和制法。在飲食用具方面，也一一列举，应有尽有，惟其中缺少釵子和盆子，由此可見在查理大帝时代西欧人还是用手来抓食的。又在庄园里住着各式各样的工匠，从厨師起直到武器匠止，这样可就地制造所需的一切东西。所以在庄园范圍內，的确做到經济上自給自足的程度。但应該指出：（1）这里所指的庄园是帝王的庄园，最典型的庄园，一般封建主的庄园可能沒有这样完备。（2）这里所規定的办法是王室所認为最完善的管理办法，可是实际上究竟被执行到若何程度却是一个問題。（参閱齐思和：西欧中世紀的庄园制度，見本刊1957年7月号，頁33—40。）——譯者。

1.茲希望：朕的庄园，即由朕确定为供应朕自己需要的庄园，应完全为朕而不为别人服务。

2.应好好地待遇朕的臣民，誰也不得使他們陷于破产。

3.管理人不得使用朕的臣民为自己服务，要求他們为自己担任劳役，采伐〔树林的〕物料，及其他工作；也不得收受他們的任何礼物——不得收受馬匹、公牛、母牛、猪、綿羊、小猪、小羊及任何其他东西，惟南瓜、园艺产品、苹果、母鷄和鷄蛋不在此限。

4.如果朕的臣民中有犯着盗窃或其他罪行致使朕受到任何損害者，应付全部賠償；并須依法应受鞭撻，除杀人放火犯另有規定外，又須付罰款。对其他人員〔的侵犯〕，也应依法办理，滿足受害人的要求；像对朕有所損害一样，如上文所說，又应加以鞭撻。但凡住在朕的田庄①或庄园內的自由人，如果犯了什么罪的話，应依他們的法律懲治，而他們所繳的罰款，不論牲畜或别种东西，概归于朕。

5.当朕的管理人应执行朕的工作——播种或耕耘，收集庄稼、干草或葡萄——的时候，各应在工作时，随处仔細視察，并依办事上的需要，发出命令，使可办得完善妥貼。如果他本人不在，或者有些地方他不能〔亲自〕去，他得从朕的臣民中选派优良使者或其他可靠的人去視察朕的事务，使可妥善执行。但管理人必須愼重选拔可靠的人去做这些視察工作。

6.茲希望：朕的管理人把全部收穫的十分之一完全給予朕田庄內的教会；而对其他教会我們概不付給什一稅，除非它們一向是建立在那里的。又对于这些教会，不准別的僧侶，只許朕的僧侶——属于朕的臣民或属于朕的教堂——去掌管。

7.各管理人应完全办好那些通知他应办的职务；如果需要多些服务人員，他得考慮：应否增加〔人員来完成这項〕职务，还是〔为此規定〕做夜工。

① 田庄（Фиск）是房屋和土地混在一起的农村，在經营管理上有些完整性。一个田庄可包括若干庄园。

8．朕的管理人应接管朕的葡萄园，并应好好照管；应把所制的葡萄酒倒入桶內，并仔細察看，使它决不会发酸；又应購买别种葡萄酒——普通酒，来供应国王的庄园。如果要采購这种酒的数量超过于为供应朕的庄园所需者，应禀告朕，而朕將通知：朕对此事的意見如何。而且应把朕葡萄园內的插枝〔葡萄藤插枝——譯者〕送来，以供朕的需要。还应把从应〔繳付〕酒的朕庄园所征收的酒，运入朕的酒窖里。

9．茲希望：各管理人在其所管区內应使用像朕宫廷里所用的同样度量衡——摩第、撒克，每8个撒克作一个塞吐①及哥洛②。

10．朕的庄园長、管林人、馬夫、倉庫管理人、工头、收稅員及其他职員应做种田的工作，并为自己的田宅，应繳納小猪。作为替代手工劳动，应好好办理自己的职务。如果有任何庄园長享有采邑的話，应派遣自己的代理人，使他可为这个〔采邑〕做手工劳动及其他职务。

11．任何管理人，无論如何，不得自己寄宿或把自己的狗寄宿在朕臣民的家里或〔朕的〕树林中。

12 任何管理人，不得把关在朕庄园里的朕的人質，作为自己的附庸。

13．应好好照管牡馬，就是种馬，决不可使它們長久站立在一处，使不致因此死亡。如果其中有任何种馬变为不正常或衰老或甚至死亡事情，应在它們和牡馬交配时期来临之前，〔把此事〕赶快向朕禀告。

14．应好好照管朕的牡馬并及时把小牡馬分开；如果有許多小牡馬，〔也〕应把它們分成特別馬群。

15．应在冬季聖·馬丁节前，把小牡馬送到宫廷。

16．茲希望：如果朕或皇后指示某某管理人做某某事情，或者朕的显貴——侍膳官或献杯官——以朕或皇后的名义給管理人发出某种命令，应在所指定的期限內照办。如果有人由于疏忽，就誤了〔执行期限〕，应放弃領取飲料的权利，从向他通知此事时起，直到他在朕或皇后面前恳求而获得准許解除〔弃权〕时为止。如果管理人去任軍事、守望或〔其他〕国家职务，而把某种命令交給他的下属，而他們并未按期执行，他們应徒步走到宫廷，放弃領取飲料和鮮肉的权利，并須說明为什么发生耽誤期限的情况；那时，他們能否当場获得判决，悉听朕和皇后的便。

17．各庄园內有多少人在其支配之下，就应該提供多少人去照管那为朕所需的蜜蜂。

18．在朕的磨坊里，不論怎样的磨坊，应有母鷄和鵝，而且愈多愈好。

19．在朕的主要庄园倉庫里，应保养至少100只母鷄，至少30只鵝。而在农庄里应保养至少50只母鷄，鵝也不得少于12只。

20．各管理人应留心：各种产品在整个一年內大量源源流入〔領主的〕庭院；此外，应依次輪流察看它們，三次，四次或以上。

21．各管理人在〔領主的〕庭院里应保持朕的魚池，如果那里已有魚池；如果那里可以增加魚池，就应增加；如果那里原来沒有魚池，而現在可有，就应建造新的魚池。

22．凡是有葡萄园的人应保持〔在儲棧里〕至少3捆或4捆〔干〕葡萄。

23．在朕的各庄园里，管理人应保持牛、猪、羊、母山羊、公山羊的尽量多的畜棚，沒有，是不行的。此外，应保有劳动牲畜，并把它們分給奴隶，来进行他們的职务③；由于〔这項〕服务，轭具和载貨車在領主的需要上决不得有短少情况。当备置飼料的时候，也应具有狗、跛脚的而非生病的公牛、无疥癬的母牛或馬及其他无病的牲畜的飼料。所以，像上面所指出，轭具和载貨車是切不可短少的。

24．各管理人，在須供应朕的膳食的时候，应負責使所供应的一切东西色样好看，品質优美，也須極其認眞地制备得清潔；又各人，在供应朕的膳食的时候，在其职务上各应具备每天用谷物养肥的兩只〔母鷄〕而其他食品像面粉和鮮肉也应完全良好。

25．关于放牧猪群〔于树林里〕事，到曆本上的九月应布告是否准行④。

26．庄园長所管理的地区不应超过于他們在一天期內能够周巡視察的范圍。

27．朕的〔領主的〕住宅应經常具有生火的爐灶与看門人，俾可安全。所有使者或差人在来到宫廷或返回〔家里〕的时候，决不得寄宿于領主的庭院，除非得有朕或皇后关于此事的特殊命令。但是郡伯由于

---

① 一个撒克（Сенстарий）等于$\frac{1}{16}$摩第（Модий），一个塞吐（Ситул）在查理大帝时代等于8个撒克，就等于半个摩第；一个摩第（不僅是谷物的而且是液体的旧度量衡）等于$52\frac{1}{2}$公升。

② 哥洛（Короб）等于12个摩第。

③ 关于管理人的“职务”〔服务〕在庄园詔令里，不止一次地提及（第7,23,24,30,59,61各節）。“职务”这个專名，用以指示他的特別役务，就是在一定时期之內以其地区內的产品来供应王室的膳食及宫廷的一般需要。这項“职务”和国王来到管理人所管的田庄相联系的，但也包括这种供应，卽国王在附近庄园里，管理人也应向国王提供全部必需品。

④ 就是，取决于收穫的飼料。

自己的职位关系，及历来照管使者和差人的人們，以后还应照例照顧馬匹及一切必需品，使他們能平安地来到宮庭和返回〔家里〕。

28．茲希望：在每年四旬齋棕櫚主日①（叫做Осанна②），〔管理人〕应依照朕的命令，在朕知道本年度朕收入总額賬冊后，应把朕經营所得的款項送到。

29．关于朕臣民中要提出訴訟的人，〔指令〕各管理人去了解情况，使他們无須来到朕面前申訴；不容把規定工作的日子白白地花費。如果朕的奴隶方面需要求得正义，他的头子应尽力支持他的立場；如果他絲毫不能爭得正义，也不得使朕的奴隶因此感受苦悶；但是他的头子应把情况，或者亲自或者派人向朕稟告。

30．茲希望：朕的管理人应把各种产品分成兩类：一类是朕所需要而必須提供的东西；另一类是为了战争必須从住宅和牧人方面用載貨車裝运的东西，使可〔精确〕知道究有多少可派作这項用場。

31．每年应划出那必須发給妇女房間內依靠〔領主〕的經費生活者〔食客〕的东西，并应及时全部分发；勿忘向朕稟告：派什么用場，并以那兒拿来。

32．各管理人应注意經常具备头等良好种子，或者通过購买，或者用任何其他方法〔来获得〕。

33．在种子及〔其他〕开支都已安排好后，各种产品的剩余，在得到联命令之前，应妥为保存，以便依照联的命令来出售，或者留存倉庫。

34．应尽力监制一切制备的或用手做成的东西，就是：脂油、醃腊肉、火腿、鹹肉、葡萄酒、醋、莓果酒、熟酒、鹹魚、芥末、干酪、植物油、麦芽、啤酒、蜜糖、自然蜜、蜜腊和面粉——这一切应制备得極其整潔。

35．茲希望：用肥羊或猪来制备脂油；此外，各庄园内应保持至少兩头养肥的公牛，〔以便〕当地使用它們来制造脂油，或者把它們牽到朕处。

36．应好好保护森林和朕禁伐的密林；如果那里有适合于清除的地方，則加以清除，使田地不致長滿着树林；如果那里应有树林，决不容許把它們砍伐和毁灭；在朕禁伐密林中的野兽，应小心保护；也应为朕关心鷹和雞鷹；又应認眞收集这項③該征的租稅。管理人、庄园長以及他們的人員，如果在朕树林中的牧場上放牧猪群，应自己尽先繳付那規定的什一稅，作为良好示范，使后来的人也全部繳付他們的什一稅。

37．应耕种朕的田地和新墾地并应及时保护朕的草地。

38．应經常具备足够数量的肥鵝和肥鷄，以供朕的需要，〔就是〕在須供应朕、或者〔只是〕把它們送給朕的时候。

39．茲希望：每年应征收職員和田宅保有人应繳納的母鷄和鷄蛋；如果不用作〔朕的膳食〕，应把它們出售。

40．各管理人絕对必須在朕庄园内保养名貴的特殊鳥种：孔雀、雉、野鴨、鳩、鷓鴣和雉鳩。

41．应好好保护朕的〔領主的〕庭院和圍繞它們的牆垣；应精細布置畜棚、厨房、面包房和榨酒所，使朕的職員能来到那里，很整潔地做事。

42．在各庄園的房間內应具备床上蓋單、絨毛褥子、枕头、敷布、桌布、長櫈毯，銅的、錫的、鉄的和木制的杯碗、鉄架、鏈子、鎖鑰、鉤子、斧头，就是战斧，錯子，就是螺旋鑽，刀子及各种器具，使无須向別处請求或移借。而且〔管理人〕应負責那些在战爭时取去使用的武器，使它們完善无疵，并用后重新放入庫房內。

43．依照規定，应按时发給朕的妇女房內所用劳动材料，就是：亚麻、羊毛、大青染料、鲜紅和紅色顏料，理羊毛的梳子、起絨草、肥皂、油、器皿及其他那里所需的小东西。

44．每年应送給兩份齋戒食品，以供朕的膳食，就是：蔬菜、魚、干酪、植物油、蜂蜜、芥末、醋、黍米、稷、干的和新鲜的青菜，蘿蔔和蕪菁、蜜腊，加上肥皂及其他小东西；而所有剩余下来的，像已說过，应該用書面向朕稟告，无論如何不得像过去的情况那样，規避此事。因为根据这兩份，朕要知道那剩留下来的第三份。

45．各管理人应有受其支配的优良匠工，就是：鉄匠、金銀匠、皮鞋匠、鏇工、木匠、兵器匠、漁夫、捕鳥者、肥皂工、啤酒工，就是熟悉制备啤酒、苹果的、梨子的及其他各种飲料的工人，能为朕的需要制造小麦粉面包的面包工人，善于編結打猎網和捕魚捕鳥網的工人，以及不胜枚举的其他職工。

46．应好好保护朕的禁园，在老百姓中称为"御园"，并应經常及时修葺，不得讓它們达到需要重造的地步。对任何建筑物，都应同样处理。

47．朕宮廷中經常任職的狩猎头，鷹工及其他職員，当朕派遣他們去做朕的某某事的时候，或者侍膳

① 紀基督入耶路撒冷的節日，卽复活節前之星期日。——譯者。

② Осанна是希伯来人頌讚上帝之声或祈福之語。——譯者。

③ 这項，就是指使用森林地作为牧畜地事。

官或献杯官以朕的名义命令他們办理某某事的时候，按照朕或皇后的書面命令，应在朕的庄园里获得〔必要〕协助。

48．应好好建造朕庄园里的榨酒所；管理人应注意：任何人不得用脚来踏榨朕的葡萄，而且一切必須保持整潔。

49．妇女房間应有良好秩序，就是，关于透光的房間，冬房和半地下室方面；并在周圍应有圍牆以及牢固的大門，使朕的事务办得妥善。

50．各管理人应察看在一間馬舍內有多少头种馬，有多少馬夫来照管它們。如果馬夫是自由人，并为其职位而享有采邑的，应以采邑的收入来維持生活，如果是农奴而有田宅的，应以田宅的收入来維持生活。可是，如果兩种收入都沒有，应从領主的进款中領取他們的維持費。

51．各管理人应留心使坏人无論如何不得把朕的种子藏匿于地下或任何地方，来减少朕的出土幼芽。同样应留心他們的别种悪毒行为，使他們永远不能干出坏事。

52．茲希望：〔管理人〕应在朕的田庄和庄园里設立完备公平法院，使住在那里的各种人：农奴、奴隶或自由人，可获得应有的权利。

53．各管理人应留心：在其区內朕的臣民无論如何不得干出窃盗或欺騙行为。

54．各管理人应留心：朕的臣民須好好工作，不得在市場上閒逛。

55．茲希望：管理人应把一切为朕的需要而撥給、用去和提出的东西，記入一本賬冊內，把一切自己用去的东西，記入另一本賬冊內，并把剩余的东西，記入另一本特种賬冊內，向朕呈报。

56．各管理人在其地区內，应时常开庭审判，并宣布判决，监視朕的臣民遵守法律。

57．如果朕的奴隶中有人为了朕方面的某种事情，要指控其头子，讓他来到朕处，〔管理人〕不得攔阻。如果管理人获悉他的助手准备向宮庭控訴他，那么，他应派〔无論何人〕到宮廷来說明情由，使他們的控訴不致使朕〔白白地〕听得厭煩。朕願因此得知他們的前来是有必要的或者是徒然的。

58．当管理人受托飼养朕的小狗，管理人应自付費飼养它們，或者把它們移交于自己的部屬，就是：庄园長、工头或管倉庫人，要他們負担費用好好飼养他們，除非朕或皇后另有命令规定；朕庄园里所有飼养小狗的費用概归朕开支；那时，管理人可派〔專〕人負責，好好飼养它們，并应特别撥給飼料于他，使他无須天天来到倉庫領取。

59．各管理人在服务时期应每天提供3磅蜜腊，8"撒克"肥皂；此外，到聖·安德魯节日，如果朕和朕的臣属不在那里，須提供8磅蜜腊；在四旬齋的中期也同样办理。

60．庄园長无論如何不应从强有力的人中，而应从小康而可靠的人中选拔。

61．各管理人在服务时期应把麦芽亲自运到宮廷，并随帶釀酒师同来，使他們就在那里釀造良好啤酒。

62．朕的管理人每年到聖誕节时应把朕所有的收入，分門别类，并按照次序，明明白白向朕稟告，使朕得按照各个项目知道究有多少，就是：有多少耕地，由朕的牧人的牛来〔耕种〕，有多少附有田宅的〔耕地〕須由佃农开种①；〔收进了：〕多少小猪，多少租款②，多少債款和法院罰款，多少由于沒有朕的允許擅在朕的〔禁〕林中捕捉的野鳥，多少由于各种犯罪的罰款③，多少从磨坊，多少从森林，多少从田地，多少从桥头和船舶，多少从供应我們的田庄的需要的自由人和地区，多少从市場，多少从葡萄园和从繳納酒的人，多少干草，多少木柴和火把，多少薄板及其他〔树林〕材料，多少从荒地，多少蔬菜，多少黍米和稷，多少羊毛、亚麻和大麻，多少从树木采下的果实，多少榛果和榛树，多少从各种接木，多少从花园，多少从蘿蔔墟，多少从魚池，多少皮革，多少毛皮和兽角，多少蜂蜜和蜜腊，多少脂油，植物油和肥皂，多少野果酒，熟酒，蜜制飲料和醋，多少啤酒，多少葡萄酒——新的和陈的，新谷和陈谷，多少鷄、鷄蛋和鵝，多少从漁夫、鉄匠、武器匠和鞋匠，从揑粉槽加工人和制箱者，多少从旋盤工和鞍师，多少从鉗工，从鉄鉛矿場，多少从納税人，多少牡馬和小牝馬。

63．对于上面所述的一切，如果朕需要这样做，朕的管理人无論如何不应認为太繁，因为希望他們自己也同样可向其下屬要求这一切，不会引起他們方面的任何不滿，而且凡是人家在自己住宅內和自己庄园內所应具有的一切东西，朕的管理人在其自己的庄园內也应具有。

64．应好好制造运貨車，即朕用以参加作战的馬

---

① 在那个时期，庄园的土地一般分为兩部分；一部分由領主直接經营；另一部分租給佃农耕种；后者为使用土地須繳付若干租税并在領主的土地上担任规定的劳役。这里，查理大帝指令其管理人报告这兩类耕地的数量。——譯者。

② 可能指为使用森林来养猪所繳納的租款。——譯者。

③ 使侵犯者免去罪行或修理所作損害的罰款。——譯者。

車，并应在它們的頂上好好盖着縫好的皮革，这样在必要时車輛連同载貨可涉水渡河而不致內部透水。像朕說过，朕的貨物能够完全无恙地渡过。兹希望：在用馬車輸送朕膳食用的面粉的时候，每車应載12“摩第”，在載酒的运貨車上，也照朕的度量衡，载运12“摩第”，又在每部貨車上应附载矛盾和弓矢。

65．在出售朕的池塘內魚类的时候，就应放入别种魚类作为代替，这样可經常有〔备好的〕魚；只有在朕所不到的〔朕的〕庄园里，才可〔全部〕出售，而朕的管理人应把售款轉归于朕。

66．应向朕呈报关于母山羊和公山羊，它們的角和皮，并每年应把其中用鹽漬的肥山羊肉献給朕。

67．应向朕稟告关于荒蕪的田宅及关于〔新〕获得的奴隶；如果他們还有沒有〔份地〕，哪里可以安放他們。

68．兹希望：各管理人应經常备好鉄箍紮着的牢固桶子，可以送到战場去或送到宮廷去，而无須另做皮囊。

69．应隨时向朕呈报各人捕到了多少只狼，并把狼皮献給朕。在五月中可以使用〔毒〕药、捕兽器、陷阱和猎犬来搜寻并捕捉小狼。

70．兹希望：在园圃里应有各种青草〔和蔬菜〕，就是〔下面列举73种植物的名称〕。

关于树木，希望：有苹果树、梨树和各种李树，花楸树、山茱萸、栗树、桃子和木瓜树、榛树、扁桃树、桑树、月桂树、笠松、无花果树、希腊榛树、各种樱桃树。苹果的名称：〔下面列举苹果的名称及种别〕。

本詔令完。

（譯自格拉青斯基：中世紀史文献，卷1，莫斯科，1953年，頁156—165。）

湘軍——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反动地主武裝

景 珩

一

清代团練之法，始于嘉庆朝川楚之役（即白蓮敎正理敎起义）。自从太平軍金田起义，各省大吏又紛紛倡議团練，“以团輔官”，“以練助兵”。咸丰二年清文宗又諭令各省仿照嘉庆年間办理团練。但是嘉庆年間所謂練勇，多半由国庫支給餉糈，咸丰年間国帑枯竭是办不到的，若由地方紳士量力籌办，不假手于吏役，是紳办官督。經費旣然不由官出，則官督的力量就非常薄弱，因此产生了下列的三种情况：

一、土豪劣董，借名科斂，一旦有警，“賢者尙知效节，不肖者相率潰逃”（見清朝續文献通考卷二一九，兵考十四，咸丰六年条）。

二、士紳將团練委之于“民”，如河南的联庄会，山东的团練，往往与“賊”通声气，养成了“尾大不掉”之势（同前書）。

三、“弱者抗粮，自豪者揭竿而起。”（參見胡文忠公遺集卷五三，致天柱令載湖北崇陽湖南耒陽鬧粮案；卷五七，論办鄧安郷匪啓及駱文忠公奏議；卷一，湘中稿澧州石門奸民借团滋事剿撫完竣摺。）

胡林翼曾国藩当金田起义时，已經看出清朝的兵与餉兩大支柱已經支持不了，“用兵用役”，不能“敉平大乱”，必須“用士用民”，但是各个地区办团的情形利弊互見，又是弊多于利，于是曾国藩創造了一个新的办法，把团練分成兩橛，而又是一事，曾国藩的意見是：

“团練二字，当分为兩層，团即保甲之法，淸査戶口，不許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練則养丁請师，制旂造械，为費較多，乡人往往疑畏不行，今練或擇人而行，团則宜遍地兴办。”（見曾文正公書札卷二，頁41上，吳甄甫制軍。）

“有团而兼練者，有团而不練者。团而不練者，不斂銀錢，不发口粮……即古来保甲之法；团而兼練者，必立营哨，必发口粮，可防本省，可剿外省，即今日官勇之法。”（見前引書頁190复刘蔭厓。）

“至于宗法盛行，可办族团，国藩在湖南时曾刻有族团章程，实远盛于乡团。”（見前引書頁178复陈作梅。）

根据曾国藩这个团練办法，第一步使用了中国历代相傳的閭伍、三長，以及乡社的固有制度和封建傳統，

使农民狹隘的理智，变成迷信的馴服工具，服从于傳統習慣，再一次把他們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面，以巩固封建的統治基础。第二步穿上"內聖外王"的道袍，指义軍为"名教奇变"，以迷惑种族的仇恨，貧富的界綫。用士来帶动上層农民，影响下層，把一部分組織好了的武裝朴素的农民，拴在自己的战車上，向太平軍进攻。这样，旣免除了練勇在地方上的"尾大不掉"之势，又可以逐步扩大自已独立机动的軍权。而太平軍所受的致命打击便在于这个遍地兴办的"团而不練"。馬克思說："这些淳朴的村社不管外表上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終一直是东方專制制度底堅固基础。"（馬克思論印度，頁13。）

另一方面，从湘軍的筹餉角度上观察，旣然要束縛农民，穩定农民和利用农民，便暫时不在农民身上計算，并不像其他省份如浙江巡撫王有齡式团練筹餉办法，按地亩加捐（見清朝續文献通考卷二一九，兵考十四）。他們是从厘金、盐务、劝捐三个方面下手。胡林翼的主張是：

"欲保楚莫如諜吳，欲养兵則不可不任劳怨以济餉，故寬其意于錢漕，所以培本計而致厚于农民；严其法于厘金，所以开財源而致力于兵事，非独苛于商賈也。商逐末取利厚，縟算亦便；农勤力取利微，損一分受一分之益，所以培根本也。若如俗吏之志，則必加賦、加亩費为得計。"（見胡文忠公遺集卷六〇致陈秋門給諫。）

曾国藩早在湖南練勇的时候，劝捐也不在乡村而着眼于城市"商賈輻輳之区，鉅室殷戶"（見曾文正公書札卷上，頁47，与湘潭公正紳士書）。曾国藩使用了当时他們党类中的"在官素洽民心，居家素孚乡望"的人物負責劝捐（在曾胡書牘中習見的"吾党"字样，包括了当时以封建的年、官、乡、戚相結合的士大夫阶層），又采用了以朝廷職銜封典执照和监生执照为交換条件的"劝捐良策"（見曾文正公奏稿卷二，頁36，請派大員办捐济餉摺）。

在盐务方面，在曾国藩家書中有这样一条消息："盐务之可以筹餉者約有二端：一則奏請浙盐三万引，現在陆續运行，大約除成本外，可淨获利十万兩……浙江盐务先須成本十余万，現請郭筠仙（嵩燾）往浙一行，張罗本錢。"（見曾文正公家書，卷二，頁21，致澄溫沅洪弟）

从湘軍筹餉过程中，我們找出三种情况：（一）湘軍的筹餉开端即着眼于商業資本，这意味着中国的近代社会經济重心已漸有由土地經济讓位于貨幣經济的过渡傾向。自从1858年第二次鴉片战爭"上海換約"以后，上海已成当时財貨总匯之区，成为他們的筹餉目标。1862年上海紳士潘馥、錢鼎銘等用銀十八万兩雇用洋船，迎接曾国藩的軍队赴滬，感于上海士紳的資力雄厚，曾国藩不禁一唱三嘆。（二）在1852至1856年間湘軍盤据的兩湖江西地区，虽然他們看到抽厘可济軍餉，当时商業稅的收益，虽然日有加增，也必須把清代傳統的次于田賦第二位的盐务科目，作为聚斂的对象，加在一起。为筹餉"可大可久"之計，曾国藩必須派人到浙江張罗本錢（指找盐商承攬），販盐获利。这与1862年曾国藩軍队伸入上海以后，依靠了买办阶級，依靠了关稅济餉，情况截然不同。（三）湘軍的餉糈，实質上是完全脫离了清朝国庫支持，依傍了当时社会特定的經济內容的地方紳士，但是仅从經济意义上講，劝捐的执照，須由国家机構印发，販盐必有盐引，而抽厘又要設局，因此有必要使用这个固有的政权形式，在政治关系上尤有必要，以收事半功倍之效。"紳以通其情，官以助其势"，这是曾国藩統帶湘軍的反动的理論根据。

三

我們考察湘軍的組織成員，还有一个特点是：除开他們以"士"統帶的农民組成的主力以外，他們也逐步吸收了大量以哥老会为組織中心的流浪无产者为他們效力。尤其是在軍事后期，在史料中有确鑿証据可以稽考的，曾国藩倚为股肱爪牙的曾国荃軍与鮑超部队，都有哥老会的組織。王闓运在"湘軍志"里便露骨地說："哥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相結为兄弟，約緩急必相助。軍兴，而鮑超營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軍亦多有。"（見湘軍志湖南防守篇一，頁25，曾国荃軍参見曾文正公家書卷五，頁113）。

胡林翼在早期，已經認識了当时秘密帮会的强大力量和在飢餓綫上的流浪无产者挺而走險的危机。他說："刻下湖南四川之会匪，确有所据"，"国帑之支絀，人心之浮伪怯懦，实非旦夕所能挽回，設使办理不善，禍端一发，不可收拾……明知为盗匪中之会匪，亦止究其为盗为匪，而不必問其为会，則可安反側之心，而消无穷之禍"（見胡文忠公遺集卷五四，論会匪啓黔撫）。"下游情形，殆哉岌岌，姑即愚陋之所及知者而言之，已不下十数事。䴥陽船戶，辰沅水手，皆强悍有力，鎭远以上，驛路脚夫亦游蕩不羈，兩三月来，客商裹足不前，无所得食，人心皇皇，殆不可支……为盗而死，忍飢而死，等死耳，犯法可以贻死，忍飢可以立斃。"（見胡文忠公遺集卷五八，条陈东路情形）他認淸这种社会力量与这种危机，但是他認为这些"紛紛扰扰之徒，从无定志"，因此，进一步

便主張“穷其党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要“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实行混水摸魚（参見前引書及同書卷五四，启吕方伯）。

清代秘密帮会的組織，所謂“洪門”的傳統口号是“反清复明”，着重在种族仇恨上面。在近代发展中，由于內地战爭、自然灾害和殘酷的剝削而失去土地的农民，散兵游勇，沿海地区不正常的貿易和走私者，仰給于日給工資的流动劳动者，紛紛加入，在数量上大大激增。他們要求生存，要求团結互助，而帮会組織正是这一股人海巨流的救生宝筏。但是，他們一方面时时刻刻在飢餓綫上掙扎，一方面也沾染了当时特定的腐化生活方式，在哥老会的“海底”里，可以找到，以茶、酒为拜碼头結交手段，甚至“洋烟开火”也被哥老会列为結交的仪节（見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頁104，第四章，秘密書条，有如“兄弟相逢在此中，双手接过一条龙”語）。在近代史中，尽管天地会、三合会、小刀会、哥老会等等名目不同，査一査这些秘密社会組織的內容，歲月变迁，已經由洪門正統，逐漸轉变，只剩下了对任何阶層都可以加上的“义气千秋”。

章炳麟曾經分析过湘軍利用会党来与太平軍作战：“統領率以会党渠率起家，既得凭借取悅上心，則不憚殘賊同类，以求頂翎。盐梟亦然。故以会党制会党，盐梟制盐梟者，逆胡之長策也。”（見章氏叢書別录，頁40，革命道德說）

中国的会党組織帮助了太平軍在反清斗爭中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也帮助了地主武裝顚复了革命政权。它在抗英运动中是起过打击敌人与牽掣敌人的作用，但是在广东也屠杀过自己的領袖，消灭了自己的队伍（見中国秘密社会史，第三章，頁28），它虽間或被无产阶級革命卷入到运动中来，但它的全部生活狀況都更使它甘願受人收买去干反动勾当，当我們考察中国近代历史的帮会組織，这种情况也毫不例外（加着重点处見“共产党宣言”）。

1860年（咸丰十年）太平軍忠王李秀成打垮了清統將張国樑重建的江南大营，虽然攻杭州下苏州，占有了江浙兩省广大地区，但是湘軍的曾国荃軍在次年八月攻陷了安庆，使太平軍事后期兩大支柱之一英王陈玉成失去了兩淮的依傍。接着湘軍又一枝力量李鴻章軍已伸入了江苏心臟地帶的上海。目前有些史学家对1860至1864年这一时期的研究，仅着眼于洪秀全后期的迷信上升，信讒用佞，李秀成的內外受夾，从一些太平天国內部人事上的得失，以及軍事上的得失，来衡量太平天国的革命命运。这些問題并不是不应該研究，但我認为最基本的关鍵問題，应該結合上第二次鴉片战爭所構成的經济原因加以考察，比較确切一些。

忠王李秀成認識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猙獰面貌“要防鬼反为先”（参見忠王自述），也知道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学会了使用洋鎗和落地开花炮；但是政治上沒有新的开展，經济上沒有新的出路，單凭农民阶級意識的“正义”，是不能消灭封建勢力和帝国主义經济勾結的危害性的，自从第二次鴉片战爭，清廷歲收各貨之稅，加增至一千万兩，仅洋葯（鴉片）一項，每年进口約六万箱，咸丰九年（1859）按新定稅則征收，每百觔一箱抽进口洋稅銀三十兩，歲增稅額一百八十万兩，售与內地商人，逢关納稅，过卡抽厘，每箱征华稅銀三十兩厘金二十兩，上海長江一帶进口約三万箱，广州約进口一万二千箱，除开洋稅以外，华稅厘金在上海長江一帶即可歲收一百五十万兩（見夏燮“中西紀事”卷十八，洋葯上稅）。当时湘軍不仅在上海長江一帶掌握了这一批“洋葯”华稅厘金，李鴻章在上海防剿各餉，專恃滬城洋稅以資接济，关金約定助餉二成（参見中西紀事卷二十，外夷助勦）。在这一时期湘軍籌餉的幕客郭嵩燾、黄贊湯、毛鴻賓、晏端書先后撫粵督粵，又把住了中国头等港口的大門，盤踞了华南財賦的重地，給湘軍餉糈上以有力的支援（郭嵩燾黄贊湯咸丰四年曾国藩奏請專为湘軍办捐济餉，晏端書同治元年以欽差大臣馳赴广东韶关督办通省厘金專济安徽大营軍餉，毛鴻賓由湘撫督粵系湖南东征局之有力支持者。）

同时，帝国主义者不但遣將助剿，还从“洋葯”稅上，想尽方法替地主武裝增加实力，借箸代謀：

> “据赫德稟称征收洋葯正子稅外，一經进口，无論販至何处銷售，再由該地方官給予印票，仿照牙行納帖之例，每帖輸銀若干，如办理得宜，除华洋各稅外，歲可增銀数十万，可作为購买炮船之用。”
>
> “請即于上海广东各关稅內先行籌款購买，并給赫德札文，令其購买运到时，交广东江苏各督撫。”（均見中西紀事卷二十，外夷助勦。）

赫德既然代謀，又可代購，又可由自己掌握的关金先行墊付，湘軍就在这样的帶有鴉片气息的經济优势之下，复灭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政权。等到1867年湘軍左宗棠出关“剿”捻，便可按照成案向上海洋商一次借銀一百二十万兩（見清朝續文献通考卷六九，国用七）。这比起湘軍曾国藩全軍自咸丰三年至六年三年之間共收銀二百八十九万余兩（包括各省济餉及历年捐輸等款）又迥乎不侔了。（見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一，頁53，报銷历年軍需摺。）



教 学 問 題



關于精簡1957年秋季初三、高一和高二历史教材的几点說明

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編輯室

一　为什么要进行一次精簡

从1956年秋季起，中等学校从初一到高二各級的历史課，都开始使用新編教材。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普遍認为新編的历史教材，无論是科学性、系統性或是思想性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同时，教师們也認为从初三到高二的历史教材，还有程度深、分量重等缺点。

根据教学实践中的意見，并且通过几次实际的調查研究，我們对于重和深的情况有了認識。具体地說，所謂程度深，有的表現在理論性問題的闡述不够深入淺出；有的表現在引用古典文过多；有的表現在对某些問題說明的不够透徹，交代的不够清楚。所謂分量重，体現在每一学期講授新課的时数較多——初三"世界历史"上冊四十八課时，高一世界近代現代史上冊四十八課时，高二"中国历史"第一冊四十七課时。講課的时数多了，复習的时間就显得少了。另一方面体現在某些章节的內容头緒多，教师得經常赶进度；另外，由于某些地方程度深，教师講解需要多花时間，看起来篇幅不大，实际上也显得分量重了。

程度深和分量重都会給教学帶来一定的困难，自然也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教学質量。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对上述几种历史教材作一次精簡就显得十分必要了。为了进行精簡，教育部从各地召集了十几位富有教学經驗的历史教师，对高一"世界近代現代史"上冊和高二"中国历史"第一冊的精簡問題，进行了具体的討論，拟出了精簡提綱的草稿。接着，我們又根据各地教师的意見，精簡了初三"世界历史"上冊。精簡提綱草稿曾分别向几个地区的历史教师征求过意見，經过修訂以后，已經由教育部頒发了。

二　精簡的原則

从表面上看，精簡教材是为了減輕教学的負担，但是精簡还有个积極的意义，那就是要保証教学質量。換句話說，經过精簡以后的教材，分量輕了，从而給教师創造了把問題教得更深刻、更透徹的条件，也就是給学生創造了更清楚地理解問題的条件。經过精簡，原有的某些历史教材删掉了，从形式上看，学生少得了某些历史知識，这是事实。但是由于有可能把問題理解得更清楚，因此"失之东隅"的可以"收之桑榆"。同时，我們在精簡某些教材的时候，又总是力圖保証基本知識不受損害。这是一点总的原則。

其次，在精簡过程中，我們着重精簡头緒而不是压縮文字。換句話說，我們从各个課本里删除了某些历史事件，而不是删除了各个历史事件的具体情况，留下一些空架子。精簡头緒的具体作法，有的是删去某章某节，例如初三"世界历史"上冊的"亞述"、"古代波斯"各节，高一"世界近代現代史"上冊的"十七至十八世紀的俄国和法国"和"1848年的奧地利帝国的革命"等等；有的是精簡章节里面的一些小标題，或是精簡了一些內容而使前后兩个小标題合并为一个，例如在高二"中国历史"第一冊里删除了第四章第一节里的"新的稅亩制度和軍事制度"，第六章第二节里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制度"等标題及其內容；又如在第七章里，删除了許多內容，把兩节簡化为一节，又大力精簡了小标題下的內容，把几个小标題合并起来——如把第二节的"文学"、"历史"和"科学技术"合并为"文学和科学"。在各个課本里，更多的情况是精簡了許多小标題里的一小段

一小段的內容，这方面的例子就举不胜举了。我們所以着重精簡头緒而不是压縮文字，一方面是因为只有精簡头緒才能够眞正地减輕分量；一方面是因为压縮文字而不精簡头緒，結果必然留下許多缺乏生动內容的空架子，即留下許多抽象化概念化的东西。这跟减輕負担、提高質量是“南轅北轍”的。

再次，旣然以精簡大大小小的头緒为主，那是不是会損害历史教材的系統性呢？这个問題是精簡工作里大家一貫留意的問題。为了避免发生这种偏向，我們时时都在注意历史事件的前后关联。因此，在精簡时，我們偏重精簡那些在整个历史发展綫索中跟前后关联不大的历史事件，或者是虽有关联但是前后教材都不曾提到的。举例說，在“世界近代現代史”上冊里，“意大利的統一”被精簡了。删除了这一节，不致于使教科書前面提到的历史事件沒有下落，也不致影响教科書后面提到的历史事件。如果删除“德意志的統一”一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因为把这一节删掉了，講到“普法战爭”及其以后的有关問題就会发生困难。我們又偏重精簡那些比較次要的史实。所謂“次要”只是就其相对意义而言的，也就是在减輕教学負担的条件下跟其他史实比較而言的。具体地說，我們說的次要的史实，指的是那些不致因精簡而影响政治思想教育的史实，是那些不致因精簡而損害历史教材系統性的史实，是那些为学生可学可不学的史实。例如在“世界历史”上冊“古代埃及”一章里，删除了古代埃及人引水灌溉的方法，在“世界近代現代史”上冊里，精簡了某些历史人物的小傳，在“中国历史”第一冊里，删除了“西周的强盛”等等，想来不致于发生上述的这种或那种缺点。此外，我們还偏重精簡了跟其他学科某些內容相重复的材料。例如在“中国历史”第一冊“战国的文化”一章里，我們删除了对屈原的“离騷”和“九歌”的介紹；在“兩汉的文化”一章里，我們删除了对兩汉文学的介紹。这些材料大都是学生在高一文学課里已經学了的。

最后，精簡时力求减輕分量，尽量作到每課时的教学都比較从容，不赶进度。如果在內容上无法精簡，就酌量增加教学时間，如“世界历史”上冊的第四編第三章第二、三兩节的教学时間，从原定的兩課时增加到三課时。換句話說，原来嫌重的章节，除了極其个别的以外，都要有一定程度的减輕。这是原則，也是目的。除此以外，这里还拟說明以下几点：第一，这次精簡是在不更动原有章节次序的原則下进行的，只在極个别的地方作了小的調整。例如在“世界近代現代史”上冊第十六章里，我們把“十九世紀晚期的工人运动”跟“德国的对外侵略政策”对調了，以便把十九世紀晚期和二十世紀初德国工人运动合在一起来講。不更动章节次序并不是避免牽动太大，而是因为一般反应認为教材的整个結構还是比較妥善的。第二，这次精簡是在今年秋季的历史教科書已經印就的情況下进行的。对教材分量重这一缺点作了可能的改进。关于程度深这一缺点，只是尽可能地取消了一些难点，例如删除了一些古典文。至于对某些理論性問題闡述得不够深入淺出，对某些問題說得不透徹、不清楚，只好在下次修訂課本的时候来解决。第三，精簡时，我們不仅注意做到使精簡以后的教材前后不脫节，而且还要它們在文字語句上前后連貫。这当然不能是天衣无縫的，不过总是尽力之所及，使精簡后的教材从形式到內容都能前后呼应，上下貫通。

三　教材的精簡与教学

从篇幅上看，初三到高二的历史教材，有的精簡了五分之一，有的精簡了六分之一。从講授新課的时数上看，“世界历史”上冊和“世界近代現代史”上冊都从原来的四十八課时减到四十四課时，“中国历史”第一冊从原来的四十七課时减到四十三課时。一个学期講授新課的时数减少了，各課时講授的內容一般都有所减輕。这就保証了每課时的复習提問和巩固提問的时間，也保証有較为充裕的阶段复習时間。

上述情況給我們提供了較为充裕的教学时間。那么怎么利用这些时間呢？照我們的想法，一是利用这些时間，把每一課时的中心內容教透徹、教具体；二是利用这些时間，把阶段复習工作作好，使学生的历史知識尽可能地得到巩固。換句話說，精簡是为了减輕教学負担，是为了保証教学質量，是为了讓学生学得更好，如果教师因为时間較为充裕而补充教材，那就有失精簡的本意了。教材經过精簡以后，一般的講授时間旣然比較充裕，那就要求教师估計这种情况，从复習、講課、巩固各方面作妥善的、有計划的安排，特别要多考虑怎样把問題講得更透徹、更具体。这就是說，教材的精簡向教师提出了新的和較高的要求。

其次，这次精簡还是一个临时的措施，这具体表現在这次精簡只精簡了教材，未从修訂教学大綱着手。这样，这里又發生了一个問題，那就是怎样对待有关各課的教学大綱（草案）。在这个問題上，我們以为从初三到高二各个年級历史教学的总要求和中心綫索，仍然以教学大綱为依据。事实上，这次精簡工作是在不影响教学大綱的总要求和中心綫索的意圖下进行的。至于教学大綱里所列的必修知識，精簡时有

討論

我对中学历史教学質量和教科書的看法和意見

江苏盐城中学　戴企平

（一）关于目前中学历史教学質量問題。

目前中学历史教学的質量就我們的要求来說还不算高，但比过去任何时期决不是"低落"，而是有了很大的提高。至于目前影响教学繼續提高的原因很多，如现行升学考試制度、重理輕文的心理等，对教学都起了不好的影响，更直接影响教学質量提高的原因是教科書与教师的水平不高。教科書編写得好，教师水平虽差些，他至少可做到照本宣科。教科書不好而教师有一定水平，也可以补救教科書的不足。教科書与教师水平都不好，教学質量就成問題了。

解放以来，我們的历史教科書已經过多次变动。过去的課本，有的需要像語文教师一样讀講課文，有的需要时时提防史实和观点的錯誤，有的不仅同学看不懂，甚至可以看出編者自己也并不很理解。因此我觉得現行的課本比过去的課本已改进得很多。国家正日新月异地发展，課本变动是很自然的事情，沒有变动才是怪事情，才是教学質量停滞或"低落"的现象。

这些年来，在我們教师身上所发生的变动也是很大的。就我个人来說，我本来是学历史的，但在解放前的十几年教学工作中常被逼教其他課程。解放后从1950年起，我才逐漸成为專業历史教师，几年来在我身上可以找到一年一年的变动痕迹。首先我已不是站在空中那样"客观"的人，而是有了立場，有了信心。其次在教学实践中，我的業务水平也有所提高。（1）我开始教历史时，同学習慣于讀講教材，划注意綫，然后提出作業，死記硬背的教学方法。我把教材按着背景、原因、經过、影响、意义的公式列成提綱，看来这样方法是比較进步了，但实际上不分現象与本質，不分主次，甲乙丙丁地开中药鋪。这些教法，在今天誰也不会再用了。（2）我教高中世界近代史苏联現代史时，边学边教，看了不少文件，逐漸領会教师必須了解教科書的要求，必須摸清每章节在全書中的地位，必須明确每一历史事件說明什么問題。例如講近代史第二部分各国工人运动时，应先細致研究俄国工人运动和布尔什維克党是怎样的党，然后在講各国工人运动时，才心中有数。第二国际的历史，实际上是这一时期各国工人运动的总結，說明布尔什維克党与各国工人政党的不同。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不同，說明革命在俄国胜利而在其他国家失败就不是偶然的事情。編者用对比方法写教材，而我們孤立地講自然难免于支离破碎。我逐渐学会如何处理資料比較繁杂的教材，如中国近代史現代史課本。（3）我在学習教育学和苏联經驗以后，教学方法也有了改进，例如在直观教学方面，过去虽制作些圖表，搜集旧書刊中的圖片进行教学，但使用起来效果不大。在我明确直观教学作用以后，我和組内同志准备在三年之内，做到"要圖有圖"，"把教材用圖表画出来"，現在我組自制和复制的圖表已有二百件，在备課时也有时把教材与圖表結合起来，写成教学笔記。最后，我积極参加了集体备課，相互听課等活动，不再留一手了，能不碍面子的互相帮助，互相学習，使我逐步改进了教学工作。我覺得，我这些年来的思想面貌，已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的業务水平，也逐步提高了。我想我个人的經历，也是全国絕大多数同志共有的經历，这說明我們教师水平虽不高，但在

所删减，因此教育部頒发的精簡办法里，又分别指明了教学大綱里的某些条目是要相应删除的。这里附帶还說明兩点：第一，原来的各种教学参考書照旧使用，教科書精簡的教材，参考書的相应部分也要删除。第二，要向学生說明这次精簡教材的目的和它的积極意义；同时按教育部頒发的精簡办法，要学生在教科書上逐条把精簡的教材删掉，可以在开学之初指导学生一次删掉，也可以分几次删掉，但不要講一課删一課。

最后，經过这次精簡，初三到高二各級的阶段复習时数都比原定时数增加四課时。鑒于目前学生历史知識巩固的情况較差，希望充分利用这些时間，加强阶段复習工作，至于在什么时間进行阶段复習，每次利用一課时或兩課时。由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情况灵活掌握。怎样才能够使阶段复習收到更大的功效，那更要靠教师的創造性的劳动了。

不断地提高着。

（二）关于历史課的設置問題。

上学期我听了高二初一明末农民起义这节課，覺得除教法与要求略有不同外，教学內容几乎无甚区别，也看出这兩班同学，对这节課似乎都沒有得到滿足。原因很簡單，高中与初中，初中与小学中国史教材的基本內容是相差有限的，把同样的事情，重复地講，怎能引起他們学習的积極性？我建議停开高二中国古代史而酌量充实初一古代史內容和教学时間，以减少中国古代史过多重复，减輕高中历史教学过重負担。初二下教材分量較重，可考慮將第一編前三四章調在初二上教。

（三）关于教材問題。

中学历史教科書虽然有所改进，但还存在不少缺点，应多方发动群众力量，做好教科書修訂工作。我仅就高初中世界史的分量問題，提出个人意見。

我們的教材是以苏联的教材为藍本的，但对具体条件照顧得不够，例如苏联世界近代史教学时間共一百二十課时，我們刪节去一部分又补充了一部分，在分量上是相差不多的，而我們仅限于六十八課时內教完，不是按課时安排教材，而是把教材在規定的时間內去匀支，三課时的教材要在兩課时內教完，八課时的教材要在五課时內教完，为了赶进度，必然要影响教学質量，高初中世界史分量太重，我覺得可以按以下办法精簡：

（1）堅持略古詳今的原則。現行課本是十八世紀法国資产阶級革命詳于巴黎公社革命，巴黎公社革命又詳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一国际詳于第二国际，第二国际又詳于第三国际。維也納会議一課时，巴黎和会，国际联盟与华盛頓会議共一課时，这样的安排很不合理，要放手略古，要酌量詳今。

（2）涉及面不宜过广，重点要突出。初中世界上古史可以簡單介紹埃及巴比倫波斯印度的历史，着重談他們的特点，如埃及金字塔，巴比倫汉謨拉比法典，波斯国家制度，印度社会制度和宗教，而比較系統地介紹希腊特别是罗馬的历史，这样就可以說明奴隶制社会曾經普遍存在过和奴隶制社会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原委。平均使用力量，或想在中学历史教科書中保持每个国家或每个人物完整的历史面貌是不可能的。依照这个原則，高中世界近代史中就可以刪节拿破崙战爭的史料，通过兩三次战爭說明法国資产阶級企圖夺取欧洲和世界霸权即可。1848年德意志革命可刪去匈牙利革命部分，把維也納人民起义并入第一节（教材把普魯士革命与德意志革命等同起来是很不妥当的）。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可以刪节，殖民地国家历史不是要补充，而是要刪节。

（3）精簡教材要簡而精。我認为現用的高中世界史教科書关于十八世紀法国資产阶級革命历史中"雅各宾派專政时期"改写得比过去好得多，虽然只談几个問題，但是清清楚楚，不須要教师返工。1848年德意志革命中"革命前夕德意志"写得非常簡短，但要求明确。"第一国际創立的历史条件"比过去短短几行容易講并且节省教学时間。从这里可以看出精簡不是文字多寡問題，而是分清主次，或詳或略，或取或舍的問題。

（四）中学历史課，現在已有了比較好的教科書、教学参考書和比較丰富的参考資料，教学已有一定的基础，集体备課，以及相互听課的制度已普遍建立（有人認为今天就可以不需要集体备課是不合实际情况的）并有更多的进修机会，这些都保証了教学水平是会不断地得到提高的。但有些問題如能及时加以解决是会更有利于教学提高的。就我个人的認識，覺得有以下几項問題急需加以解決：

（1）高初中升学考試应在規定的考試科目以外的各科中，每年抽考一項，以免形成偏廢現象。

（2）初三、高一、高二課本分量較重，应及早規定統一精簡办法。

（3）教学参考書需要及早修訂，帮助教师解决疑难。章节要求和作業要明确；詳細地分析教材，指出重点，并列出比較完整的教学提綱；注釋可能发生困难的問題，介紹必要的参考資料。若时間不允許，可以先修訂初中各年級教学参考書，分篇刊发。

改进历史教学的初步体会

江苏省揚州中学付教导主任 鈕均义

近年来領导重視改进教学，各学校对改进教学均采取有效措施，因此历史科的教学和其他課程一样，有較大的进步。同学們的学習成績也有比較显著的提高。

但同学們的历史知識質量还有許多問題。首先是掌握知識不牢固。上学期我校举行教学質量檢查，抽

考了高一四个班的历史。参加測驗的218 人，正确回答法国資产阶級革命开始年代的只有14人。有的同学把盧棱說成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个别同学甚至把雅各宾党說成反动的。其次是理解不深，概念模糊，不能辯証地去理解历史，各个史实間的相互关系与各个历史阶段間的关系搞不清，因而把历史看成是孤立的、静止的。把丰富多采、津津有味的历史內容，理解成几条筋。所以有些同学說："我們只要記住一次农民革命失敗的原因，就能回答一切农民革命失敗的原因了。"

我們应該怎样改进历史教学，克服同学在历史知識質量上的缺陷呢？我認为必須把产生缺点的原因，全面分析研究，从多方面考虑来解决問題。

同学們历史知識質量不能得到应有的提高，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在教师方面，一在同学方面，另一在教材与課程設置方面。

教师在教学上有什么問題呢？不能千篇一律回答这个問題，因为各个学校的具体情况不同，教师的具体情况也不同。但有一点我認为是比較普遍的，那就是講解不够生动具体，缺乏感染力，有比較严重的教条主义。

同学們在历史学習上有哪些問題呢？在学習目的性上，学習态度上，学習方法上都有些問題。有些同学对"为什么学習"缺乏正确認識。大前提錯了，学習历史的目的性也就成了問題。目前重理輕文的現象还比較严重，高等学校的理、工、医、农等科的入学考試不考历史，有些同学到了高三就放松对历史的学習；有些同学复習历史仅仅为了应付課堂提問；不少同学学習历史的方法不正确，他們不在理解和系統掌握的基础上記住重要理論和史实，而是死記硬背。

教科書有哪些問題呢？經过多次修改，教科書有了改善。但还需要繼續改善。有些教师認为历史教科書的分量重，是不是重呢？我認为应該从普通中学历史教学的总任务来衡量，还要結合实际情况来研究，目前有些同学喊历史教科書分量重，但不一定是历史本身的問題。同学們要学很多課程，学習負担很重，这是事实，所以是个問題。但在同学学習負担很重的情况下，为什么喊文、史、地負担重的比較多，喊数、理、化負担重的比較少，这也是个問題。也有很少数同学說："学好数、理、化，压死都不怕。"这又是个問題。总之，具体問題是多的，我們必須分析研究这些問題，才能得出正确的結論。

教科書分量重不重是一回事，教科書編写的好坏又是一回事。我認为教科書的編写，問題比較多，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至今还是代用課本。高一世界近代現代史头緒多，同学掌握困难。高二中国古代史对各个朝代的編写近于千篇一律，看不出它們之間有什么显著不同的特点。有些地方避重就輕，教师要求詳細些的地方太簡略了，不需要詳細的地方却写得很多。其他如地名，人名，年代过多也是显著的缺点。初中外国史增加了亞洲許多国家的內容，但要求不够明确，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它們起了什么作用也談得很少。

上述几个方面的問題不能孤立地解决。教师在整个学校教育中应起主导作用，因此同学們学得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教师的教学。但同学們对学習历史的目的性不正确，重理輕文的現象沒有得到应有的糾正，学習方法上的死記硬背也会大大妨碍历史知識質量的提高。因此在教师改进教学的同时，就必須加强对同学学習目的性的教育。教科書的好坏也有很大的影响。教科書如果不完善，教师注意充分发揮教科書的作用，会增加教学上的困难，如果离开教科書，又会增加同学复習的困难。目前同学們的学習負担很重，教师的工作量也比較多，无疑的对历史教学質量的提高有些影响，因此也需要逐步加以解决。与历史有密切关系的課程如文学、地理、政治等如何来互相配合，也是值得研究的問題。所以改进历史教学必須进行全面分析，从各方面来考虑，才能有效地提高教学質量。

但全面分析考虑，并不意味着教师在改进历史教学上不起主导作用，恰恰相反，历史教师主动地积極地改进教学对提高教学質量和同学們的学習質量有最直接的意义。

教师改进历史教学首先应該抓紧哪一环呢？我認为应該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和業务水平。提高思想水平和業务水平是密切关联的兩个方面，提高思想業务水平不外三个途徑：（1）学習書本上的知識。（2）从教学实践中努力提高自己。（3）加强社会观察和社会实踐。过去我們对前兩方强調得多些，但从目前国內外形势的迅速发展来看，特别使人感覺到作为一个历史教师必須重視社会观察和社会实踐。否则，我們的教学就会脫离实际。近来我們开展了反右派分子的斗爭，使我們比較深刻地認識到国际阶級斗爭和国內阶級斗爭的复杂性。这对我們提高政治覺悟，明辨是非有很大帮助，对我們的教学工作也有很大帮助。我們講历史上的阶級斗爭，常犯簡單化、一般化的毛病，它是形成同学們教条主义地理解历史的主要原因。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学習和参加反右派分子的斗爭，无疑地会促使我們能比較深刻地分析历史上的阶級斗爭，因而我們的思想水平，業务水平將有所提

高。

業务进修也是很重要的。进修需要自覺，也需要領导。我們学校在領导教师开展業务进修的过程中，强調明确目的性和紧紧围繞当前教学內容进修，反对急躁冒进，也防止裹足不前。內容相同的小組編成学習小組，相互推动相互研究，这样做收到一定的效果，但由于学校任务很重，难于保証进修时間，結果收效不大。因此我認为上級領导还要进一步重視教师的进修。我提兩个建議：

（1）出版更多的和更好的各种教学参考資料和教具（如历史地圖、年表等），以减少教师备課的困难与备課时間，使教师們的进修在时間上得到相当的保証。

（2）加强对历史教师进修的指导，分高初中选擇一批进修書目，供教师們系統进修，并請專家定期作要点介紹和閱讀指导，必要时附上思考題，供教师們研究。这个工作建議历史教学編輯部搞一下，一定会受到广大历史教师的欢迎。

对“改进中学历史教学”的意見

东北师大附中 張文生

（一）对一些意見的意見。

我以極大的兴趣閱讀了七月号笔談“改进中学历史教学”的文章，許多教师的意見都是很有价值，値得重視的。对課程設置順序方面，我很同意張述翰同志的意見，并認为这个程序也适用于高中，就是高一学中国古代史、高二学世界近代现代史、高三学中国近代現代史。我也同意提高教学質量的关鍵是不断提高教师水平的看法。但有些同志的某些意見，我認为尙需要商量，下面仅就个人的体会提出一些意見。

第一，高中实行文理分科問題。过去曾經討論过这个問題，但无明确結論。我想实行分科教学，可以解决好多問題，也会有益于教学質量的提高，但是它和中学教育目的和任务是有很大抵触的，所以我不同意文理分科。

第二，中学教师的升級制度問題。有人主張把中学教师的升級制度扩展到高等学校，我認为是不合适的。在这个問題上，应該把由于工作需要而調某些有才干的教师到大学任教和中学教师达到一定水平就一定要送到大学去工作兩个問題严格区别开。再說中学教育工作是否限制了教师才能的发揮，阻撓了教师的創造性和前进的道路呢？我想給予“肯定”回答的人，至少是由于沒有認清中学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而犯了錯誤。所以，那些在中学工作了几十年沒能到大学“执教”，而引起“望洋兴嘆”、“心灰意冷”的情緒，是不値得同情的。若是由此而影响了积極性，却是需要自己深思的。

第三，对一些問題应該实事求是地去研究。比如，課程設置的問題，拿中国史来說，从小学到高中毕業共学三遍，这样重复是有缺点的，但是一下子解决是不可能的，因它关系着目前我国的学制問題。如把初高中联系来看，也不能忽略各阶段的相对独立性，因为小学和初中毕業生毕竟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能升学的，問題在于面对这种情況怎样办。再如，由于社会影响和考試制度等原因，中学生特別是高中生学習历史的态度是有一定問題的。但扭轉这种不正常情況，首先在于教师。籠統地說学生不願意学历史是不够客观的，应該看到絕大多数学生是喜欢求得更多的知識的，当然也包括历史知識在內。

其他如对教师水平的估計，也应全面来看。固然教师水平和国家的要求之間有矛盾，甚至是矛盾較大，不过也要分别的看，有不少教师有足够能力做好工作，有些教师能力虽然差一些，但是正在提高过程中，或者已經接近一般的水平。只有看到絕大多数教师都在踏踏实实地埋头工作，我們才能有条件談提高教师工作質量，否則是难以想像的。强調某些教师由于沒經过專業訓練或者是經驗不足所产生的缺点，对教师提高的信心会有不良影响的。

（二）应尽可能为提高教学質量創造条件。

在目前情況下，教师在改进工作中是有一定条件的，但为更有效和更快地提高教学質量，从行政到教师共同努力是十分必要的，从教育行政領导部門看，希望能在这些方面給教师提高創造条件：

第一，适当照顧每个教师專講某一段，如世界史、中国古代及中世紀史或者中国近代現代史等。不必形成固定制度，要根据各个城市和各个学校不同条件决定。至少在有条件的学校应該强調这一点。这样

有許多好处：教师可以更广泛更深入地研究某一部分教材；可以有更多时間研究教学法和更具体地考虑貫徹国家的教育方針政策；可以提高教师專業研究的兴趣等。当然好处不仅限于这一些。不然今年教这段，明年教那段，特別对于新教师和專業基础較差的教师，为了应付上課只好"疲于奔命"了。

第二，給教师提供必要的参考資料。历史教师在备課时，需要占有丰富的資料。鑒于目前好多学校的校史和教师的教龄比較短和圖書比較少是否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1）按着不同課程編制比較完备的資料索引。它包括各种書报杂志中有价値的文章，随同教学大綱发到教师手中。它可由某一出版社或者某些基础較好的学校或者某些教育行政部門的教育研究室負責編制。

（2）对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价値比較大的書籍，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或者某些出版机关多印刷一些，按着行政系統发到各个学校，以备教师参考。尤其是新出版、发行量比較少的書，中小城市往往見不到，就是身在大城市的教师，由于不能天天跑新华書店，錯过購得新書的机会也是常有的事。至于書价，有的教师是可以負担的。

（3）对于典型史料和重要資料按不同課程出版史料或資料彙編。这样可以解决兩个困难，一是有些書奇缺，很难看到；一是有些宝貴材料載在大部头的書中，限于时間一时很难查出。

第三，制作一些必要的教学用具。教师为加强課堂教学的直观性，自己动手制作教具完全是应該的。但也有些教具課堂应該用，由于制作困难或者因时間太紧就沒作沒用。就拿世界历史地圖来說，書上插圖少，而挂圖甚至是地圖册又見不到或者很少，課堂直接用得上的只有少許外文版的地圖，而为了画个圖找一个合适样本，有时也眞有"踏破鉄鞋无覓处"之感。因此，如果有关部門能根据需要与可能的原則，有計划地制作一些历史地圖、圖片、模型等对教学帮助是很大的。

第四，多組織專題講座，問題討論和經驗交流。各教育厅、局可根据地区教学存在的主要問題，組織报告会或問題討論会，这样旣可提高教师又能解决具体問題。再有，为了使教师能更好地互相学習、取長补短和激发教师的創造性，各厅、局可提出几个問題，定期組織教师交流經驗和深入地进行研究。

（上接22頁）

原是大运河綫上繁荣的城市，在兵灾、水患交集下，呈現一片荒凉的景象。靜海（北直隶）至临淸一帶，"人民飢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为食。"①东昌一帶，"城郭廬舍，尽成丘墟，荊棘滿目，白骨蔽野。"②

在大規模农民起义中，明朝統治集团分子在开封受到李自成大軍的圍攻，作垂死掙扎，殘酷地掘开黃河隄，"水淹城坏，百万众为魚，潁亳以东，皆受其患。"③这一罪行，完全現出了統治者猙獰的面目，也說明了明朝統治者对待黃河的态度，自始至終都从維护本身利益出发，保运也好，护陵也好，掘隄也好，表現方式虽有不同，实質上却是一致的。黃河得不到根本的有效的治理，这就是基本的原因。

明朝自决定打通大运河以后，对待黃河純从片面利用出发，强挽黃河南流，使大运河获得充沛的水源，溝通漕运。这一来，不仅供应北方的官俸軍粮获得保証，并促使南北貿易活躍起来，有利于商品經济的发展。正因采取不适当的"挽黃保运"，大量泥沙冲灌，成为大运河以及淮河等水道的致命伤，运道經常淤塞，黃水无路宣洩，就釀成長期的水患，使豫、皖、苏、鲁广大地区饱受洪水的侵淩。加之工役頻兴，剝削加剧，人民生活处在極端痛苦之中。就从明代治河与通漕关系来看，就知道黃河在古代成为"中国的灾难"，是有它人为因素的，封建統治者为了保运目的，乖謬地采用强抑强导的方法，"屈大河之势以从人"，便造成了横流的危机。而大运河这一古代的偉大水利工程能够全綫通航，劳动人民除了付出艰巨的劳动以外，在和洪水作頑强斗爭中，还不知蘊含着几許的痛苦經历和血泪代价。

① 明史，卷275左懋第傳。
② 明淸史料，第一集，第一本工部营繕司主事于連躍揭帖。
③ 續行水金鑑，卷2河水，引大淸一統志。

（上接8頁）

雷海宗这样处心积慮地誣蔑和破坏馬克思主义学說，其目的究竟是什么？那就是使資产阶級社会科学复辟。他謾罵“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貧乏，所有的东西几乎都須从头作起”，对資产阶級社会科学则大肆吹嘘，說什么“最近六十年来，世界的社会科学仍不断地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認識和新的解釋”；还說“中国的社会科学沒有資本主义阶段，因为中国历史上沒有經历資本主义……今天要求我們繼承过去人类的文化遺产，并在这个基础上来发展新的社会科学，不研究这些就不行”。按照这些荒謬的說法，似乎不經过資本主义阶段，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可能发展自己的科学，必須去乞憐資本主义，去繼承他們的遺产。在他看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說和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文化，似乎一无足取，而資产阶級社会科学则日益“发展”、“丰富”，抱怨“我們不肯繼承”。这不是明白地要我們讓資产阶級社会科学在中国复辟嗎？我們对于資产阶級社会科学并不主張簡單地取消，但是必須在原則上根本加以否定，然后才在里面批判吸取对我們有用的知識材料。雷海宗这种恢复資产阶級社会科学的陰謀，只有激起广大知識分子的无比憤怒。

× × × ×

全中国的人民正在和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爭，这是关系中国六万万人民走哪条道路的斗爭。历史工作者必須重視这一斗爭。社会科学在形式上是屬于学术范疇的，但它是直接反映經济基础的，也經常对經济基础起着积極的作用。反对党的領导，反对人民民主專政，反对馬克思主义，主張資产阶級民主和資产阶級社会科学的复辟，就是要达到資本主义制度的复辟，就是要千千万万人头落地，就是要我們亡国！我們必須認識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思想如果不从根本上予以徹底的批判，听任其傳播和发展，并占了上風的話，那就会使得社会主义的生产資料所有制有归于失敗的危險。我們如果不起来打退資产阶級右派在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进攻，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巩固。因此，一切科學家和教育工作者都应該勇敢地投入反右派的斗爭，捍衛馬克思列宁主义，捍衛我們的学术和教育事業。

毛公鼎銘釋文

（行款依原式）

王若曰：“父厝、不（丕）显文武，皇天弘
猒乎（厥）德、配我有周，雁（膺）受大命，衒（率）褱（懷）
不廷方，亡不閈于文武耿光。唯天𨟭（將）
集乎命，亦惟先正䙶（刈）辪（辥）乎辟，䇂（勞）堇（勤）大命。
肆皇天亡𦣻（無斁），临保我有周，不巩（丕鞏）先王配命。
旼天疾畏（威），司余小子弗彶，邦𨟭（將）害（曷）吉？䣝々四方
大從（縱）不靜。烏虖，趯（懼）！余小子圂湛于囏（艱），永巩（攻）先
王”。王曰“父厝，今余唯肇巠（經）先王命，命女（汝）辪我邦
我家內外，惷于小大政，甹（定）朕立（位）。虩許上下若否
雩（与）四方，死毋（毋）童（動）余一人在立（位），弘唯乃𥏼（智）。余
非𦞚（庸）又䎽（昏），女（汝）毋（毋）敢妄寧。虔夙夕惠我一人，
雝我邦小大猷，毋（毋）折（誓），緘告余先王若德。用
卬（仰）邵皇天，䌛䌛（綢繆）大命，康能四或（國），俗（欲）我弗作
先王𢘓（憂）”。王曰“雩之，庶出入事于外，尃（敷）命尃
政，埶（蓺）小大楚賦，無唯正䎽（昏），弘其唯王智，迺
唯是喪我或（國）。厤自今，出入尃命于外，乎非
先告父厝，々々舍命：‘毋（毋）又（有）敢惷尃命于外！’”王
曰“父厝，今余唯䌛（緟）先王命，命女（汝）亟一方，囩（宏）
我邦我家。女（汝）顀（推）于政，勿雝（壅）逮（律）庶民。貯、毋（毋）
敢龏橐、々々、迺敄（侮）鰥寡。善效乃友正，毋（毋）敢
湛（湎）于酒。女（汝）毋（毋）敢彖（墜），在乃服，䌛（繆）夙夕敬念王
畏（威）、不賜。女（汝）毋（毋）敢弗帥用先王作明井，俗（欲）女弗
以乃辟圅（陷）于囏”。王曰“父厝”，已曰“及茲卿
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尹。命女（汝）䌛嗣（司）公
族、雩（与）參有嗣、小子，師氏、虎臣、雩（与）朕褻事。
以乃族干吾（敔敔）王身、取責卅寽（鋝）。錫女秬鬯一卣、
鄭圭、瓚寶、朱市（韍）悤黃（蔥珩）、玉環、玉珏、金車、𠦪䋣較、
朱䰡弖（鞃）靳（靳）、虎冟、熏裏、右厄（軛）、畫轉、畫𨏖（輯）、金
甬、遣衡、金踵（踵）、金豙（梶）𣂔𣇌、金簟弼（簟笰），魚葡、馬
四匹、攸勒、金嚚、金膺（膺）、朱旂二鈴（鈴）。錫女（汝）茲兵，
用歲（戊）用政（征）”。毛公厝對敭（揚）天子皇
休，用乍（作）尊鼎、子子孫孫永寶用。



問：古埃及自公元前3200年統一後，奴隶制为什麼沒有高度發展？境內氏族制度的農村公社仍旧存在的原因是什麼？（哈尔濱十一中徐秋欣）

答：奴隶制在一定条件下才有高度发展的可能。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过：“如果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的支配生产方式，那么还需要更大得多的生产、商業和財富积蓄的增長。在古代自然兴发起来的土地公有的农村公社中，奴隶制或是完全沒有，或是只起極其从属的作用。在最初的农民城市罗馬，情形也是如此；等到后来，罗馬变成‘世界的城市’意大利的土地所有权日益集中于人数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阶級手里的时候，那时农民的人口被奴隶的人口所代替”（中譯本，頁165）。古代埃及当古王国时还处在金石并用时代，当然还不具备奴隶制高度发展的条件。自然，这不是說，在古王国时代埃及的奴隶就很少，反之，史料証明，在法老和貴族的手里都有大批奴隶。例如第四王朝法老斯尼弗罗时，一次南征爱非屋皮亚，俘虏男女七千；又一次北征，俘虏利比亞人一千一百名。这些俘虏当然都成为奴隶。从古王国时代的浮彫里也可以看到被綁着的外人俘虏，那些也是战俘奴隶。由古王国到中王国，到新王国，奴隶制是在发展着的，但总还沒有达到高度发展的地步。埃及奴隶制的更大发展是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馬时代。但是，就在那些时候，埃及奴隶的数量也不比自由生产者多，尤其在农業部門，奴隶劳动虽然也应用，但并沒有达到大規模排挤农民的地步。那时候，埃及的大城市如亞力山大里亞等，无疑的，奴隶制經济是占优势的，但其他广大的埃及地区，特别是农村，奴主国家还是采用“王田”的方式，剝削农民。关于托勒密埃及时期的奴隶制，請参看“史学譯叢”，1957年第一期，第163—167頁。

古代埃及的农村公社也和其他所有大河流域的国家一样，相当長期的殘留着。其所以如此者，乃是由于广大人民的經济生活与农業相联系着，而农業經济在这里又与广大領域上統一水利灌溉事業有不解之緣。灌溉組織的需要和公社的長期殘存很有关系。因为土地的个体私有制，对于統一修建灌溉事業与使用水流，有着很大程度上的不便。因此，尽管随着埃及社会生产力之发展，私有制与奴隶經济之成長，而那些尚未为奴隶制經济所排挤掉的个体小农，在相当長的历史时期內一直保留着。农村公社这一二元所有制的經济形态。

农村公社的長期殘存，阻碍奴隶制之发展，而奴隶制之不发展，又反过来使公社有長期殘存之可能。古典世界（希腊、罗馬）的农村公社在进入奴隶制时代发展为城市公社（城邦）。这里，农村公社事实上已趋解体，不过城市公社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公有制的意义（古典所有制）。到了进入封建时代，凡是奴隶制曾經发达的地方，公社就徹底崩潰，而在奴隶制不曾充分发达的地方（如东方各国，也包括埃及），公社还在不同程度上有了殘余，直到資本主义时代，公社才完全瓦解（請参看：“苏联大百科全書”，卷三〇，頁435至436）。（日知）

（上接38頁）

制日趋貧困破产。法国的历史已証明了这点。

十八世紀末法国的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成为小塊土地的所有者，这曾促进了十九世紀初法国农業經济的高漲。但是小农所有制只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反封建斗爭时期）标志着进步，它既不能使农民摆脫貧困也不能眞正解放社会生产力。所以馬克思說正是这种小塊土地所有制在十九世紀成为法国农民貧困与受奴役的規律，法国农民在高利貸者及地主資产阶級盤剝之下紛紛破产了。十九世紀中期法国就有一千六百万农民住在破爛的洞穴內，有四百万乞丐、流浪者、犯人及妓女，五百万人瀕于死亡境地，他們在城乡間过着展轉流离的痛苦生活。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級領导下，与无产阶級結成巩固的同盟，进行推翻資本主义制度的堅决斗爭，建立无产阶級所領导的政权，使农業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劳动农民群众才能眞正摆脫貧困与破产，才能获得眞正的解放。

中國歷史参考圖片(三十三)

周代青銅器的銘文，宋代学者称作“鐘鼎文”，近代学者称作“金文”，是研究周代历史和汉字發展的最重要的資料。



圖一　散氏盤

記載兩个領主关于疆界的糾紛和达成协議的經过，是一种契約性質的文件。采自故宮博物院傳拓本。这件銅器和本期封底的毛公鼎是中国人民宝貴的文化財富，已被蔣幫刼往台湾。

中國歷史参考圖片(三十三)



毛公鼎

周王对一个同姓貴族的告命，类似一篇尙書。采自“金文丛考”。

“本刊代号：6—1”

